



营中纪事

中国的高科技流放地

达伦·拜勒

营中纪事

中国的高科技流放地

达伦·拜勒

Copyright 2021 by Darren Byler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USA by Columbia Global Reports

目录

译序.....	1
序.....	6
被生产出来的恐怖份子.....	9
2017年新疆 :: 1972年南非?.....	12
引言.....	15
第一章 潜在罪行.....	31
第二章 电话灾难.....	42
反恐人民战争.....	46
检查站.....	50
数字围墙.....	53
数据警察.....	58

平安城市	63
第三章 两面人	67
智能营地	80
两面人	85
第四章 牲口	90
一部非人化的机器	91
再教育的感官系统	96
养老院里的死亡	100
无力感	102
第五章 不自由的人	106
宠物	109
不自由的工人	111
幸存者	120
结论：西雅图的背后站着新疆	125
恐怖主义话语	130
新冠遗忘的技术	136
鸣谢	142

延伸阅读	145
关于作者	148

译序

2021年4月，新疆棉事件正在发酵之中，我们所在的一个微信群里也发生了争论。那时，有赖于国际媒体的曝光，新疆再教育营的存在已经不是争论的焦点，但大家仍然不清楚再教育营内的情况，并认为西方的报导夸大其词。很多人更不相信有“强迫劳动”，认为报导背后有强烈的政治动机。同时中国本地媒体铺天盖地地宣传新疆棉花的机械化收割、纺织厂的现代化运作，以及工人整洁明亮的工作环境。

“哪里来的强迫劳动？”一个群友质问，“相信强迫劳动的人肯定对中国和新疆带着深深的偏见。”

当然，我们很容易将他的愤慨和政府的宣传、封锁、审查连系起来。但同时墙外新闻报导的不连贯、不一致、不够深入，也使人们无法准确全面地理解如此规模庞大和复杂的事件。例如，在缺乏详尽和深入报导的情况下，就算读者再有独立思考能力，仍然很难理解“强迫劳动”的原因或动机，意义和影响，更别提对受害者施予同情和援助了。

正因为如此，《营中纪事》这本书的出版¹，成为一个重要的节点。在这本书里，作者仔细分析了区域历史和事件背景，还利用深入调查和亲身访谈切入了问题的肌理，并让我们体会当事人的切肤之痛。而最重要的是，他提供了一系列框架供我们理解这一切背后的意义。这本书直接而雄辩地回答了那个群友的质问：新疆“强迫劳动”是再教育劳动制度下的一种非自由状态。一部分被拘留者在营内就被迫劳动，另一部分在被“释放”之后，镶入街道政府管理之下，被送入和再教育营相连的工厂里，不能随便辞职，不能离开街道范围之外，同时持续被监视和压榨。

所以，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我们是一群身处中国、香港和海外的社会议题关注者、写作者和行动者。自从再教育营的情况遭到曝光之后，新疆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焦点，所以我们走到一起，将达伦·拜勒的这本著作翻译成了简体中文。

可能对于很多简体中文世界的普通读者来说，书中所描写的手机扫描器、检查站、拘留营、殴打、电击、强迫劳动离生活很远。发生在新疆的事情似乎只会发生在新疆，很难想像它们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但事实上，发生在新疆的事情不只发生在新疆。很多类似的情况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身边，甚至我们自己身上。在这三年新冠疫情中，原本针对突厥穆斯林的手段，被复制到新冠患者、密切接触者身上。他们被核酸、探热针及其他技术手段分辨出来，被辅警或者大白上门带走，关押到方舱和其他临时隔离点。而更多普通人被封城所困，家庭

¹ 本书的繁体中文版《新疆再教育营》由台湾春山出版社出版，简体中文版由《营中纪事》翻译小组翻译，经作者授权，在网上免费发布。

被打散、无法正常生活、无收入来源、缺乏食物，甚至因为无人照顾或无法就医而丧命。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处于一种不自由的处境里。和新疆再教育系统类似，疫情作为一个更广泛的“例外状态”被政府宣传，人民于是被迫接受。但将这两者结合来看，我们现在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这个系统的运作方式和目的。

即使现在疫情大致结束，但我们生活中已经充满了——从面部扫描到大规模摄像头监控——这些“例外状态”遗留下来的技术和制度。而书中所描述的“电话灾难”，也由健康码、行程码、场所码通过互联网大厂的支付宝、微信平台，带给了几乎每一个中国公民。虽然在新疆使用的断网手段还没有在新疆以外的地区出现过，但通过手机基站定位手机，以此查出抗议人士的身分予以逮捕，则在“白纸革命”时期的上海崭新登场。和书中描写的一样，手机名副其实地变成了跟踪设备。

网络社区的控制甚至更加严格和无孔不入。利用互联网大厂提供的技术和人力，政府可以对网络上发布的所有内容，包括文字、图像、音频甚至视频做即时监控。一有违规内容，包括对党、领导人、国家制度的批评，谈论敏感历史事件（如天安门事件）和人物，特别是传播突发事件的图像、视频资料，都会遭到禁言、炸号，甚至严重到喝茶、拘留、被控告和监禁。

所以，新疆的大规模监控和再教育营制度并非远在天边不能想像，生产它和它所产生的逻辑正在我们身边日趋恶化。对于简体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通过《营中纪事》这本书可以一窥它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然而，我们也难过地发现，在另一种意义上，新疆发生的事情仍然只留在新疆。无论这些事件有多广泛、多惊人、多残酷，它们始终无法成为简体中文世界的注意力焦点。毋庸置疑，国家机器的宣传和封锁是这种失焦的主要原因，但这不能用来遮掩我们认识上的缺陷，更不能成为我们不作为的借口。

例如前面提到，大家总觉得新疆不会发生在自己头上，所以抱着一种侥幸的心态，将它放在一边。但香港反送中运动、新疆再教育营制度、新冠疫情这一系列事件向我们显示，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新疆已经近在咫尺了。另外，虽然谈论新疆有一定程度的危险性，使我们害怕炸号，害怕喝茶，害怕触犯法律导致牢狱之灾，但事实上在“冲塔”（直接批评政府）以外，很多人仍然在摸索那条红线，在社区里找出一定的空间来谈论新疆，做到在封锁之中仍然可以把握现实。

最后，造成大多数人与新疆疏离的最根本原因，是将新疆仍然当成“边疆”。在我们根深蒂固的沙文主义意识里，新疆仍然是“落后地区”，需要用“先进文化和先进技术”去帮助。这种角度一方面将民族放到“不同发展阶段”的阶梯上，直接导致了歧视和伤害，另一方面也造成“我们自身难保，哪里有功夫去管新疆”的态度。

于是，在这片土地上，被剥夺权力和尊严的人们就这样相互疏远。工人和女性、性少数和政治反对派、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要么顾影自怜、不知对方的存在，要么产生对立、互不信任。即便有“同温层”可以抱团取暖，但在这个愈来愈原子化的社会中，圈子只会愈来愈小。人们无法相互伸出援手，无法做出有意义的连接，无法团结起来。

而本书，也带给我们一些关于连接和反抗的启示。作者达伦·拜勒深入新疆地区做人类学研究，和他的维吾尔学生及朋友产生了深厚的友谊。在拘留营制度威胁整个新疆时，他不仅亲自帮助书中人物出逃，而且还协助建立了《新疆文献记录》（Xinjiang Documentation Project）以保存证据并令世界知情。更重要的是，他通过本书的写作，将维吾尔、哈萨克和回族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展现在世界面前，并指出施害者的罪行，鼓励世界进行追责。从其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者对新疆和其人民的感情，对人性和正义的信念。就像他在书中所说，正是这种展现人性的行为，穿破了极权系统的高墙。

《营中纪事》简体中文版翻译小组

序

中国现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潘岳博士在其2002年的学位论文中提出，将5000万汉族人大规模迁徙到西藏和新疆可以同时解决中国面临的三大问题：人口过剩、资源需求以及民族宗教差异问题²。2022年，潘岳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非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主任。他建议应将汉族移民视为“屯垦者”，并表示边疆的“落后”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隐忧，助长了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活动。他呼吁中国向美国、以色列和俄罗斯——当代殖民者中的三个冠军——学习。他建议将美国殖民主义的西部扩张，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的帝国主义殖民，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有控制地部署西岸定居者和基础

2 潘岳，“中国西部移民屯垦的历史与现实研究”（A Study of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of Immigration and Reclamation in Western China），2002年，博士论文，华中师范大学，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Detail?searchType=&showType=1&indexName=data_408&fid=002179012（中文）；关于他和他起到的作用的进一步讨论，见格拉瑟曼（Aaron Glasserman），“中国新任少数民族事务高级官员吹捧‘民族融合’，设想一个没有文化差异的国家”（Touting ‘Ethnic Fusion,’ China’s New Top Official for Minority Affairs Envisions a Country Free of Cultural Difference），2023年2月24日，中参馆，<https://www.chinafile.com/reporting-opinion/viewpoint/touting-ethnic-fusion-chinas-new-top-official-minority-affairs-envisions>（英文）。

设施这一更现代的例子相结合，汲取三者的不同要素作为当代中国进一步殖民西藏和维吾尔土地的范例。

从中国后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国家指导经济和出口导向发展的模式中，潘岳最后提出，少数民族应通过被分配产业劳动来实现无产阶级化（我认为这恰好对映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经济的各个方面，而这种制度堪称种族资本主义的典范）。在潘岳的研究中，很明显，他想在一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中把土地掠夺和瓦解毛主义制度中的少数民族自治结合起来。他将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进行了对比思考，但不是作为批判对象，而是作为一种方式，以便模拟性地理解中国在其中应处的位置。

我在本书中指出，这部分意味着潘岳的“后民族”框架要求废除毛泽东时代所鼓励的对（民族）差异的有限保护，并用一系列标记——想象中的邪恶、恐怖分子和准恐怖分子的形象、非世俗且“落后的”他者等——来取代穆斯林和原住民的公民自由和自治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就像美国、俄罗斯和以色列所做的那样。回顾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的“肤色限制”³，新疆的穆斯林再教育和劳动指派制度应该被认为是一种“穆斯林限制”，将民族宗教差异进行制度化的种族化

³ 译注：剥夺黑人和其他非白人与白人同等权利、机会和设施的社会制度。

(racialization)⁴，为汉族定居者保留了大部分的管理职位和所有权。

潘岳明确地将目光投向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过去和现在，因为认真地进行这种对比也就是认真地对待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在下文中，我将利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以及塞德里克·罗宾逊（Cedric Robinson）和其他学者所详细阐述的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理论进行比较思考，以表明种族化是正在进行原始积累的全球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⁵。这表明种族化——作为一个由警察、法律、学校等系统支持的制度化进程——并不是简单的跨历史进程的有机结果或特定政治形态产生的效应⁶。相反，它是全球资本主义和它所依赖的帝国主义经济掠夺——或称为合法化的盗窃——的一个历史特征。

⁴ 译注：在社会学中，种族化或民族化是指以统治和社会排斥为目的，将民族或种族身份赋予一种关系、社会实践或不认同自己的群体的政治过程。种族化或民族化往往产生于一个群体与它所支配或想要支配的群体的互动，想要支配的群体将种族身份赋予另一个群体，以再现或继续其支配方式，并加强其社会排斥的做法。这是一个通过种族主义演变而来的过程，为了压迫的目的，将主导群体的身份与非主导群体的身份相对区分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种族化和民族化的群体内形成了社会强制的建构（内化的压迫），即种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是真实的、不同的和不平等的，这种不健康的规范剥夺了他们作为完整人类的尊严。这种用于压迫和诱发创伤的系统性工具在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种族和民族等级制度的历史中通常被不同程度地灵活运用。（维基百科）

⁵ 塞德里克·罗宾逊（Cedric Robinson），“黑人马克思主义：黑人激进主义传统的形成”（Black Marxism: The Making of the Black Radical Tradition），1983年[2000年]，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教堂山；Yousuf Al-Bulushi，“从非洲思考种族资本主义和黑人激进主义：塞德里克·罗宾逊的世界体系的知识地理学”（Thinking racial capitalism and black radicalism from Africa: An intellectual geography of Cedric Robinson's world-system），2022年，Geoforum 132期，252-262页。

⁶ 谢力登（Derek Sheridan），“黑人的符号学：中国移民社区中的种族、日常语言和话语共谋关系”（The semiotics of Heiren: race, everyday language, and discursive complexities in a Chinese migrant community），2022年，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1-19页。

被生产出来的恐怖份子

我有一位维吾尔族对话者，叫阿卜杜拉（Abdulla）⁷。他的故事，以及其人生道路被上述结构性因素所改变和塑造的方式，说明了所有这些在日常生活中意味着什么。本书的叙述由几十个维吾尔和哈萨克人的故事组成，阿卜杜拉只是他们其中之一。尽管我采访和观察到的许多其他穆斯林都来自低层阶级，接受的正规教育也比阿卜杜拉少，但我在阿卜杜拉的故事中看到的许多事情也发生在他们身上。他和其他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他被快速地从拘留营、强迫劳动系统转移到监视居住，最后重新回到医学院。而这些差别，可以直接与他近乎完美的普通话口才和作为医生助理还差两个学期就能获得医学学位的现实联系起来。这清楚地表明穆斯林种族化系统是如何精细地分级，以及它是如何被复制的。

阿卜杜拉和我在城市里遇到的几乎所有维吾尔人一样，来自新疆南部的农村，那里维吾尔人占总人口的90%以上。在生命的前18年里，他的全部生活都发生在维吾尔语之中。后来，作为一名大学生来到城市，他面对的是汉语的世界。作为一个乡村教师的第一个孩子，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想要一种与周围农民不同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他竭尽全力地学习汉语和英文，一遍又一遍地看整套《老友记》。他想过一种维吾尔版的剧中虚构生活。要做到这一点，他明白自己必须表现得像世俗的城里人。他需要剃掉胡子，穿上中国内地商场买来的衣服，和汉族同事用戏谑的汉语交谈。在大学里，他用汉语学习生物和科

⁷ 为了保护阿卜杜拉的身份，我更换了他的姓名，并改动了有关他专业的情况。我在2014和15年曾多次采访阿卜杜拉；在2016年他访问美国期间，我也再次采访了他。他被拘留后，我从他在欧洲的兄弟那里了解到他的情况。他的兄弟与其父母保持联系，并多次录制了他与阿卜杜拉的视频对话，随后与我分享。

学，为在中国医疗系统中的职业生涯做准备。但在晚上，他和另外两个来自家乡附近村庄的朋友学习英语。在几年的时间里，他们精通了美国流行文化，甚至开办了自己的英语学校，培训其他数百名维吾尔村民说美剧里那样的英语，并想象另一个世界——在他们成长的维吾尔语和汉语世界以外。

阿卜杜拉的学生和朋友给他起了个绰号“苏约克 (suyok)”，比喻他能像水一样流动，毫不费力地从一个社会场景流向另一个社会场景，进行编码转换，掌握一个少数民族在一个种族化的世界里取得成功所必须的多重观念体系。他精明圆滑善于经营，但在维吾尔年轻人中也很有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警方开始注意到他。他们派线人到他教书的夜校，报告学生们的言论以及阿卜杜拉的回应。但阿卜杜拉预见到了这一点，所以当讨论纳尔逊·曼德拉的传记时，他小心翼翼地避免与维吾尔人在城市中经历的种族隔离状况进行直接对比⁸。在教室的半私人半公共空间里，他们没有讨论只有约15%的维吾尔大学毕业生能够找到工作，无论他们的汉语和英语说得有多好⁹。他们也没有讨论学生私下告诉他的故事，例如他们亲眼目睹的警察暴行，以及这些警察是如何保护非穆斯林定居者的。作为潘岳呼吁的大规模迁徙的一部分，这些人几乎淹没了他们的村庄。

⁸ M.A. 和达伦·拜勒，“异化与教育的‘第三空间’：中国新疆的英语学习与维吾尔族主体形成” (Alienation and Educational “Third Space”: English Learning and Uyghur Subject Formation in Xinjiang, China)，2022年，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53, no. 4, 396-415页。

⁹ 伊力哈木·土赫提 (Ilham Tohti)，“我们维吾尔人没有发言权：一位被囚禁作家的话” (We Uyghurs Have No Say: An Imprisoned Writer Speaks)，2022年，维索图书 (Verso Books)。

但在2014年底，他有三名学生留下了个人物品从宿舍里消失了。他们没有告诉家人自己的去向，直到几周后，他们在地下贩运路线的另一端重新出现在马来西亚。他们顺着这条路线，与逃离国家暴力的朝鲜人和罗兴亚人一起翻过了缅甸的山区。警方对阿卜杜拉进行了几天的审讯。阿卜杜拉发誓，他对他们的计划一无所知。

这一事件，加上他学生家长的被捕，警察对穆斯林家庭开始的定期搜查，以及对任何形式宗教言论的新禁令，使他相当担忧。他开始谋划自己的出逃。在2016年，他利用所有关系设法得到了一本护照，去了欧洲和美国，探望了我和其他在美国的朋友，仔细考虑了移民的计划，以及如何让他的医学学历在国外得到认可。他意识到这一切都很困难，但似乎是唯一可行的路。他所必须要做的，就是想办法为妻子和孩子办理护照，并卖掉他在城里的房子。但他从未来得及这样做。

2017年，他与其他数十万名维吾尔青年一起被拘留，并被送往封闭的集中管控教育培训中心。他的旅行史，以及他与那些现在被国家视为国际恐怖分子的学生的联系，足以让他被视为“不放心”的人。然而，与其他大多数被拘留者（他们都有类似的思想犯罪和“不正常”行为的数字档案）不同的是，阿卜杜拉拥有医学高等学位，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并能背诵所有与民族政策有关的法律法规。如果拘留营系统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是培训维吾尔村民讲汉语和在工厂里工作，为什么要拘留和培训已经在讲汉语的公共机构里工作的人？

从根本上说，阿卜杜拉和其他数十万移民和农民被拘留是出于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原因，这与他们过去的个人行为关系不大（尽管这些行为的数字足迹会被收集和评估），而与他们作为年轻的、有农村背景的维吾尔人的民族宗教和世代身份关系更大。但同时，将他们制造成工

人的成本也被外化到了培养他们的乡村社区，以及那些牺牲生计送他们上学的家庭。而即使是教养所也需要医生。很明显，阿卜杜拉注定要成为一名罕见的穆斯林医生，负责维护和再生产种族化的监狱护理系统。他的这种被贬值的指定劳动并非发生在工厂里，而是发生在工厂工人和他们的孩子身上。他永远不能离开这个城市，相反，他的未来是一个永久的缓刑状态。他随时可能被送回拘留营，或被降级到工厂，甚至更糟。

2017年新疆 :: 1972年南非?

在许多方面，对新疆所发生事情的讨论类似于1970年代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讨论。在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中，这两个案例往往被视为例外，而不是资本主义逻辑的有限案例。

然而，正如Martin Legassick、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等激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所证明的那样，南非实际上是一个其经济以差异的生产和再生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¹⁰。它是一个国家控制资本主义秩序的典型例子，它制

¹⁰ Martin Legassick, “种族隔离的资本主义根源—为博罗科工作，南非强制劳动制度的起源” (Capitalist Roots of Apartheid—Working for Boroko. The Origins of a Coercive Labour System in South Africa), 1984年,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25, no. 3, 356-359页; 哈罗德·沃尔普 (Harold Wolpe), “南非的资本主义和廉价劳动力: 从隔离到种族隔离制度” (Capitalism and cheap labour—power in South Africa: from segregation to apartheid), 1972年, Economy and society 1, no. 4, 425-456年; 麦克·布洛维 (Michael Burawoy), “移民劳工的功能和再生产: 南部非洲和美国的比较材料” (The functions and reproduction of migrant labor: Comparative material from Southern Af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76年, 美国社会学期刊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 no. 5, 1050-1087页; 沃尔特·罗德尼 (Walter Rodney), “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 (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 1972年 (2018年), 维索图书 (Verso Books) 。

定了所谓“肤色障碍”的法规¹¹，将黑人和棕色人种排除在为白人保留的某些就业类型之外。这种排斥，以及将原住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并迫使他们迁入依赖外部资源的贫瘠保留地的过程，导致了两种新的生产模式。在保留地上勉强糊口的生存，以及来自这些保留地的剩余矿工的供应。肤色障碍“固化”了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阻止了南非黑人积累自己的财富，剥夺了他们在劳动人口中的社会流动性，并扼杀了互助系统。

正是从这个例子中，塞德里克·罗宾逊和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等学者开始建立一个普遍的理论，说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发展通过生产差异——而不是随着国民经济的整体增长产生“水涨船高”的均质化效应——而发挥作用¹²。通过贬值那些被视为并且在法律上被归类为不同的人的劳动和财产，由国家资助和支持的商业利益团体和殖民监督者被赋予了权力，以一种固定、持续的方式积累财富。

快进五十年，可以看到一个类似“肤色障碍”的整治架构通过反穆斯林的种族制度在运行。就像在南非一样，新疆的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为保持持续增长进行了深入的投资。新疆的制度依靠一个以劳动力和数据为形式的双重模式进行种族化资本积累。在一个普遍的意义上，该系统对劳动的盗窃不仅依赖于对工人个人生活的盗窃，而且还依赖于对抚养和照顾该工人的家庭和社区的盗窃。通过从维吾尔家庭和社

¹¹ 布洛维，“移民劳工的功能和再生产：南部非洲和美国的比较材料”，1054页。

¹² 塞德里克·罗宾逊，“黑人马克思主义：黑人激进主义传统的形成”；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公民与臣民：当代非洲与晚期殖民主义的遗产”（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1996年（2018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区偷走一个女儿或儿子，再教育运动将制造不自由（unfree）工人的成本外部化。随着国家从中国各地乡村新聘请了9万名具有高中学历的非穆斯林教师，这种劳动力的再生产进一步得到了寄宿学校系统的保证，该系统将培养下一代的维吾尔工人。

与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一样，世界是新疆不自由工人生产的大部分预测产品¹³和消费品的市场。它还参与了全球性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话语的散播。这些与帝国主义北方¹⁴交汇的领域——通过相互模仿的政治关系和共享的全球经济——指向了新疆最根本的教训：在一个汉族企业和独裁者的权力不受约束的世界里，他们的运作方式与其他殖民国家基本相同。

¹³ 译注：预测产品（Prediction Product）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提出概念。它几乎包括所有以“智能”或“个性化”开头的产品或服务、所有互联网设备、数字助理等等。这些产品的设计方式使企业能够根据用户的行为数据进行预测，并利用产品对用户进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以最大化其利润。生产它们的企业收集用户的数据不仅是为了它们自己使用，还在几乎不受监管的市场上出售这些数据。

¹⁴ 译注：帝国主义北方（Imperial North）一词原指在历史上对全球南方国家（Global South）实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征服的全球北方国家。这里南北方并不是指特定的方向。

引言

2019年年中的一天，一名协警拍了拍一位来自华盛顿大学的年轻学生的肩膀，当时她正走路穿过繁忙的集市十字路口。这个学生叫Vera Zhou，她起初没有觉察到有人在拍她的肩膀，因为她边戴着耳机听音乐，边顾着在人群中穿梭。当她转过身，看到协警的黑色制服时，顿时脸色苍白，尽管音乐还在继续播放。这个警察用汉语——Vera的母语——示意她进入旁边的便民警务站。整个地区现在遍布着7700多个这样的监控网点¹⁵。

灰色盒子一样的警务站里，她在一台显示器上看到自己的脸被一个黄色方形框着。另一些屏幕上，她看到行人在集市里穿行，他们的脸被绿色方形框着。在她的脸部高清图像旁边，她的个人信息出现在一个黑色的文本框中。上面写着她是回族，中国穆斯林群体的一员。中国西北地区有1500万穆斯林，其中大约100万是回族。警报之所以会

¹⁵ 王春翰 (Chun Han Wong) , “China’s Hard Edge: The Leader of Beijing’s Muslim Crackdown Gains Influence” (中国的硬实力：北京镇压穆斯林的领导人获得了影响力) , 华尔街日报, 2019年4月7日,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s-hard-edge-the-leader-of-beijings-muslim-crackdown-gains-influence-11554655886> (英文) 。

响，是因为她走出了她所属社区的警务网格范围。作为曾经被关押在再教育营里的人，她被明令禁止去城里其他地方，除非有治安联防队和公安局的明确许可。屏幕里她脸上的黄色方框表明，她再一次被扣押穆斯林的数字围墙（digital enclosure）系统视为了“潜在的犯罪分子”。Vera说，那一刻她感到无法呼吸。她记得父亲曾告诉她：

“一旦他们来检查你的身份证，你就会再次被抓进去。你已经不是普通人了，你现在属于‘那种人’。”

Vera当时身处奎屯，塔城地区一个人口大约28.5万的小城市。塔城地区以富裕的“油城”克拉玛依为中心，毗邻哈萨克斯坦。2017年，正在华盛顿大学地理系（我是那里的讲师）读三年级的Vera一时兴起回国看男朋友，从此就一直被困在那里。刚回国的一天晚上，她和男朋友正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座拥有350万人口、离她家有几个小时路程的城市）一家电影院时，她男朋友接到了一个电话，要他去当地的派出所。她的苦难从此开始。去了派出所，警察告诉他，他们需要盘问他的女朋友，因为他们在Vera的上网记录中发现了一些“可疑活动”。她使用虚拟专用网络，即VPN，访问了一些“非法网站”，比如她的大学谷歌邮箱账户。后来他们告诉她，这是“宗教极端主义的迹象”。

过了一段时间，Vera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一开始，警察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因为她男朋友是汉族，他们不希望他把事情闹大。他们只是说她必须在派出所里等着。她问自己是否被捕了，他们没有回答，只是告诉她“就坐一会”。这时她已经非常害怕，所以打电话给老家的父亲，告诉他发生了什么。最后，一辆警车停在了派出所门口。四个警察走下车，其中有一个中年人，另一个非

常年轻，和Vera差不多大，他的制服袖子上写着“协警”，一个对在再教育运动中警方以劳务派遣方式雇佣的九万多名私人保安合同工¹⁶的称呼。

当警察说要将Vera带回奎屯审问时，她男朋友立刻要求开车送她回去。出于汉人之间的客套，警察礼貌地表示他们只能按程序办事，用警车押送她，不过如果他想的话，可以开车跟在后面。于是Vera被带上了面包车，但当她男朋友一离开视线，警察立刻将她双手紧紧铐在背后，粗暴地把她塞进后座。那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协警，被安排在后座上看着她。他坐在座位的另一端，膝盖侧向一边，茫然地盯着她，面无表情，好像她是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她被置于一个没有尊严的位置，被视作一个不配拥有人权和公民权的穆斯林极端分子。

新疆位于中国西北角，深入中亚，在另一个自治区——西藏的北部。新疆的面积和阿拉斯加相仿，与从印度到蒙古等八个国家接壤。该地区的原住民包括几个中亚民族，其中人数最多的是维吾尔族，一个约有1200万人口的突厥穆斯林少数民族¹⁷，其次是150万哈萨克族，20

¹⁶ “奎屯-独山子便民警务站公开招聘协警公告”，搜狐，2017年2月6日，https://www.sohu.com/a/125565427_130552（中文）；我在第三章中详细讨论了这被雇佣的九万人和他们的工作。

¹⁷ 译注：突厥语民族，即广义的突厥人，是欧亚大陆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众多族群的统称，源自原始突厥族，但在历史上与蒙古族、通古斯民族、汉族、粟特人、希腊人等其它族群通婚。现在全球有1.83亿人口使用突厥语族语言，这些人主要分布（依人口多寡）在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伊朗、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俄罗斯的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与北塞浦路斯等国家与地区。广义的“突厥人”是一个文化认同概念，并非血缘群体，是经过历史上的长期迁徙，并融合、同化了大量其他民族后形成的。（[维基百科](#)）

万吉尔吉斯族，以及1.5万乌兹别克族。新疆的汉族人口约1100万。新疆在汉语里的意思是“新的边疆”，正式名称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是中国政府设立的行政区划，意味着维吾尔人有一定的自治权。

几个世纪以来，维吾尔人一直在中亚的沙漠绿洲中从事小规模灌溉农业。过去两千年，除了几个时期之外，他们一直实行着自治管理，活动在古丝绸之路的贸易线上。1755年，满族政府统治的清朝入侵了该地区的部分领土。1884年，他们将这个被勉强控制的地区变成了省级领土，并在主要城市建立了军事前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该地区汉族约占总人口的6%，而维吾尔人约占80%，他们几乎都居住在南部世代相传的土地上。

在1949年之前，这个地区的前途还是未知数，它是将成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并入苏联呢，或者清帝国的边界会使得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土地变成人民共和国的内部殖民地？然而在1949年，斯大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达成了协议，认为中国应“占领”该地区¹⁸。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将几百万退役士兵迁入该地区北部，把他们变成军事殖民地上的农民。这些定居者，也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员，由于受到经济上的激励和意识形态上的劝导，被引入了这些边疆地区。除了汉族定居者，还有近百万讲汉语的穆斯林，即Vera所属的回族，也迁入了该地区。今天，维吾尔族占总人口不到50%，而汉族占40%以

¹⁸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talin and CCP Delegation, June 27, 1949”（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的谈话备忘录，1949年6月27日），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3380.pdf?v=a72a4ae09caba5e4c7034a5c2eb69c0d>（英文）。

上。该地区已成为中国约20%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来源地，煤炭储量占比甚至更高，并且生产世界上约四分之一的棉花和西红柿。

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十年里，汉族定居者与维吾尔人基本上不互相往来。因为道路稀少，而且巨大山脉阻隔了汉族占据的北方土地和维吾尔族所在的南方土地，绝大多数维吾尔人和汉族定居者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相互接触。虽然中国共产党确实改变了该地区的治理结构，但在南部地区，维吾尔人依旧保有领导职务。即便维吾尔宗教领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清洗，被派驻到南方的少数汉人仍然入乡随俗¹⁹，适应了维吾尔族的文化传统。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转向出口导向型市场经济，维吾尔人在该地区南部享有的相对自治权也开始改变²⁰。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于是石油、天然气，以及后来的棉花和西红柿成为了新疆的经济支柱。对这些商品的寻求吸引了数百万汉族定居者进入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南部地区，首先是建立资源开采的基础设施，然后是支持产业和服务部门。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新疆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边陲殖民地（peripheral colony），为上海和深圳等大都市提供服务。和其他定居殖民计划一样，原住民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新经济中最有利可图的部分之外。当定居者经济（settler economy）导致生活成本迅速上升时，不断扩大的城市和资源部门给维吾尔家庭带来越来越大的压

¹⁹ 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欧亚十字路口：新疆史），Hurst Publishers，2021年，265-270页。

²⁰ 林伟（Nicolas Becquelin），“Staged Development in Xinjiang”（新疆的阶段性发展），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2004年，358-378页。

力。有些人成为工业化棉花农场的佃农²¹，另外许多人被迫从事建筑等行业的低薪流动工作。

20世纪90年代的定居移民潮带来的经济变化和政治动态也催生了越来越频繁的抗议和暴力事件。例如，在喀什市附近的巴仁乡，用猎枪和农具武装的维吾尔农民发动了一场经常被称之为“起义”的抗议活动，反对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反对给予汉族定居者工作和灌溉权的优惠待遇。虽然有些人认为这次维吾尔人占领乡镇政府大楼事件的框架的确是围绕着更大的维吾尔人自决权问题——国家最初将其描述为民族分裂主义，后来则是恐怖主义——但对当时生活在该地区的维吾尔知识分子阿不都外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来说，事件中最突出的是抗议活动“被中国军队镇压²²”的方式。在一本回忆录中，他回顾了“政府如何立即开展大规模逮捕”。他回忆：

我们村子里流传着目击者的描述，形容抗议者如何像砖块一样被装进卡车拖走。警察不仅拘留了活人，连死者的尸体也拉走了。当时，学校全被勒令停课，所有人都被迫参加政治思想灌输会（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sessions）。我仍然记得很清楚，当时家家户户被搜，宗教书籍被烧，村民被随机逮捕。得知政府将我们这些国家政策的受害者指责为“麻烦制造者”，我们私底下会悄悄议论。

²¹ 米华健，《欧亚十字路口》。

²² 阿不都外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Mehbusluq Zawuti》（The Prisoner Factory: A Memoir / 囚徒工厂：回忆录），手稿，2021年，12-13页。

在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地区严格执行偏向汉族定居者的政策，引起了强烈不满。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普遍的就业歧视、土地征用，以及政府对宗教活动的加强控制引发了一系列抗议和暴力镇压。这种情况在2009年达到顶峰：因为汉族工人对维吾尔工人使用私刑，维吾尔学生发起抗议²³，遭到武警的实弹镇压。作为回应，维吾尔人在乌鲁木齐街道发动暴乱，杀死了130多名汉族平民，伤者则更多。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地方当局在整个地区开展了军事化的“严打”行动，导致数千名维吾尔人失踪²⁴，而这又带来了更多对警察暴行和国家控制的不满。

正如学者肖恩·罗伯茨（Sean Roberts）和鲍文德（Gardner Bovington）所表明的²⁵，过去三十年里，维吾尔人直接针对国家行为体（state actors）的抗议和暴力事件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控制形式的增多和民族歧视问题的恶化。随着2000年代穆斯林恐怖主义话语

²³ 达伦·拜勒，“Requiem for the Living Dead Ten Years After 7-5”（活死人的安魂曲，75后的十年），SupChina，2019年7月3日，<https://supchina.com/2019/07/03/requiem-for-the-living-dead-ten-years-after-7-5/>（英文）。

²⁴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We Are Afraid to Even Look for Them’: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in the Wake of Xinjiang’s Protests”（‘我们甚至不敢去找他们’：新疆暴乱结束后的强迫失踪），2009年10月20日，<https://www.hrw.org/report/2009/10/20/we-are-afraid-even-look-them/enforced-disappearances-wake-xinjiangs-protests>（英文）。

²⁵ 肖恩·罗伯茨，《The War on the Uyghurs: China’s Internal Campaign Against a Muslim Minority》（对维吾尔人的战争：中国针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内部运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0年；鲍文德，《The Uyghurs: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维吾尔人：家乡的异乡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0年。

(discourse)²⁶进入中国，许多此类事件被国家媒体描述为“恐怖主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由抗议变成的冲突里，绝大多数被杀或受伤的是维吾尔肇事者们自己。这些“恐怖分子”通常手无寸铁，或只有简易自制武器，最终被警察的自动武器击毙或打伤。

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些暴力事件确实开始类似于国际上公认的恐怖主义。以前的事件往往是临时发起的，目标为警察和政府当局，并非平民。但从2013年底和2014年初开始，由维吾尔平民实施的直接针对汉族平民的暴力袭击事件增多。在这方面，北京、昆明、乌鲁木齐等城市中心发生的自杀式袭击最为突出。与以前发生的事件不同，这些袭击使用了刀具、车辆和爆炸装置。这是第一次，维吾尔族袭击者似乎在策划针对非穆斯林的无差别协同攻击。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袭击看上去与当地的政治经济积怨无关，相反其策略却和那些在欧洲和北美代表新兴伊斯兰国行事的犯罪分子如出一辙。

与此同时，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开始首次接触社交媒体。他们也开始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当代穆斯林文化和信仰传统更加感兴趣——比如那些受伊斯兰传道会（Tablighi Jamaat，一种非政治性的逊尼派虔敬传统，在全世界有数十万成员）启发的传统。有计划的袭击事件逐渐增多，加上维吾尔人总体上越来越遵守清真标准（比如戒酒），这

²⁶ 译注：话语是社会理论的一个主要话题，横跨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和话语分析等领域。在米歇尔·福柯的开创性工作之后，这些领域将话语视为构建我们对世界的经验的思想、知识或交流系统。政治学认为话语与政治和政策制定密切相关，不同理论也将话语理解为与权力和国家有关，因为对话语的控制被理解为对现实本身的控制（例如，如果一个国家控制了媒体，他们就控制了“真相”）。从本质上讲，话语是不可避免的，任何语言的使用都会对个人的观点产生影响。例如，对于各种游击队运动，可以使用两种明显不同的话语，将其描述为“自由战士”或“恐怖分子”。（维基百科）

让新疆的汉族定居者感到担心，而他们所恐惧的其实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抽象、刻板的伊斯兰威胁。

另外，在此期间，有近万名维吾尔人从中缅边境偷渡逃往土耳其²⁷。据称，在土耳其政府的支持下，其中一千多人最终去了叙利亚，与ISIS和阿萨德政权作战。这群外籍战士人数占维吾尔族整体人口的比例，比英国穆斯林中同样参加叙利亚内战的人数比例还要小。但在中国，只要维吾尔人出现在叙利亚，就坐实了当局口中对中国主权关乎存亡的威胁。与文革时期称反革命分子为害虫的论调相呼应，国家媒体开始把那些被视为极端分子的维吾尔和哈萨克人描述成是需要被消灭的蛇虫鼠蚁²⁸。

为了应对那些由几十人实施数百人支持的袭击，虔诚伊斯兰教实践的兴起，以及维吾尔难民大批逃往土耳其的情况，中国当局宣布了“反恐人民战争”。然而，与欧洲和北美内部的反恐运动不同，“人民战争”催生了一个法外的大规模拘禁计划，以保护维吾尔祖传土地上的汉人定居者社会。这场运动不是针对少数罪犯，而是针对新疆1500万整体穆斯林人口。它导致了伊斯兰教习俗和一些维吾尔和哈萨克文化传统的入罪化（criminalization）。起初只有宗教领袖被送往再教育营，但到了2017年，反恐战争变成了一个防止维吾尔和哈萨克人成为穆斯林的计划，更甚者，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他们成为维吾尔或哈萨克人。

²⁷ 肖恩·罗伯茨，《对维吾尔人的战争》。

²⁸ 达伦·拜勒，“Imagining Re-Engineered Uyghurs in Northwest China”（想象中国西北部被重新设计的维吾尔人），Milestones: Commentary on the Islamic World, 2017年4月20日，<https://www.milestonesjournal.net/photo-essays/2017/4/20/imagining-re-engineered-muslims-in-northwest-china>（英文）。

五年时间内，国家建立了一个检查站系统，最开始在县与县之间设置检查站，后来发展到在城市辖区内设点。他们建立了一个限制维吾尔人在该地区行动的通行证系统，并没收了少数已经获得护照的维吾尔和哈萨克人的护照。他们派遣多达110万名国家工作人员进入维吾尔和哈萨克农村社区，对“不放心的”穆斯林进行评估。他们增聘了九万多名助理警察，负责检查穆斯林的电话和身份证，使该地区的安保密度可与柏林墙倒塌前的东德相媲美²⁹。他们还开始建立一个高度警戒化的拘留营网络，在高峰期关押比例在10%到20%之间的成年人口³⁰——即地区当局认为已经形成宗教极端主义“毒瘤”的人口比例。同时，国家民政部开始执行“杜绝违法生育”政策，加上拘留造成的普遍性家庭分离，导致出生率下降了50%至80%³¹。

2018年4月，我在喀什遇到一些协警，要求我出示证件。在喀什，每两百米就有一个检查站。他们扫描了我的护照，并通过图像识别系统

²⁹ 郑国恩 (Adrian Zenz) 和雷国俊 (James Leibold) , “Securitizing Xinjiang: Police Recruitment, Informal Policing and Ethnic Minority Co-optation” (新疆的安保化: 警察招募、非正式警务和少数民族的收编), 中国季刊, 242期, 2020年, 324-348页; 约翰·科勒 (John O. Koehler) , 《Stasi: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East German Secret Police》(斯塔西: 不为人知的东德秘密警察的故事), Westview Press, 1999年。

³⁰ 雷国俊, “The Spectre of Insecurity: The CCP’s Mass Internment Strategy in Xinjiang” (不安全的幽灵: 中共在新疆的大规模拘禁战略),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2019年3月1日, https://figshare.com/articles/composition/The_Spectre_of_Insecurity_The_CCP_s_Mass_Internment_Strategy_in_Xinjiang/13191050/1 (英文)。这些发现与新疆各地(乌鲁木齐、阿克苏、墨玉)的警方内部文件以及与结合曾被拘留者访谈所估算的拘留设施容量一致。

³¹ “新疆地区人口变动情况分析报告”, 新疆发展研究中心, 2021年1月7日, <https://archive.is/O1vOg> (中文)。

寻找是否与监视名单上的人相匹配。当他们在检查站扣留我时，我观察到他们要求每个通过检查站的维吾尔人拿出他们的智能手机，这样他们才能用一个应用程序来检查这些手机。这个应用程序不是美亚柏科（Meiyya Pico）就是烽火通信（FiberHome）³²开发的，它们都是数据取证公司。这两家公司在该地区正致力于将人们的智能手机变成追踪他们的设备。我开始想象自己被盘问关于2011年以来采访过的那数百名维吾尔人的事情。

从他们的亲戚朋友那里我了解到，我认识的人里面已经有三十多个消失在了再教育营系统中，但和我关系最好的维吾尔和哈萨克朋友大多还在外面。我想到了SD卡里面那些拍摄检查站、摄像系统、标识牌和技术设备的照片，警察用简单的金属探测器就能在我的背包内袋中轻易找到它们。还有那一页又一页关于失踪人口和监控设备的笔记，存在我笔记本电脑上有密码保护的硬盘中，他们也可能发现。还想到他们会怎样逼迫我说出电子邮箱的密码。我还想象着自己被戴上手铐，被扔进一个拥挤的水泥牢房，被迫签署一份供词，说我在为美国情报机构秘密工作——后来新疆政府发言人果然在公开声明中这样指控我³³。

³² 李香梅（Megha Rajagopalan），“China Is Forcing People to Download an App That Tells Them to Delete ‘Dangerous’ Photos”（中国正强迫人们下载一个APP，让他们删除‘危险’的照片），Buzzfeed，2018年4月9日，<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meghara/china-surveillance-app>（英文）；钟旻（Raymond Zhong），“在新疆，你手机上不能有的73000项内容”，纽约时报，2019年7月2日，<https://cn.nytimes.com/technology/20190703/china-xinjiang-app/>（中文）。

³³ “Scholars Spreading Rumors About Uyghur Detention Work for US Intel Agency: Spokesperson”（发言人：散布维吾尔族被拘留谣言的学者为美国情报机构工作），环球时报，2019年12月3日，<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1172046.shtml>（英文）。

国家当局将权力外包给私人技术公司和保安合同工，试图改造该地区的原住民人口。那些曾经受益于自然资源经济的私营企业家和汉族定居者，开始被要求行动起来，建立一个走在当代科技最前沿的监控产业。于是这个数字围墙从人脸识别检查站和智能手机扫描仪，发展到了智能营地和智能工厂。

国家当局和官方媒体将这一大规模拘禁运动称为“教育改造”。在提交给联合国的文件中，中国国家当局将这一系统描述为“职业培训计划”，对象是那些恐怖主义或宗教极端主义违规行为未达到犯罪程度³⁴的新疆公民，他们无意中违反了反恐准则，或曾因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相关罪行服过刑。这些违规行为中很多与网上活动和去清真寺有关。例如，在一份供负责评估维吾尔和哈萨克族人口的国家工作人员使用的手册³⁵里，将仅仅是使用虚拟专用网络（VPN）——像Vera那样——或访问外国网站描述为和计划实施恐怖袭击相同的行为。一份警方内部报告指出，访问清真寺“超过两百次”³⁶就会导致穆斯林被送入再教育营“接受教育”。在报告中提到的一座清真寺，这一威胁——再加上清真寺入口处的人脸扫描检查站——导致该寺一年内参访人数下降了96%。

³⁴ “中国提供的关于其第十四至第十七次合并定期报告结论性意见后续行动的资料”，联合国，2019年10月8日，<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20/028/06/PDF/G2002806.pdf?OpenElement>（中文）。

³⁵ “四同三送活动手册”，中国国家民政部，<https://xinjiang.sppga.ubc.ca/chinese-sources/cadre-materials/the-four-togethers-and-three-gifts-handbook/>（中英文）。

³⁶ “Xiheba Precinct Risk Evaluation Judgment Report During Ramadan 2018”（西河坝分局斋月期间风险评估判断报告），新疆公安厅，由《拦截》翻译成英文，<https://www.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20466261-document-24>。

自2017年以来，由于这些政策，中国当局将多达150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回族人扣押在中度至高度警戒的“再教育”营地系统中，使其成为自二战以来对一个宗教少数群体最大规模的拘禁。这个由三百多个营地³⁷和其他新建或扩建的法外拘留设施组成的群岛，已经由政府招标合同、卫星图像、研究人员的访问，以及对曾被拘留者和前营地工作人员的采访记录了下来。此外，政府文件和对前工作人员的采访表明，中国政府利用了前所未有的监控技术，以及借助于企业奖励办法创造的一个分散式强迫劳动网络，来控制、跟踪、监视、提取数十万营地外穆斯林的数据和劳动。

根据我的采访和媒体报道，一些被拘留者甚至被转移到监狱。根据新疆人民检察院的数据，在2017年至2020年期间，新疆有超过53.3万人被正式起诉³⁸，这一比率是该时期全国平均水平的六倍。由于中国法院的定罪率高于99%³⁹，可以认为几乎所有刑事起诉都导致了正式判刑。一些曾被拘留者，特别是年老体弱者，则被置于社区监控或软禁之中。还有数十万人被安置在与再教育营挂钩的工厂中从事各种形式的强迫和受限制的劳动。总体上看，国家当局和私营企业现在控制着穆斯林日常生活最重要的方面。这一控制系统所涉及的技术产生了一个与国家纠缠在一起的营利性产业，使得国家和地方政府可以从对少数民族公民的压迫中获利。虽然在上个世纪，类似的全面极权主义

³⁷ “The Xinjiang Data Project”（新疆数据计划），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2020年，<https://xjdp.aspi.org.au/>（英文）。

³⁸ 新疆人民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2018-202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2018-2021年。

³⁹ 郭丹青（Donald Clarke），“China’s low acquittal rates: interesting statistics”（中国的低无罪判决率：有趣的统计数据），The China Collection，2020年5月5日，<https://thechinacollection.org/chinas-low-acquittal-rates-interesting-statistics/>（英文）。

制度就曾经针对少数民族，但这是数字监控时代出现的第一个如此大规模的尝试。这也是殖民主义和拘留营制度历史上一个新的现象。

该系统建立在一套“反穆斯林恐怖主义战争”辞令的基础上，而这套说辞是中国政府从后911时代的美国及其盟国那里引进的。就在最近的2017年，作为一项名为“借鉴英国先进经验，严厉打击破坏中国新疆地区发展稳定的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源”的外事交流活动⁴⁰的一部分，新疆当局接待了英国反恐专家。在中国，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英国专家只简单称之为“预防”——的前提是将数十万被认为“不放心”的穆斯林拘留在再教育营和监狱中，而将另一部分成年穆斯林安置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工作。多达50万名儿童⁴¹被安置在寄宿学校。反恐的逻辑粗暴地取代了对人权和公民权的关注，建立了一个巨大的高科技流放地。

和其他情况类似，反恐战争的代价主要由穆斯林自己承担。国家法律机器将穆斯林排除在非穆斯林公民享有的民事保护之外，从而使得拘留“潜在罪犯”有了合法性，例如那些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穆斯林公民。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被列入了监视名单。这种将臣服人群归入“恐怖分子”类别的做法有助于证明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同时制

⁴⁰ “Countering the Root Causes of violent Extremism Undermining Growth and Stability in China’s Xinjiang Region by Sharing UK Best Practice”（借鉴英国先进经验，严厉打击破坏中国新疆地区发展稳定的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源”的外事交流活动），英国外交及国协事务部（United Kingdom, Foreign, Commonwealth and Development Office），2017年3月31日，<https://devtracker.fcdo.gov.uk/projects/GB-GOV-3-PAP-CNF-002340/summary>（英文）。

⁴¹ 秦颖（Amy Qin），“新疆镇压行动中的维吾尔族儿童”，纽约时报，2020年10月15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1230/china-xinjiang-children-boarding-schools/>（中文）。

造数据密集型的监控产业。这种辞令产生了一种法律上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像Vera这样的穆斯林可以被肆无忌惮地对待。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监视名单和营地规模的巨大，以及它们被先进技术所塑造的方式。

本书利用了2011至2020年之间在新疆、哈萨克斯坦、西雅图进行的超过二十四个月的民族志研究。它考查了数千份经核实的政府文件、科技行业文件、以及由政府官员和科技行业从业人员泄露的中国警方内部报告。但它的核心推动力是对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和回族的曾被拘留者、营地工作人员、系统技术人员的数十次长篇采访。其中一些受访者是哈萨克人，他们能够利用家庭关系和一种“与生俱来”的移民权利，跨越边境逃到哈萨克斯坦。少数人通过说服当局他们会保持沉默，得以登上飞往美国或欧洲的飞机。其中一些人——Vera、巴依木拉提（Baimurat）、凯尔比努尔（Qelbinur）、埃巴哈提（Erbaqyt）、古孜拉（Gulzira）——要求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其他人则要求匿名，以保护他们在中国的家人。这本书就是他们的故事。

他们向我讲述故乡的科技围墙时，我理解了再教育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使穆斯林成为被任意拘留的目标。监控系统本身产生了有罪的假设，以及潜在罪犯的假设。由于该系统制造了这些说法，许多穆斯林被要求戴上忠于国家再教育计划的面具，以掩盖他们的道德异议。而那些缺乏这些面具的人在再教育营的灯光和摄像头下被非人化

(dehumanization)⁴²。他们被塑料小板凳、电棍、自动化酷刑所改造。他们被训练成坐着的时候不动、关键的时候畏缩、被打的时候闭嘴、唱歌的时候大声唱，并永远保持微笑，对所有命令言听计从。他们被训练成不会注意到排泄物、汗水和恐惧的气味，这些气味来自于当做马桶用的无盖塑料桶，狭窄空间里挤成一堆的没有洗澡的躯体，以及对看守的惧怕。他们不再注意到半夜时分的强光，不再感觉到自己持续的饥饿，不再思考遥远的未来或过去。

许多人，特别是几十万没有人为他们发声的农村维吾尔人，仍然被关在里面。而有些人已经被放回了数字围墙，成为“智能”工厂注视下不自由 (unfree) 的工人。

这些曾被拘留者告诉我，他们并不责怪那些被迫喂养和维护这台冷漠机器的技术人员和营地工作人员。他们要追责的，是那些管理运作这个系统的一把手们，以及那些嘲笑他们的苦难的人。他们还要求开发这些技术的设计师和工程师们对此承担责任。听完他们的诉说，我得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他们所经历的非人化过程至少有一部分是从西雅图到北京的计算机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

⁴² 译注：非人化是指否认他人的完整人性，以及这种否认所伴随的残酷和造成的痛苦。一个实用的定义是指“看待和对待他人好像他们缺乏通常属于人类的心智能力”。在这个定义中，每一个将某人视为“不如”人 (“less than” human) 的行为或想法都是非人化。（维基百科）

第一章 潜在罪行

Vera觉得反恐战争与她无关。她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时尚达人，喜欢戴厚重的耳环，穿黑色的衣服。她在俄勒冈州波特兰附近上的高中，正准备在美国一所名牌大学里成为一名城市规划师。她曾计划毕业后就回中国与男友团聚，并在那里发展事业，因为她认为中国经济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正蒸蒸日上。虽然身份证上写着她是穆斯林，由于父亲和男友是汉族，她认为自己是安全的。她不知道，从2017年初她的家乡和整个新疆就已经实施了新的网络安全法⁴³，国家当局所说的极端主义“潜在犯罪分子”⁴⁴就是这样被识别并拘留的。她不知道，作为习近平批准的“人民战争”的一部分，该地区新任命的党委书记已下令“应受尽收”⁴⁵。

⁴³ “奎屯市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推进会”，奎屯零距离，2017年1月20日，<https://archive.fo/tWk0l>（中文）。

⁴⁴ 联合国，2019年。

⁴⁵ 王霜舟（Austin Ramzy）和储百亮（Chris Buckley），“泄露文件揭示中国如何组织对穆斯林大规模拘禁”，纽约时报，2019年11月16日，<https://www.nytimes.com/zh/2019/11/16/world/asia/xinjiang-documents-chinese.html>（中文）。

现在，在警车后座上，她感到自己正在一波恐惧感中失去控制。她尖叫，泪如雨下，“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我们国家不保护无辜的人吗？”对她来说，这就像一个残酷的玩笑，好像她在恐怖片中扮演一个角色，只要她说对了话，他们会立刻惊醒，意识到这一切只是一场误会。

最后，领头的警察对她说：“你最好闭嘴。”然后她开始默默抽泣，看着窗外，寻找她男友的车灯，看着草原在清晨的光线中匆匆而过。几分钟后，窗户上开始蒙雾了。当其他警察都没在看时，那个年轻的协警倾过身，默默用手擦掉了窗户上的水雾。Vera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虽然他不能表现出任何同情，但他通过手势向我表明，对此事负责的人员中至少有一些仍然是人。”

这本小书通过研究在中国使用的有限案例，讲述了在“智能”社会控制（“smart” social control）的最前沿领域，先进的数字围墙和自动监测系统在全球的兴起。在中国西北地区发生的事情与美国南部边境的营地、克什米尔的数字控制、约旦河西岸的检查站是相关联的，但它的规模和残酷性使其超越了其他同样是强权压制边缘人口的地区。在中国，这些控制系统形成了“再教育技术”，产生了新型劳工，产生了像Vera这种在现实和虚拟世界都被拘留的人。人们即使没有被正式拘留，治安制度也会使用面部识别技术和标记行为数据集将他们转化为数据。这反过来又迫使这些人适应受控制的环境，使他们成为不自由和不独立的劳动力。

然而，除了这些技术和物质系统的平庸日常性（banal everydayness），本书也考察了人类如何仍然有能力拒绝它们的合理性，并对它们进行去叙事化（denarrativize），为思考和反对无法理解的暴力（incomprehensible violence）开辟空间。这些拒绝放弃人性的时刻——无论是通过擦拭玻璃来关心别人，还是流下眼泪——都刺破了这个非人道系统的伪装。正是这些行动能够让再教育的机器运转不灵，正是它们让人们能够在不自由的平庸中继续生存下去。正如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反思他在奥斯威辛的日子时所说的那样，除了身体健康、懂得警察的语言和拥有国际盟友之外，在集中营系统中生存下来往往主要是基于“纯粹的运气”⁴⁶。但这种运气反过来又是通过一种任性的固执和拒绝否认自己的人性所形成的。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经常思考这个营地系统和之前的营地系统之间的连续性和断裂性。从那些能够保存完整人性生存下来的人的角度看，许多事情仍然与莱维经历的一致。在本书中叙述营地制度的许多人和Vera一样，发现通过坚持、通过拒绝放弃，机会偶尔会向同情心和这个前所未有的高科技监控系统之中的几丝缺口打开。

之后的几个月里，Vera和其他11名穆斯林少数民族妇女被关押在奎屯市郊区一个旧警察局的二楼牢房里。与Vera一样，牢房里的其他人也是因为网络“潜在罪行”被关了进来。一名哈萨克妇女在她的手机上安装了WhatsApp，以便与哈萨克斯坦的商业伙伴联系。一名在集市上销售智能手机的维吾尔妇女用她的身份证给多名顾客注册了电话卡。

⁴⁶ 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这是不是个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看守告诉她这不是监狱，而是一个“集中管控教育培训中心”⁴⁷。他们使用的“集中”这个词也有“集中营”中的“集中”的意思，Vera注意到了这之间的联系。她告诉我，“我几乎立刻就知道这是一种集中营。看守知道我们没有犯任何罪。我们那间牢房里没有一个人犯了任何真正的罪行。他们抓我们只是因为领导说要拘留穆斯林。”在营地的头几天，她把在波特兰高中时读到的关于大屠杀的故事悄悄地告诉她的同伴。她告诉她们：“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和在安妮·弗兰克身上发生的事是一样的。”

她刚进去的时候，牢房里还没有安装摄像系统。Vera觉得，当局仍然在将旧警察局改建为拘留营的进程中，当时大规模拘留行动开始七个月了。“他们甚至没有足够的碗供大家吃饭，所以我们必须轮流吃。”

准备尚未齐全也有好处。每当看守不在旁边时，被拘留者可以互相交谈。Vera了解到，牢房里一位年轻的哈萨克妇女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曾在温哥华的一所大学学习（和Vera的学校同处于北美的西北太平洋地区）。在最初的几天里，她们无所不谈。“我们聊吃的，聊她当医生的经历，聊书籍、电影、餐馆，问对方是否去过太空针塔（Space Needle，西北太平洋地区西雅图市的一座主要地标）。就好像我们不在营地里一样，仿佛营地只是一个噩梦。”

牢房里其他人尽可能地听着她们谈话，尽管大多数年长的维吾尔和哈萨克妇女并不懂普通话，因为她们的母语和汉语区别太大。当看守试图让她们记住贴在牢房墙上的十条准则时，很明显可以看出他们听不

⁴⁷ “‘去除思想上的病毒’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的镇压行动”，人权观察，2018年9月9日，<https://www.hrw.org/zh-hans/report/2018/09/09/322139>（中文）。

懂普通话。Vera还记得她们是如何结结巴巴地背诵这些短语：“只说国语；热爱祖国；反对损害国家利益；本房间里没有宗教；不准损坏电视或墙上的任何东西；不准打架；不准偷偷说话；不准和其他房间的学员说话；坐在自己的凳子上。”

到了晚上，直视着非常刺眼又从来不熄的灯光，很难忘记发生过的事情。Vera仍然记得那低沉的哭声，一种像传染病一样在拥挤的牢房里传播的声音。“我花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才习惯开着灯（睡觉）。”

大约在她刚开始能入睡的时候，她们被转移到一个新的牢房，里面装有最先进的摄像头和录音系统⁴⁸，用以监控她们的一举一动。一旦她们用手或毯子遮住眼睛，挡住强光，看守的声音就会从装在墙上的扬声器中吼出。如果在规定睡眠时间外试图坐在床上，或说普通话以外的任何语言，她们也会受到警告。白天，她们只被允许站立或坐在塑料凳子上，观看墙上显示器里放映的“再教育”电视节目。

2018年1月左右，营地一个新的侧翼建成后⁴⁹，被拘留的人数急剧增加。虽然Vera没办法进入每个房间观察，但她估计，那个时候至少有六百人被拘留在营地——占奎屯市哈萨克和维吾尔族成年人口总数

⁴⁸ 这很可能是一个类似于在新疆被广泛使用的来邦智能监狱系统。见达伦·拜勒，“The Global Implications of ‘Re-education’ Technologies in Northwest China”（中国西北地区‘再教育’技术的全球影响），全球政策中心（Center for Global Policy），2020年，<https://newlinesinstitute.org/china/the-global-implications-of-re-education-technologies-in-northwest-china/>（英文）。

⁴⁹ 营地的卫星图像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时期的扩建，坐标位置是：44.412373, 85.070769；见Shawn Zhang，“Satellite Imagery of Xinjiang Re-education Camp no. 81”（新疆再教育营第81号的卫星图像），2019年5月18日，<https://medium.com/@shawnwzhang/satellite-imagery-of-xinjiang-re-education-camp-81-28432a89b05>（英文）。

的10%以上⁵⁰。她想象，那时候城里几乎所有维吾尔家庭和大多数哈萨克家庭都失去了一名家长。“当时他们抓了很多维吾尔和哈萨克人进来，” Vera回忆说，“每晚都有三四个人。有的一家人都被抓进来了。他们只能睡在水泥地上。”被抓进来的妇女中，有一个是孩子还在哺乳期的年轻妈妈。出于一点同情，看守允许她保留一张孩子的照片。“晚上，她看着儿子的照片，一直在哭。看守从摄像头上看见了，就通过喇叭对她吼叫：‘如果你再哭的话，照片就会被没收！’”

营地非人化的纪律让被拘留者互相排斥，迫使他们惧怕彼此。在一次对中国教育系统的荒诞模仿中，她所在牢房的“生活老师”——由民政部雇员担任的，中国教育系统中常见的“班主任”角色——秘密指派Vera担任“班长”的工作。“她让我监视其他人，” Vera回忆说。“我想尽办法不说牢房里其他人的坏话，但每个星期‘生活老师’都会问我她们的情况。如果有人上星期在遵守规则或背诵汉语方面做得不好，我就会说某某某生病了。”

生活老师要求所有被拘留者每周写一份自我检讨，或“思想报告”。Vera回忆说：“这些是营地生活中最可怕的时刻。”她知道自己必须表现出每周都“有进步”，否则她将永远不会被允许离开，但如果她承认过多的思想罪行，可能会导致被判刑。“每月一次，生活老师会安排我们与监狱长交谈一小时。你必须告诉他你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他接着会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会说，‘我用过VPN，我现在明白了这样做会破坏国家安全。’他会说，‘好好想想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从你内心最深处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把你

⁵⁰ 《新疆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

而不是其他人关进来？告诉我们原因。你爱我们的国家吗？’这种高强度的质问，即使现在想起来都让我发抖。”

回到牢房后，Vera会帮她的维吾尔和哈萨克狱友写“思想报告”，不过她每次都要换着花样来写她们的“潜在罪行”。但她们不懂汉字，也不知道该对生活老师说些什么，所以她们甚至没有机会见到监狱长。

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Vera变得越来越沮丧。她从班长的职务上被撤下来，因为她拒绝举报一名传字条的被拘留者。几个男性看守进来迅速带走了这个维吾尔人，她们再也没有见到她。他们坐在塑料凳子上时，电视里播放的一年级水平的汉语课程、吃饭前被迫唱的党国国歌、无脑背诵的守则，成为营地里无穷无尽循环着的背景音效。“在那里最可怕的事情是不知道你何时，甚至会不会被释放。”Vera说。

在美国，Vera的母亲Caiyun Ma越来越绝望。她了解到医疗和教育机构的权威有可以抗衡警察的力量，所以要求我用大学信笺写一封信，证明Vera是一名优秀的学生，而且现在她错过了在西雅图的课程。她还从Vera在俄勒冈州的医生那里获得了一份文件，表明Vera在一年前罹患癌症后健康状况仍然十分脆弱。翻译好文件并加盖官方印章后，她把文件寄给了她的前夫，Vera的父亲。身在奎屯的他感到非常害怕，但还是将这些信送到了再教育营。

被拘留了几个月之后的一天，警察用带刺刀的枪指着周月明的后背，把她押出再教育营。他们将她双手铐在背后，把她塞进一辆冰冷的小巴。过了感觉是几个小时的时间之后，他们摘下了她的头罩，把她拉

进一家医院，让一名医生给她做了粗略的检查。随后看守又把她带回了营地。最初看来，我们试图让对方担忧“非正常死亡”（中国当局禁止被拘留者死亡⁵¹），并暗示有违反“严格保密”规定的可能（营地的法外状态属于机密，严禁泄露）的计划，失败了。

过了大约一个月，毫无预兆地，Vera和其他几个狱友一起被释放了，条件是她们要定期向当地维稳工作人员报到，并且不能试图离开她们所在的街道。当她在所在街道办事处下了小巴车，她的假释官说：

“‘哦，我们终于把你弄出来了。’我想，‘她怎么能这么说？她是把我抓进去的人之一，现在却假装是我的朋友’”。

假释官要求Vera每周一去参加街道举行的升旗仪式，通过高声歌唱中国国歌和宣誓来承诺她对中国政府的忠诚。到这个时候，小城里关于因网络犯罪导致被拘留的事情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人们知道了网上行为会被新安装的自动网络监控系统监视到⁵²。和其他人一样，Vera也调整了她的网上行为。每当监视她的维稳工作者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贴文，她总是第一个点赞并转发。像她认识的其他人一样，她开始通过积极宣传国家意识形态来“传播正能量”⁵³。

⁵¹ 朱海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工作的意见”，自治区机关发电，2017年，<https://www.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6558509-China-Cables-Telegram-Chinese.html>（中文）。

⁵² “新疆一男子被拘留15天，只因他在朋友圈说了这些话...”，北疆播报，2019年8月2日，<https://archive.fo/I4gSg>（中文）。

⁵³ 达伦·拜勒，“Sealed Doors and Positive Energy”（封上的门和正能量），SupChina，2020年3月4日，<https://supchina.com/2020/03/04/sealed-doors-and-positive-energy-covid-19-in-xinjiang/>（英文）。

回家后，她觉得自己变了很多。她经常想到在营地看到的那数百名被拘留者，担心他们中的许多人永远也不会被放出来，因为他们不懂汉语，而且一生都信奉伊斯兰。她说在营地的那段时间也让她怀疑自己的理智。“有时我会想：也许我不够爱我的国家，也许我只为了自己着想，也许我不够小心。我想我们多多少少都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也许我没有帮助党和国家，我只是帮助了我的家人，我没有尽自己的责任。”

但她也知道，她的遭遇并非因为她做错了任何事情，而是伊斯兰恐惧症被制度化后集中在她身上的结果。虽然她可以假装成汉人，但她现在总是思考那个“假如…”。她非常肯定：由于维吾尔和哈萨克族在种族、语言和宗教上的不同，他们正遭受着不可估量的残酷虐待。相比之下，像她这样的回族人已经算容易的了。

她注意到她的父亲也更加谨慎了。以前他会和当地的维稳官员争吵，现在他总是热情地跟他们打招呼。在他们来巡视她的进展时，“他总是附和他们，”她记得，“他跟他们说‘学习对她有好处’”。

在Vera被带到营地之前，像所有2500万新疆永久居民一样，她已经接受过一个名为“全民体检”的生物识别数据收集过程。警察扫描了她的脸和虹膜，记录了她的声音特征，收集了她的血液、指纹和DNA——并将这些精确的高保真数据存入一个巨大的数据集⁵⁴中，用于绘制一幅该地区人口行为的地图。他们还拿走了她的手机，对手机和她的社交媒体账户进行扫描，查看是否有有关伊斯兰的图像、与外

⁵⁴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上千万居民被采集DNA”，人权观察，2017年12月13日，<https://www.hrw.org/zh-hans/news/2017/12/13/china-minority-region-collects-dna-millions> (中文)。

国人的联系以及其他“极端主义”的迹象。最后他们把手机还给了她，但删除了所有像Instagram这种美国制造的应用程序。

很快地，她开始想办法绕过检查站。由于她可以冒充汉人，讲标准的普通话，她会直接告诉安检人员自己忘了带身份证，并写下一个假的号码。有时她会像汉人一样通过检查站的出口，即“绿色通道”，而不理会警察。但是有一次和朋友去看电影时，她忘记了假装自己是汉人。在影院的检查站，她把身份证放在扫描器上，眼睛对准摄像头，警报立刻响起，商场的协警随即将她拉到一边。她的朋友消失在人群里之后，Vera疯狂地操作她的手机，删除社交媒体账户以及那些可能因与她有关系而被拘留的联系人。“我那时候意识到，有朋友真的不安全，从此之后我一直呆在家里。”

最终，像许多曾被拘留者一样，Vera被迫从事无偿劳动。她家所在街道的派出所所长得知她曾在美国上大学，便要求她的假释官指派她给他的孩子们辅导英语。“我想过让他付钱给我，”Vera回忆说，“但我父亲说我必须免费辅导。他还让我给他们带吃的，以表示他有多么渴望讨好他们。”那位派出所所长从未提过任何形式的报酬。

作为一个不自由的工人，Vera被孤立起来，被区别对待。她成了一个保姆。当那个派出所所长在再教育系统工作时，她负责照顾他的孩子。

2019年10月，假释官告诉Vera，她对她的进步感到满意，她被允许回到西雅图继续接受教育。不过她必须签署保证书，保证不说出她所经历的事情。假释官说：“你父亲有一份好工作，很快就会退休。你要记住了。”

回到疫情下的美国，Vera开始继续她在华盛顿大学的学业。在她缺席的两年里，她的朋友们——其中大部分也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已经毕业离开了。她年轻的生命中有一段是空白的。她一遍又一遍告诉自己，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不是她的错：“这事没有任何道理，它是随机的，没有任何道理。”

第二章 电话灾难

2005年，15岁的凯赛尔（Qeyser）第一次见到电话。在他的村子，移动电话比固定电话来得更早，这在发展中国家很常见。“我看到的第一部电话是村里工作大队副书记的翻盖电话，”凯赛尔回忆说，“它很简单，在我看来却非常复杂。它有那么多数字和字母。我想，‘他是怎么同时打电话和写字的呢？’”这一刻深深地印在了凯赛尔的记忆里。它标志着未来正向维吾尔村子走来。为了寻找信号，党委书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凯赛尔和其他孩子也跟着他走来走去。“他会大声地对电话那头的人说话，表演得很夸张。整个过程就像魔术一样。然后他会打开扬声器，我们所有人就都开始大声地与远处另一端的人说话。”

2007年村里连上了固定电话。有能力负担这项服务的人开始安装“家庭电话”，并向邻居们收取使用费。“许多人利用他们的家庭电话来赚钱，”凯赛尔回忆说，“他们会向使用电话的人收费。一分钟一角钱；五分钟五角钱。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如果你去朋友家，碰巧他们家有电话，我们会把电话举到耳边听里面的声音，或者扮作是重要的老板假装打电话。非常搞笑。”

到了2008年，手机基站的基本服务信号传到了村里，许多人，包括凯赛尔的家人，都买了一个简单的诺基亚。那时的手机只是用来打电话的，而不是用来上网的。“没有人懂得发短信。在2010年3G到来之前。大多数人不知道如何发送或接收信息和图像。”他回忆说。

直到凯赛尔在乌鲁木齐上大学时，他才第一次在一家烟雾缭绕的网吧了解到社交媒体。他在一排排四四方方的台式电脑显示器上访问了QQ，这使他有发展出一个线上人设（persona）。QQ模仿了MySpace和脸书（Facebook）的一些功能，是第一个让他们尝试社交网络的平台。“每个人都想做一个主页，向世界展示他们是谁。”凯赛尔回忆说。“我们选择了很多图片，上面有漂亮的人和美丽的地方，代表我们的希望和梦想。”在城市里，维吾尔年轻人在这些通宵达旦的咖啡馆里花了无数时间玩电脑游戏和泡QQ聊天室。但电脑仍然不是主流。相反，互联网只是少数移民和城里人刚开始探索的东西。由于输入维吾尔语阿拉伯字体的软件仍然在开发之中，而且只有极少数维吾尔人接受过键盘输入的训练，所以互联网和它所提供的所有知识仍然遥不可及，它们只能借助汉语作为媒介进入维吾尔人的视界。

2009年春末，QQ和人人网（另一个受Facebook启发的中文社交媒体）上开始流传一些维吾尔工人被施加私刑的图片、视频和文字信息。作为政府劳动力转移计划的一部分，这些工人被迁到中国东部的一家工厂。他们遭到的袭击在新生的维吾尔互联网上产生了短暂的病

毒式传播与轰动⁵⁵。维吾尔人涌入网吧观看照片，并对政府的不作为发表激烈的看法。学生们挥舞着中国国旗组织了一次游行，要求当局逮捕那些在视频中杀害了几名并殴打了十多名维吾尔人的汉族工人。最终，警察向抗议者开枪，引发了全市范围的骚乱。两天的时间里，130多名汉人被维吾尔移民殴打致死。第二天，当武警和军队进入城市时，战斗已经发展到用菜刀、削尖的棍子、从人行道上翘起的砖头进行的手刃战，警察只是站在一旁观看，导致数十名维吾尔人被汉族移民殴打致死。晚上，目击者听到警察的枪声在维吾尔人聚集区的街道上空回荡。

随后几周里，警察抓走了数千名被指控参与暴乱的维吾尔人。地方当局还切断了整个地区的互联网。在九个多月的时间里，该地区的通信受到严格限制，直到2010年年中互联网才恢复。而现在，新的3G网络使该地区乡村里数百万维吾尔人能够上网。因为中国制造的智能手机设计直观物美价廉，使没有受过技术培训的农民能够开始探索和交流。

腾讯公司开发的一款名为微信的新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极大地加速了人们成为数字人的过程。这个应用程序结合了WhatsApp和推特（Twitter）的一些功能，后来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拥有约12亿用户。由于脸书和推特以及其他非中国应用程序在2009年被全国范围内封锁，维吾尔族网民就将他们的在线交流集中在微信上。由于他们可以在微信上发送维吾尔语语音信息，维吾尔语

⁵⁵ 瑞秋·哈里斯（Rachel Harris）和阿齐兹·艾沙·艾尔肯（Aziz Isa），“Invitation to a Mourning Ceremony: Perspectives on the Uyghur Internet”（‘哀悼仪式的邀请’：关于维吾尔互联网的观点），Inner Asia, 2011年，27-49页。

键盘和缺乏打字训练不再是一个问题。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人购买了智能手机，并每天使用微信来建立熟人网络。他们还发现，使用语音信息功能使他们至少可以部分地在中国国家当局的审查能力之外⁵⁶进行维吾尔语对话。

维吾尔、哈萨克和回族人开始利用微信群讨论宗教文化知识、政治事件和当地社区以外的商机。短短几年时间里，当地和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如土耳其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线上伊斯兰教师在维吾尔微信社区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的要旨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教的虔诚上。他们描述了什么类型的实践是清真的，以及人们应该如何穿着和祈祷。根据学者瑞秋·哈里斯和阿齐兹·艾沙·艾尔肯的说法，绝大多数通过智能手机开始学习伊斯兰的人⁵⁷，仅仅对怎样成为一个当代穆斯林感兴趣，他们认为被政府审查的国营清真寺中缺乏这种指导。

与凯赛尔年龄相仿的维吾尔移民青年利用微信寻找经济机会，关注伊斯坦布尔盖茨公园抗议活动的消息，并加入伊斯兰虔诚运动。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城市里难以找到稳定的工作，但微信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社区网络，让他们在其中找到了社会角色。由于微信的语音功能不需要很高水平的计算机知识，加上数据计划相对便宜，智能手机的使

⁵⁶ 达伦·拜勒，“I Researched Uighur Society in China for Eight Years and Watched How Technology Opened New Opportunities—Then Became a Trap”（我在中国研究维吾尔社会八年，看着技术如何打开新的机会—然后变成了一个陷阱），The Conversation, 2019年9月18日，<https://theconversation.com/i-researched-uighur-society-in-china-for-8-years-and-watched-how-technology-opened-new-opportunities-then-became-a-trap-119615>（英文）。

⁵⁷ 瑞秋·哈里斯和阿齐兹·艾沙·艾尔肯，“Islam by Smartphone: Reading the Uyghur Islamic Revival on WeChat”（智能手机上的伊斯兰：读懂微信上的维吾尔伊斯兰复兴），中亚调查（Central Asian Survey）38，no. 1，2019年，61-80页。

用开始塑造他们日常生活的基本结构。起初，他们中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透过伊斯兰恐惧症的有色眼镜，在当地和全国范围内发生的零星暴力袭击和抗议活动可以被理解为宗教虔诚的产物。当时与我交谈的许多维吾尔年轻人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在网上拥有的相对自由，主要源于国家当局和中国科技行业无力评估维吾尔人口头和书面的言论，而不是前者对后者握有更大自决权发出的邀请。

反恐人民战争

中国当局和许多非穆斯林公民对这种网络现象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维吾尔人改变了的外表和实践，如年轻人留胡子和每天祷告五次，是他们所谓的维吾尔民族“极端化”的标志。国家当局开始将暴力事件，例如在西南城市昆明发生的被称之为“中国的911”⁵⁸的自杀式袭击，与一些政府官员告诉我的“塔利班化”进程⁵⁹联系起来。同样，媒体对“伊斯兰国”崛起的报道也让当地官员感到了迫在眉睫的威胁。为了回应，中国当局宣布了他们所谓的“反恐人民战争”⁶⁰。他

⁵⁸ 江林森 (Jonathan Kaiman) 和安玲 (Tania Branigan) , “Kunming Knife Attack: Xinjiang Separatists Blamed for ‘Chinese 9/11’” (昆明持刀袭击事件: 新疆分离主义分子为‘中国的911’背上罪责) , 卫报, 2014年3月2日,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mar/02/kunming-knife-attack-muslim-separatists-xinjiang-china> (英文)。

⁵⁹ 达伦·拜勒, “Ghost World” (幽灵世界) , Logic magazine, 2019年5月1日, <https://logicmag.io/china/ghost-world/> (英文)。

⁶⁰ 蒂莫西·格罗斯 (Timothy Grose) , “Once Their Mental State Is Healthy, They Will Be Able to Live Happily in Society” (一旦他们的心理状态健康了, 就能在社会上快乐地生活) , 中参馆 (ChinaFile) , 2019年8月2日, <http://www.chinafile.com/reporting-opinion/viewpoint/once-their-mental-state-healthy-they-will-be-able-live-happily-society> (英文)。

们开始使用反叛乱技术⁶¹，一种强调大规模情报收集的军事行动模式，去评估维吾尔、哈萨克和回族人口，他们认为这些人群中充满了隐藏的恐怖分子。

中国国家当局开始传阅一份列有75个伊斯兰极端主义特征的清单⁶²。诸如存有宗教内容的电脑文件、使用VPN、或安装了WhatsApp（一个在2014年被脸书收购的加密社交媒体平台）都被归类为可以导致拘留的“潜在罪行”。由于WhatsApp是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使用最广泛的应用程序，当局认为使用该应用程序的维吾尔人正试图在中国互联网的审查和监控系统之外与穆斯林世界接触。最初，国家没有能力检测这些技术的使用情况，所以许多维吾尔和哈萨克人即使听说了这些禁令的宣布，也认为它们不会被执行。他们认为这些禁令会像其他许多法规一样，宣布了但不会被实施。但是随着“人民战争”的展开，国家当局开始将网络空间的监管工作外包给私营公司。

在广泛流传的新闻报道中，巨型零售平台阿里巴巴（它还是业界领先的人脸识别公司旷视科技Megvii的早期投资者，我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讨论该公司的崛起）讨论了它如何通过对话、流量、购物、约会、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语言和声纹检测的算法评估，在打击国内“恐怖主义”威胁中扮演了新的角色。阿里巴巴与语音识别公司科大讯飞（iFlytek，数字取证公司美亚柏科Meiya Pico和烽火通

⁶¹ 达伦·拜勒，“Preventative Policing as Community Detention in Northwest China”（中国西北地区作为预防性警务工的社区拘留），Made in China Journal，2019年10月25日，<https://madeinchinajournal.com/2019/10/25/preventative-policing-as-community-detention-in-northwest-china/>（英文）。

⁶² 识别宗教极端活动（75种具体表现）基础知识”，中共新疆统一战线工作部，2017年，<https://xinjiang.sppga.ubc.ca/chinese-sources/online-sources/identifying-religious-extremism/>（中英文）。

信FiberHome的重要合作伙伴)一起指出,他们的西方同行亚马逊和谷歌,已经在美国版的反恐行动中对其穆斯林公民进行着监视。他们说,在打击中国国内的穆斯林恐怖主义战争中,现在是他们发挥类似作用的时候了。

中国的科技公司利用了中国国家安全部——中国版中央情报局(CIA)——在911之后建立的名为“金盾”的情报主导型警务项目。但他们也注意到爱德华·斯诺登披露美国政府的PRISM大规模数据分析项目,该项目从美国 and 全球社交媒体收集和评估数据,以建立监视名单。他们开始调整美国政府承包商的技术,比如Palantir(一家收集和评估社交媒体数据以实时监视平民的数据分析公司)⁶³,以适应中国西北地区的情况。

中国科技公司还从中国经济向公私合作模式转变的趋势中得到了优势,人们认为公私合作模式比依靠毛泽东时代的国有企业更能应对经济和政治挑战。在反恐人民战争开始时,他们向中央和地方政府推销了他们的监控“解决方案”。到2017年,中国政府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的各种基础设施项目中向公私伙伴关系投资了超过18万亿元人民币(2.6万亿美元)。根据一些估计,中国安全技术行业作为一个整体达到了将近7000亿元人民币(1000亿美元),其中超过50%⁶⁴集中在国内安全工程项目。

⁶³ “曹巍组团四大超炫硬科技CEO,解锁软着陆是能力还是态度”,蓝驰论坛,2017年8月28日, <https://bit.ly/2Rp8G84> (中文)。

⁶⁴ “鸟瞰人工智能应用市场—安防行业研究分析2017”,亿欧智库,2017年9月,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820001947/http://img1.iyiou.com/ThinkTank/2017/HowAIBoostsUpSecurityIndustryV6.pdf> (中文)。

在新疆，国家授予私人合同⁶⁵约4500亿元人民币（650亿美元）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向该地区政府实体授予了1.1万亿元人民币（1600亿美元）的合同，比2016年增加了50%。这些新的投资使其成为全国最大的国家资本受益者之一⁶⁶。虽然部分建筑支出的增长与安全无关，但新疆国家支出的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建设拘留设施及相关的基础设施上⁶⁷。国家承包商还利用这些资金为该地区的监控系统和穆斯林“再教育”运动开发新工具⁶⁸。尽管国家在2017年底时冻结了一些项目的资金，但到2018年，单是新疆安全和信息技术市场就增长到了约550亿元人民币（80亿美元），有近1400家私营公司在竞争这些利润丰厚的合同⁶⁹。

⁶⁵ “Banking Body Prepares List of PPP Projects in Xinjiang（银行业机构编制新疆PPP项目清单）”，中国日报，2017年2月24日，<https://archive.fo/qWSo4>（英文）。另见李肇华（Joshua Chin）和林和（Liza Lin）《Surveillance State: Inside China's Quest to Launch a New Era of Social Control》（监控国家：中国寻求开启社会控制新时代的内幕），St. Martin's Press，2021年。

⁶⁶ “新疆216个PPP项目落地 落地项目数居全国第二位”，人民网，2017年11月4日，<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428213003/http://www.csjrw.cn/2017/1114/72190.shtml>（中文）；Ben Dooley，“Chinese Firms Cash in on Xinjiang's Growing Police State”（中国公司在新疆日益增长的警察国家中套现），法新社（AFP），2018年6月27日，<https://www.afp.com/en/chinese-firms-cash-xinjiangs-growing-police-state>（英文）。

⁶⁷ “关于2017年自治区预算执行情况和2018年自治区预算草案的报告”，新疆自治区财政厅，2018年2月3日，<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312143344/http://www.xinjiangnet.com.cn/2018/0203/2044552.shtml>（中文）。

⁶⁸ “新疆安防市场爆发，业绩拐点已现”，国金证券，2018年3月12日，http://pg.jrj.com.cn/acc/Res/CN_RES/STOCK/2018/3/12/604dacbe-8f48-4847-958a-bfafcd09c3af.pdf（中文）。

⁶⁹ 米建华和达丽雅·彼得森（Dahlia Peterson），“China's System of Oppression in Xinjiang: How It Developed and How to Curb It”（中国在新疆的压迫制度：它是如何发展的，以及如何遏制它），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2020年9月，<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chinas-system-of-oppression-in-xinjiang-how-it-developed-and-how-to-curb-it/>（英文）。

在整个中国经济中，公共服务广泛的私人承包在技术部门中尤其是人工智能方面造成了一种市场结构，其中企业的增长与国家驱动的基础设施项目密切相关，而这些项目利用技术来实现政治目的。正如马丁·贝拉加（Martin Beraja）、杨宇凡（David Y. Yang）和诺姆·余契特曼（Noam Yuchtman）通过对中国公共治安中使用私人技术的一个大规模研究表明，国家资本对数据密集型技术的投资⁷⁰对于专注于图像和人脸识别的私人电脑视觉（Computer-vision）公司的成功至关重要。在研究中，他们“通过在获得公共安全合同（数据丰富和数据稀缺）的公司之间进行软件生产增长的对比”，证明了“获得政府数据造成的因果效应”，进而也证明了这种市场结构的经济效果。最终，他们表明，中国的科技产业是通过用在监控项目上的国家资本来塑造的，尤其是新疆的监控项目，而且在一个迭代的过程中，更是由中国其他地区和新丝绸之路上建造的监控系统来塑造的。这正是中国科技公司在面部识别技术方面能够超越很多欧洲和北美公司的原因。

检查站

在这些系统被设立的同时，反恐人民战争也愈演愈烈。最初，该运动部分依赖于愿意举报其他网络用户的网民。地方当局每次对“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或分裂主义”网上行为进行的刑事定罪，承诺奖励举报

⁷⁰ 马丁·贝拉加，杨宇凡和诺姆·余契特曼，“Data-Intensive Innovation and the State: Evidence from AI Firms in China”（数据密集型创新和国家：来自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证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NBER Working Paper）No. w27723，2020年，<https://www.nber.org/papers/w27723>（英文）。

者约2000元⁷¹。即使后来国家开始雇用数据警察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查，这种人对人的公民治安制度⁷²也仍然在继续。

对于像凯赛尔这样的维吾尔年轻人来说，“人民战争”似乎与他无关。随着他对互联网技术的熟练运用，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他敞开大门。社交媒体使他能够逐渐养成一个成熟的城市人设，并开始影响周围的世界。“我非常喜欢微信，”凯赛尔回忆说，“你可以看到别人的朋友圈，你可以在微信群里聊天。你可以发送视频，或者与任何人视频通话，无论他们在哪里，只要他们也上网。”渐渐地，在他的LG智能手机上，凯赛尔的数据计划每月花费高达200元——比他每月花在食物或衣服上的钱多得多。他还开始在微信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作为学生制作的短视频。他最受欢迎的影片爆红，观众人数超过80万。像许多维吾尔年轻人一样，他开始将微信视为他在维吾尔世界里的社会角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虽然凯赛尔确实发布了一些可能给他带来麻烦的政治内容，但作为一个被学校管理人员紧盯着的学生，他不敢用手机来学习伊斯兰教。

“我从来没有在微信上学习过《古兰经》，但我知道我们村子里很多人都学过，”他回忆说，“很多人还在手机上下载或分享伊斯兰教义（tabligh）。我在别人的电脑上看过一些关于维吾尔政治的视频。有时我们会用程序上YouTube，我们没有意识自己在身后留下了一串痕迹，没有意识到这非常危险。我们只是想看维吾尔人的新闻，或者土

⁷¹“新疆喀什警方开通网上暴恐音视频信息举报平台”，中国新闻网，2014年9月15日，<https://archive.vn/be7Va>（中文）。

⁷²“新疆查处多起传播暴恐音视频、宗教极端思想案违法信息案例”，新疆日报，2017年4月17日，<https://archive.vn/WVKQE>（中文）。

耳其电视节目，或者关于维吾尔族历史的东西，只要它们不是由中国政府写的。”

2014年秋天，凯赛尔的校领导召开大会，要求所有学生交出手机。凯赛尔被吓坏了，由于他在微信上分享了一篇关于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⁷³的新闻报道（因为发表了批评中国对维吾尔土地进行殖民统治的政策建议，这位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被判处无期徒刑）。

“我只是假装镇静，但心跳个不停。幸运的是，检查我微信的老师并没有仔细看。但是另一个朋友被拘留了，因为有人给他发了关于2009年抗议活动的东西，而他并没有删除。他在拘留所呆了九个月，被酷刑逼供，承认了所有被指控的罪行。我想他现在被关在营地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2015年访问凯赛尔的村子时，当地警察要叫解锁手机，让他们查看里面的内容。他们翻阅了我的照片和微信，但似乎不知道如何操作WhatsApp或脸书APP。他们似乎也没有注意到我安装的VPN。刷了几分钟，他们把手机还给了我，确信我只是一个持有效签证居住在新疆的研究人员。

到了2016年，智能手机的检查变得更加先进。“警察会命令我们从车上下来，”凯赛尔告诉我，“有新疆户口的人要排队进检查站刷脸，然后警察会叫我们拿出手机，插进一个扫描仪进行检查。”

⁷³ 达伦·拜勒，“Ilham Tohti's Sakharov Prize and the Desecration of Uyghur Society”（伊力哈木·土赫提的萨哈罗夫奖和被亵渎的维吾尔社会），SupChina，2019年11月6日，<https://supchina.com/2019/11/06/ilham-tohtis-sakharov-prize-and-the-desecration-of-uyghur-society/>（英文）。

凯赛尔说，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时，他假装手机没电了。也许因为他看起来像一个没有信仰而世故的大学生，警察没有检查就放走了他。

“朋友告诉我，他们能够找到你很久以前就删除的文件。”于是，如果知道自己必须通过检查站，他就不再携带手机。他还买了一部新的iPhone，听说这种手机更难被工具扫描。就在所有维吾尔人被迫将护照交还给当局“保管”，以及当局开始大规模拘留像Vera这样的“前恐怖分子”之前的几个月，我协助凯赛尔制定了离开中国的计划。

到达安全的北美之后，凯赛尔得知他的兄弟和几十个亲戚被一起送进了一个新的营地。“我的许多邻居都被拘留了，因为他们在手机上收听了伊斯兰教的信息，或者分享了系统认为是‘分裂主义’的故事。大多数年轻人被拘留是因为参加过宗教聚会或祈祷，或用手机听了些东西。我母亲称这是‘电话灾难’（telepon balasi）。”

数字围墙

包围着维吾尔、哈萨克和回族生活的数字监控和围墙系统将智能手机变成了跟踪设备。这个系统始于2005年2G手机网络的建设，后来扩大到数字覆盖（digital overlays），使科技公司和国家当局有能力以越来越密切的方式观察和控制人们的移动和行为。正如通信学者马克·安德烈耶维奇（Mark Andrejevic）就监视资本主义系统在北美的运作方式所指出的那样，数字围墙并不只限于蜂窝网络的基站⁷⁴。相反，随着GPS追踪能力被植入智能手机和自动生物识别系统，“物联网”

⁷⁴ 马克·安德耶维奇，“Surveillance in the Digital Enclosure”（数字围墙里的监控），Communication Review 10, no. 4, 2007年，295–317页。

开始评估人们的运动模式。数字围墙因此成为了一个多维、复杂的矩阵。

在Vera的家乡和凯赛尔的村子，中国移动手机网络为微信使用者提供服务，他们的用户活动被跟踪并被提供给中国当局，后者使用关键字搜索来过滤群聊和私信。

与手机上应用程序相连的百度地图系统使用GPS追踪用户的行动。而这些数据通过检查站的人脸扫描和身份证检查得到验证。如果这还不够，使用人脸和身份证扫描的方法，通过国家承包商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建造维护的检查站数据门⁷⁵，可以确保智能手机被登记到脸或身份证刚被扫描的人身上。在交通繁忙的城市地区，地方当局则使用由中国多家领先的摄像头和人脸识别公司⁷⁶（如商汤科技Sensetime、海康威视HikVision、大华科技Dahua、依图科技Yitu和其他公司）建造的实时牌照和人脸追踪摄像头系统。

通过使用插件对智能手机的软件和内容历史进行自动评估，永远在线的互动式监控系统由这些强行采集的数据所补充——这是凯赛尔力图避免的类型。对穆斯林家庭的检查使用金属探测器来扫描未经授权的电子设备。当地情报人员还利用银行记录、病例和户籍数据进行档案的评估。所有这些不同形式的信息加在一起，产生了一个规模和深度都前所未有的数字围墙。

⁷⁵ “中国的算法暴政”，人权观察，2019年5月1日，<https://www.hrw.org/zh-hans/report/2019/05/02/329384>（中文）。

⁷⁶ 达伦·拜勒，“中国西北地区‘再教育’技术的全球影响”。

Vera的营地附近有一个叫沙湾的县级城镇，与凯赛尔的村子隔山相望，国家当局在那里开始建造一个“平安城市”系统⁷⁷。这个项目，以及新疆各地都在建设的类似项目，致力于使该镇和周边县市登记的个人都能被系统搜索到。外来人员和观察名单上的人的任何活动，都会由系统自动提醒警方。

该系统，至少在它被提出时，由旷视科技的一个名为Face++的算法支持。该算法被设计用来评估车牌一类的物件信息，但也能被训练识别人脸，甚至与人相关的身体特征或衣帽首饰。平安城市系统根据这些标识符，连同收集的其他社会数据，追踪人类行为信息，如“通信行为、住宿行为、迁移行为、金融行为、消费行为、驾驶行为和行政违规行为。”所有这些数据加在一起，为每个人和他们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建立了一个具体的数字画像。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理清了每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典型行为模式。在评估穆斯林时，它监测他们的行为和关系，为了发现任何偏差的迹象。该系统的准确性取决于人像识别和比较技术，对已经捕获的图像进行图像分析——该系统类似于美国警察部门使用的Clearview AI软件⁷⁸。在清真寺和公共汽车站

⁷⁷ “新疆沙湾县智慧（平安）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国政府采购网，2017年，10页，<https://www.chinafile.com/library/reports/xinjiang-shawan-county-smart-safe-project-feasibility-study>（中文）。

⁷⁸ Ryan Mac, “Clearview’s Facial Recognition App Has Been Used by the Justice Department, ICE, Macy’s, Walmart, and the NBA”（Clearview的面部识别应用程序已被司法部、移民局、梅西百货、沃尔玛和NBA使用），Buzzfeed, 2020年2月27日，<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ryanmac/clearview-ai-fbi-ice-global-law-enforcement>（英文）。

等“高风险”地区，它使用实时视频分析——类似于日本公司NEC在伦敦提供技术支持的视频监控试点项目“Prevent（预防）”⁷⁹。

虽然西方和中国的警察系统有一些相似之处（例如西方的警察系统也会对少数民族造成不成比例的过度伤害），但它们也有很大的区别。在新疆，摄像头网络密集得多，而且有检查站和数据监控的支持；在一项综合性的“公共卫生”倡议下，该地区每个居民都向当局提交了他们的生物识别数据⁸⁰。因为训练其算法的数据集所具有的保真度和规模，新疆当局的工具更加精细和具有侵害性。由于当局强迫所有新疆居民登记领取国家颁发的新身份证，使他们得以建立一个包括每一个人脸部的高清图像基础库，此外他们还收集了数千万张通过检查站的居民的脸部图像。Face++和类似的算法，如依图（YITU）和商汤（Sensetime）等公司的算法，运行速度极快。正如沙湾研究报告所指出的，它在0.8秒内可以对多达30万个目标人物进行一次人脸匹配⁸¹，并登记和记录通知警报。如果技术人员愿意多等0.2秒，它可以对近50万人进行这种操作。

⁷⁹ Sean Gallagher, “London to Deploy Live Facial Recognition to Find Wanted Faces in a Crowd”（伦敦部署实时面部识别技术，在人群中寻找被通缉的面孔），科技艺术（Ars Technica），2020年1月28日，<https://arstechnica.com/information-technology/2020/01/london-to-deploy-live-facial-recognition-to-find-wanted-faces-in-crowd/>（英文）。

⁸⁰ 黄瑞黎（Sui-Lee Wee），“China Uses DNA to Track Its People, with the Help of American Expertise”（在美国专家的帮助下，中国利用DNA来追踪其人民），纽约时报，2019年2月21日，<https://www.nytimes.com/2019/02/21/business/china-xinjiang-ughur-dna-thermo-fisher.html>（英文）。

⁸¹ “新疆沙湾县智慧（平安）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89页。

围墙系统的大部分设计和执行被描绘成是为了创造更高的治理效率。从2018年开始，沙湾行政系统过渡到以智能手机为主导的数字模式⁸²。一系列基于智能手机的面部识别技术使这个系统能够跟踪个人行为。它从一个以人脸扫描为中心的国家颁发的照片身份证系统开始。到2018年年中，更换丢失身份证的申请已经可以在线上用智能手机摄像头扫描申请人的脸部⁸³来完成。为了获得社会保障福利⁸⁴，沙湾居民被要求使用一个新的人脸扫描应用程序。为了通过社区检查站⁸⁵，居民需要安装另一个面部识别应用程序。甚至农村的农民工作大队⁸⁶也安装了一个，以监测村民的工作效率。所有这些数据都被整合到更广泛的平安城市系统中。

在许多情况下，新技术似乎受到了欢迎。例如，沙湾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将人脸扫描技术当成一种便利和安全来做广告宣传。但它也似乎给一些居民带来了不便。例如，沙湾警方提到需要对系统进行“调试”，使所有合法居民都能在检查站被自动识别，而确保政府和技术公司人员不需要进行人工手动检查。

⁸² “着力打造‘最亲民’服务窗口”，工人时报，2019年5月24日，<http://archive.fo/mPF40>（中文）。

⁸³ “新疆户籍居民身份证丢失补领可网上自助办理了！附操作指南”，沙湾县公安局，2018年10月12日，<http://archive.vn/a6Rhm>（中文）。

⁸⁴ “戳一下，请了解‘新疆智慧人社’APP待遇领取资格认证详细操作流程”，沙湾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8年，<http://archive.fo/lbdk>（中文）。

⁸⁵ “好消息！沙湾这8个小区正式实行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啦！”，沙湾金盾，2018年，<http://archive.fo/Hao1B>（中文）。

⁸⁶ “沙湾县：合作社拓宽致富路 小农户迈向大农业”，沙湾零距离，2018年12月14日，<http://archive.fo/aXIVS>（中文）。

数据警察

该系统遇到的大部分困难似乎来自于操作和执行该系统所需的工作。所有复杂数据密集型系统的数据都需要人类劳动力进行微调。学者 Lilly Irani 将这些技术人员描述为“数据清洁工”⁸⁷。沙湾平安城市系统和其他地区的数据清洁工由九万名协警⁸⁸组成，是2017年初在整个地区雇用的。这些被授权的情报工作者——就像那个在小巴后座看着 Vera 的年轻人——并没有像国家警察那样接受过正式培训。他们中大多数人无权携带枪支。在中国其他地方，他们只被称为“保安”，但在这里，他们拥有支配穆斯林生活的权力。很多这种低级公职人员是从穆斯林人口中雇佣的。此项工作的基本资格⁸⁹是有“放心的”家庭背景，积极反对“民族分裂和非法宗教活动”，以及基本的汉语知识。“援疆”人员（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政府“志愿者”，负责教育穆斯林儿童或者为受过再教育的被迫劳工建立工厂）的配偶和子女尤其被鼓励申请此工作。

到2017年年中，这些协警开始在全区范围内使用美亚柏科、烽火通信和其他数字取证公司制作的AI自动恢复工具检查人们的设备⁹⁰。所有

⁸⁷ Lilly Irani, “Justice for Data Janitors” (为了数据清洁工伸张正义), Public Books, 2015年1月15日, <https://www.publicbooks.org/justice-for-data-janitors/> (英文)。

⁸⁸ 郑国恩和雷国俊, “新疆的安保化: 警察招募、非正式警务和少数民族的收编”, 324-348页。

⁸⁹ “沙湾县公安局招聘100名事业编制便民警务站工作人员”, 平安沙湾, 2017年8月22日, <http://archive.fo/sjWJJ> (中文)。

⁹⁰ 达伦·拜勒, “Chinese Infrastructures of Population Management on the New Silk Road” (新丝绸之路上的中国人口管理基础设施),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2021年。

这些信息都被输入一个统一的联合行动平台，该平台根据可疑行为的模式⁹¹，向当地警察部门“推送”观察名单上的名字⁹²。数据警察的工作是利用这些工具执行抽查，其核心是主动对路人进行特征分析，拦下凯赛尔这样明显是穆斯林的年轻人，要求他们出示国家发放的身份证，解锁手机，通过间谍软件和外部扫描设备自动进行检查。协警还负责监视固定检查站的人脸扫描机和金属探测器。所有这些活动保证了穆斯林居民继续为这个系统构建数据集，使极端主义的评估算法越来越精确。他们正在建立一个新的民族/种族变体，即学者萨丽塔·阿姆鲁特（Sareeta Amrute）所说的“种族即算法”⁹³——将突厥穆斯林的社会生活变成与“潜在犯罪”行为数据集相匹配的代码。通过数据检查被确定为“不放心”的穆斯林被送往拘留所，被审问，被要求承认潜在犯罪行为，并供出同样“不放心”的其他人。

奇台镇位于沙湾正东370公里处。奇台的协警中有一个名叫巴依木拉提（Baimurat）的年轻哈萨克男子。他是2016年底当地雇用的第一批协警中的一员。他越过边境逃到哈萨克斯坦后接受了哈萨克倡议组织Ata Jurt的采访，他说由于他是大学毕业生，所以“被认为很有资

⁹¹ “中国的算法暴政”。

⁹² Yael Grauer, “Revealed: Massive Chinese Police Database” (揭秘：庞大的中国警察数据库)，拦截 (The Intercept)，2021年1月9日，<https://theintercept.com/2021/01/29/china-uyghur-muslim-surveillance-police/> (英文)。

⁹³ 萨丽塔·阿姆鲁特 (Sareeta Amrute)，“Bored Techies Being Casually Racist: Race as Algorithm” (无聊的科技人员作为随便的种族主义者：种族即算法)，科学、科技与人文价值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45, 5, 2020年, 903-933页。

格”⁹⁴。因此他得到了协警最高级别的工资，每月约7000元，远高于约2000元的最低工资。他同组的其他人，由于教育背景而被认为资格不够，工资不到2700元。对于在此之前一直苦苦找工作的巴依木拉提来说，这份工作是他无法拒绝的选择。他不仅能够养活家人，而且还能保护他们不受再教育制度的威胁。“我们发了制服，”他说，“然后开始做不同类型的训练。非常严格，就像在准备打仗一样。”

作为清除地区行政部门里所谓的“两面人”（公开拥护党而暗中怜悯和支持穆斯林的人）过程的一部分，奇台当局用来自中国其他地区忠诚的国家雇员替换了主要领导层。奇台县公安局长被一个新的警察指挥官取代，他是一个来自东部福建省的汉族男性，名叫陈祖华⁹⁵。地区政府安排同样来自福建的人员负责改造当地教育系统，并在该县建设一个工业园区，在这里维吾尔和哈萨克人将在强迫劳动合同下工作。在国家媒体的一篇凸显这位新指挥官“铲除邪恶”的英雄气概及其生平的报道中，有张照片显示他站在审讯室里，旁边是一把“老虎凳”——一种使嫌疑人无法动弹的酷刑装置。

地方当局开始建造便民警务站，Vera会在其中之一的屏幕上看到自己。作为平安城市网格的一部分，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这种监控中心。当局接着将协警划分开来，让他们进驻奇台县所建九十二个站点之一。在沙湾，一个类似的过程在七十七个站点⁹⁶之间进行。

⁹⁴ “Сұмдық СҮХБАТ Terrifying Interview”，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2019年1月11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8rVTEStmY8>（哈萨克语）。

⁹⁵ “援疆干部风采录”，昌吉公安，2019年12月25日，<https://archive.vn/tFO2N>（中文）。

⁹⁶ “沙湾县公安局招聘100名事业编制便民警务站工作人员”。

“我们必须一直坐在那里监视屏幕，”巴依木拉提回忆说，“如果漏掉一个警报或眼睛离开屏幕，我们会受到惩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做的监视工作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根据他们的汉语能力和忠诚度的证明，协警会被分类。“他们让我们做各种练习，比如背诵营地系统的守则，”巴依木拉提说，“我们必须背诵与法律有关的各种东西。营地墙壁上有习近平的语录，我们也必须熟记这些内容。背不下来的话，就不能出去巡逻。”

“我在那里工作了六个月后，他们分发了检查行人和汽车司机的仪器，”巴依木拉提回忆说，“当我们用它扫描他们的身份证（和电话）时，能得到关于这个人的各种信息，比如是否曾经戴了面纱，是否安装了WhatsApp，是否到过哈萨克斯坦，诸如此类的事情。”

他们开始执行夜间检查。如果被检查的人应该被拘留，仪器就会闪烁红色。“我们可以在街上拦下任何车辆进行检查。当我们截停他们时，会要求车里的人出示手机和身份证。如果有像之前提到的可疑情况，我们需要汇报（给领导）。”

起初，巴依木拉提和同事们认为，尽管工作时间长，而且被安排在充满对抗性的位置上，但当协警仍然“是一份好工作”，有稳定的薪水，而且可以免受警察骚扰。他们认为自已站在“好人”一边。不过，在他们收到手机扫描仪和巴依木拉提得知哈萨克中学被变成监狱的时候，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他们在哈萨克学校建了一道铁门，高高的电栅栏，还有四个瞭望塔，”他回忆说，“如果我们通过身份证检查发现任何可疑状况，他们会把他们送到哈萨克学校。他们突然把它变成了一个监狱。他们强迫所有去过清真寺、做祷告或戴头巾的人进那所学校。”

巴依木拉提在理论上是一名按合同聘用的临时工。但在新工作开始六个月后，他得知自己不能随便辞职。“如果我们累了想辞职，他们会告诉我们：如果你累了，可以休息一下，不过之后你必须回来。如果你真的离开工作，那么你也会被关进‘再教育营’。”当他第一次看到营地内发生的事情时，他明白了这种威胁的实际含义。

“2018年初的一天，工作时我们开了一个会，我们被告知需要将一些被拘留者从监狱转移到学校，”他平静地说，“我们有那么多的手铐。我们到那里的时候，看到他们抓了大约六百人。那座建筑内有一些房间就像牢房一样。我看到被拘留者中有非常年轻的女人，有非常年长的女人，还有留着胡子的男人（超过五十五岁）。他们都是少数民族，大多数是维吾尔人，还有一些哈萨克人和一些回族人。我不认为有汉族人。也许有一两个，但不会超过这个数目。”

“我们给他们戴上手铐和脚镣，并给了他们毯子，不管他们能不能抱得住，然后叫他们上车。我不得不给一个似曾相识的人戴上手铐，然后意识到他也曾是一名协警。我以前在工作时见过他。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但我认识他。我真的很想问他发生了什么，但因为摄像头，我没有问任何问题。当时我想也许以后可以问他，但从未找到机会。”

“然后我们开始运送妇女。突然我听到非常尖锐的叫声。我看到一个满头白发八十多岁的老妇人。她在被戴上脚镣和手铐时尖叫起来，因为她的腿受伤了。他们就这样把她拖到了巴士上。当我看到这一幕时，感到非常难受。我想退出。我对成为一名警察感到后悔，我身上

的每一根纤维都在后悔。我在心里哭泣。”说这话时，巴依木拉提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过了一段时间，当他感觉安全时，向另一个哈萨克协警询问他认出的那个人。同事告诉他，那人来自农村，不懂闭路电视的工作原理。他在监狱工作时看到地上有一张纸，上面写着“救我出去”的字样。他没有报告这件事，但摄像头看到了，所以他被带去“学习”。巴依木拉提意识到，任何哈萨克或维吾尔人都可能被送进再教育营。不管如何努力，在监视系统面前没有人是安全的。“我对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感到非常难过。很多人犯了非常小的过错，就被关进了再教育营。作为警察，我们有必须完成的工作。有时候领导说做这个，有时候他们说做那个。我们每天都必须按他们说的来做。”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压力让巴依木拉提疲惫不堪。“我们无法入睡，”他摇了摇头说，“我们总是在哭，我和我的妻子。但我们没让其他人看到我们哭泣，因为他们可能会认为我们很危险，可能会告发我们。”

平安城市

在沙湾，随着平安城市项目的实施，一个类似的过程也在展开。2017年4月7日周末，沙湾县领导参加了一个会议，陈全国在会上宣布正在进行的“去极端化”运动有了新的开始。干部们表示，他们将再下决心，“坚决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渗透”。到2017年8月，县监狱

被扩建，正式变成了“集中管控教育培训中心”⁹⁷。到2019年底，一个可以容纳超过七千人的拘留所已经建成。

自2017年以来，新疆受害者数据库记录了来自沙湾的一百多份证词⁹⁸，分别来自曾被拘留者以及当前被拘留者和囚犯的家属。在一些案例中，他们说被拘留是因为持有护照或使用了非法APP。而频繁地访问清真寺——沙湾平安城市项目中大部分人人脸识别摄像头的位置——则是最常被给出的理由。

在沙湾研究报告中，评估人员认为该项目将“极大地提高当地政府快速应对重大事件的能力，并确保经济的建设”。同时，他们还表明该项目将促进私人商业投资，并通过保护私人财产提高社会安全。“间接的经济效益是不可估量的”⁹⁹，他们写道。

2017年4月，在新的“应收尽收”运动被确立和评估人员提交报告的几个月后，塔城县委书记薛斌¹⁰⁰访问了沙湾，参观了该运动的各种设施。他参观了公安局的指挥中心，视察了新的平安城市系统。他讨论了加强对清真寺和宗教领袖的“教育和管理服务”。他强调了“学转

⁹⁷ Shawn Zhang, “Satellite Imagery of Xinjiang Re-education Camp no. 83” (新疆再教育营第83号的卫星图像), 2019年5月18日, <https://medium.com/@shawnwzhang/satellite-imagery-of-xinjiang-re-education-camp-83-377e9453db7a> (英文)。

⁹⁸ “按出生县划分的受害者”，新疆受害者数据库 (Xinjiang Victims Database), 2021年, <https://shahit.biz/cmnl/#map> (中文)。

⁹⁹ “新疆沙湾县智慧(平安)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国政府采购网, 2017年, 6, 183页, <https://www.chinafile.com/library/reports/xinjiang-shawan-county-smart-safe-project-feasibility-study> (中文)。

¹⁰⁰ “2017年4月24号沙湾新闻”，沙湾新闻, 2017年4月24日, <http://archive.fo/bhPnC> (中文)。

促”专项活动，并指出：负责农村监控的干部“发挥好考核指挥棒的作用……严明驻村纪律”方面的角色。

沙湾和奎屯都是小城镇。我在2015年访问时，被它们显露出的一致普通所震撼。它们都由灰色混凝土公寓楼组成，建立在以一个广场、一个市场和一个火车站为中心的网格上。这里每个人都相互认识。如果在城镇边缘建起了再教育营，几千名穆斯林消失在其中，他们肯定会知道。如果一个新的工业园区被建成，更多的穆斯林被迫在那里工作，他们也会知道。如果几十个监控中心被建立，每人都必须进行人脸扫描，他们也会注意到。正如一句维吾尔谚语所说：所有这些就像我手上的五个手指一样明显。

和该地区的每个县一样，平安城市项目包围了沙湾。从手机上的APP，到家门口，再到清真寺和火车站，沙湾居民的生活都被严密监视着，并被与他们的面孔相匹配的数字代码所整理和组织。这些代码是灵活的围墙和监视系统——它们可以被打开和关闭，其灵敏度可以手动调整。它们只在地区内联网上的协警之间流传，而协警本身也受到该系统的监视。

正如沙湾研究报告所指出的，监控系统的核心是确保“有益的”货物、服务和生物识别数据的流动，同时引导或阻止可能破坏这种流通的物体、身体和数据的流动。其目的是在国家支持的市场经济中增加被认为是“好”东西的流通，同时减少被认为是“坏”东西的流通，比如犯罪和不可被同化的身体。这项技术的塑造能力被用来控制人群，以降低非穆斯林的恐惧感，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并为当局提供更大的权力。对于像凯赛尔的家人和像巴依木拉提这样的低级数据清洁工来说，他们担心自己会意外地触发系统，或者担心有人在任何时候

打开开关来针对他们，对他们来说平安城市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深深的恐惧和彻底丧失的权力。它把智能手机的便利变成了一场灾难。

平安城市的控制社会通过技术来维持权力关系，使生活变得可预测。它的作用还不止于此。当技术开始代替人们思考时，它对生活的控制就开始被正常化。当思考的空间在一个复杂自动系统的黑匣子里消失时，它就会变得平庸且残酷，并产生一种深远的制造残忍的能力。

第三章 两面人

2017年2月，在再教育营系统迅速启动，拜木拉特开始从事协警工作的同时，遍及整个新疆的学校教师被征召进入营内当教官。其中一位教官是名叫凯尔比努尔·塞迪克（Qelbinur Sedik）的穆斯林妇女，她原本在乌鲁木齐一所小学教五年级学生汉语。凯尔比努尔的父母分别是维吾尔族和乌兹别克族政府官员，他们意识到不被官方识别为维吾尔族是一种相对的保护，因此在她的出生证上登记为乌兹别克族。作为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汉语教育的少数民族，凯尔比努尔顺势所趋进入了教育行业。1992年从地区师范学院毕业后，她开始在乌鲁木齐的一所小学任职。

因为在学校担任高级职务，所以当2017年春节假期后收到新任务时，她感到很惊讶。“2017年2月26日，我们开始了新学期，”她回忆说，“校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要我去参加一个会议。”凯尔比努尔说。那个会议上，区党委办公室书记没有提供太多细节。凯尔比努尔和其他参加会议的教师只是被告知，当局集中了一群“没受过教育的人”。他们的责任是教他们汉语。这群“没受过教育的人”在山上一栋政府办公楼里。凯尔比努尔被告知，她必须签署一份“承诺书”，

承诺会教他们六个月。然后他们给了她另一份文件，声明如果她将所见所闻透露出去，那么她必须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和必要的惩罚”。“他们强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我们不能拒绝或要求离开，”她回忆说，“否则我们会受到惩罚。”凯尔比努尔不需要向学校任何人说起这次会议的内容，似乎每个上级领导都知道这个任务是怎么回事。“第二天，当我离开学校时，我的教学任务已经分配给了其他人。”

像整个地区几乎所有维吾尔人一样，凯尔比努尔其实已经听说过这些所谓的“没受过教育的维吾尔流动人口”，他们早在2015年就被送往再教育营。第一次听说时，她觉得听起来很可怕，但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因为她是个讲汉语、有着安全的乌兹别克身份的城市妇女。为新任务做准备时，凯尔比努尔想起了一位来自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靠近凯赛尔南疆农村老家的县）的妇女告诉她的事。这位妇女是她在同一所小学任教的老师，从学校毕业后搬来了乌鲁木齐。每年暑假她都会回老家。

2015年，这位女士从老家回来后非常伤心，在办公室哭了两个小时。“她告诉我，‘经常祈祷的人，穿长袍的人，还有阿訇，都被拘留了’，”凯尔比努尔回忆说，“阿瓦提是一个大县，而且是维吾尔族人口最多的县之一。‘但是’，她说，‘街上一个维吾尔男性也看不到了。’”

她同事的三个兄弟都被带走了。其中一个因为他虔诚地实践伊斯兰教义，另一个因为有人指控他去清真寺做主麻日礼拜，第三个原因不明。“他们把所有人集中在一个大礼堂里，”她告诉凯尔比努尔，“警察带着武器。他们的名字被点到，罪行和判决依次被宣读。然后

警察就给那个被点到的人头上套上黑色塑料袋，把他们一个一个带走。”多年后想起这件事，凯尔比努尔回忆说：“当她说完，我们所有人都跟着她一起哭了。”

然而她也记得，生活似乎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我们感到很震惊，但随着时间过去，我忘记了这次谈话。我以为乌鲁木齐永远不会变成那样。”但是，当官员们告诉她她被分配去教“一群没受过教育的人”时，她同事讲的那个故事又涌上心头。“我想这一定是类似的事情，因为他们一直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不允许告诉任何人”，她回忆说，“所以我怀疑我要去的正是同事之前提到的那种地方，但我试图把这个想法从脑海中赶走。”

第二天，凯尔比努尔带着一种恶心的感觉被接到了“集中管控教育培训中心”，那些被改造成“智能”营地的政府大楼显然与她同事所描述的一模一样。

“到达大楼时，我觉得来到了一个监狱。那是一座四层楼的建筑，周围有铁丝网¹⁰¹。我们刷身份证进入大门。通过院子时，我感到非常紧张。院子里有汉族警察和手持冲锋枪的士兵把守。”凯尔比努尔回忆起自己当时在想：“我必须非常小心，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

有很多东西需要慢慢消理解。时间似乎既在加速又在放慢，但那天的画面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完成登记后，我环顾四周，注意到墙上的标语，上面写着‘打击宗教极端思想，防范宗教思想渗透’。”

¹⁰¹ “Saybagh Facility #1”（沙依巴克1号设施），新疆数据计划，2021年，<https://xjdp.aspi.org.au/map/?marker=3298>（英文）。

她花了一些时间理解营地的布局。现在当她在脑海中重建这个大院时，她仍然可以生动地描绘每个房间。“当我进入大楼时，右边有四名警察和通往二楼的楼梯，”她告诉我，“左边有七八间办公室。其中有一间是警察指挥中心，一间警察宿舍，一间医务室，还有一间是治安联防队工作人员的办公室。”

这个细节很重要，因为这说明民政部（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负责实施社会服务并支援警察）实际上负责监控被拘留者的进展状况。凯尔比努尔告诉我：“来自治安联防队的10名年轻女性轮流协助营地工作。她们中五人完成一个班次后，另外五人接替。职责包括向被拘留者分发馒头，并将他们的行为记录在数字档案上。”

随着凯尔比努尔领会了再教育营的氛围，她作为营内工作人员的角色也开始了。营地里的其他穆斯林工作人员开始向她展示如何按照系统的标准行事。“一位警官把我带到他们的办公室，”她回忆说，“在那里我见到了一位名叫马希拉（Mahira）的维吾尔族官员。她说她认识我，她的孩子是我学校的学生。我想向这位女士询问更多有关营地的信息，但她暗示我不要再问。她只是说‘往上看’，于是我发现有摄像头对准了我的脸。我明白了就没再问什么。她问：‘你准备好开始上课了吗？’我没有任何选择，就说‘准备好了’。”

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正被营地的“智能”摄像头监视着，凯尔比努尔跨过了一道即将改变她一生的门槛。“我拿着书和水瓶，盯着那道铁门，看到了一生都不会忘记的画面。铁门打开，被拘留者戴着手铐走了出来。他们不得不一个个弯身从一条横在门上的锁链下钻出来，再走进教室。我一看到他们，眼里忍不住充满了泪水”。“学生”们坐

在塑料凳子上，凯尔比努尔得到了一张桌子、一张椅子和一块黑板供其使用。

“我一看到他们的脸，就崩溃了，”凯尔比努尔告诉我，“我向真主祈祷，让我不要在他们面前哭泣。我走到桌子前，不知道该做什么说什么。坐在我面前的有留着胡子的老人。他们看起来很可敬，就像你在清真寺里遇到的那种老人。”作为一个从小到大都被教导要尊重长辈的突厥穆斯林，凯尔比努尔面临一个选择：戴上“绝不留情”的汉语再教育系统的面具，或者暴露那个被教导要以礼貌和尊严对待他人的、更真实的自我，并冒着被贴上“两面人”标签的风险——由于他们对国家的忠诚一直受到质疑，这种威胁笼罩着所有穆斯林。

“我不假思索地说，‘安塞俩目阿莱依库姆’（Assalamu alaykum）’。”这是一句源自阿拉伯语的普通问候语，意思是“祝你平安”。她说完这句话，学生们都愣住了。“他们露出惊恐的神色，我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于是做了自我介绍，开始上课。我紧盯着黑板，没有回头去看他们的脸。我不敢转身，因为一些学生在抽泣，几个老人的胡须都被泪水打湿了。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整堂课都没有回头，只是不停地在黑板上涂涂写写。我讲了四堂课，但感觉好像花了四年时间。”

在这次接触中，凯尔比努尔无法面对被拘留者，无法直接见证他们的痛苦。不过，由于她对他们初始的认同——这认同通过清晰地说出一个被命令禁止的阿拉伯短语，以及她缺乏沉着的表现，甚至她背对着被拘留者的姿态表达出来，所以被拘留者可以明确地感受到，她把他人当做人，认为他们值得同情。在那个曝光的一刻，她的再教育面具脱落了，她成为了一个穆斯林两面人。

“课间我回到办公室，马希拉告诉我要小心说话。她说我应该只用汉语说‘学员们好’。我走到院子里，那里没有摄像头。营地主任是一个名叫卡德尔（Kadir）的维吾尔人，他身材高大，皮肤黝黑。他说：‘你要小心你说的话。你不能说‘安塞俩目阿莱依库姆’，会被当成是犯罪，你会因为说这句话被拘留。你运气好，今天是我另外两名警察在执勤。’”

卡德尔所表现出的对再教育营工作难度的认识，以及与她共通的穆斯林身份，使凯尔比努尔鼓起勇气询问被拘留者的情况。

“我问，‘这些都是什么人？’”

“他说，‘他们是阿訇和在清真寺工作的人。’”

“我说，‘我下次会小心的。’”

“他又重复，‘这次你运气好，因为我在监控室里。’”

“我问，‘那些学生是什么时候被抓进来的？’”

“他回答，‘2月14日。’”

“我问，‘他们犯了什么罪吗？’”

“他回答：‘没有，他们只是信教的维吾尔人。你要小心，在教室里，你头顶上就有四个摄像头。’”

在他的答复里，卡德尔想让凯尔比努尔认识到被拘留者和他们是不一样的，因为对方信教，所以理应受到惩罚。这个系统逼着他们漠视其

他突厥穆斯林被非人化，而卡德尔的言行一次又一次地突显了这一点。

凯尔比努尔在恍惚中度过了营地工作的第一天。这天结束后，警察把她送到城市的某个地方，她坐了几个小时的公交车才回到家。“我丈夫在家，他问我在再教育中心这一天的情况，”她回忆说，“他问，‘那些学生是什么人？’我哭得很厉害，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他很震惊，但我要他保守秘密。直到现在，连我的亲戚都不知道。”

凯尔比努尔开始逐渐适应在监控镜头前表演的压力。有一天上完课后，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被拘留者问他们是否可以再呆一小时。“我问‘为什么？’他说，‘对我们来说待在教室里更好过。’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她瞥见过他们牢房的内部。当时牢房里还没有安装亮光灯，光线非常昏暗，地板是光秃秃的混凝土。被拘留者在教室里可以坐在凳子上，但在牢房里，他们必须彼此紧贴着坐在水泥地上，每次都要坐好几个小时。未经允许，他们不得站起来或者躺下。

凯尔比努尔没有回答他，营地看守立即进来带走了他。凯尔比努尔说：“他们知道如果说话就会受到惩罚。”第二周，这个人没来上课，之后她再也没有见过他。那次事件之后，班上其他人除了用汉语回答课堂问题之外，再也没有说过话。

她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非人化的过程正在营地里展开。一周之内，被拘留者都被剃光了头。几周后，教室被改造成了牢房，以容纳数百名新的被拘留者。他们人数众多，以至于不得不轮流睡在水泥地上。他们极度恐惧，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时，声音都在颤抖。

采访到这里，凯尔比努尔泣不成声，用手擦拭着脸上的泪。“他们都很害怕。我在课堂上问问题时，他们不敢正视我的眼睛。一开始他们脸上还有些生机。但是一个星期后，男人的胡子和头发都被剃光了。女人一开始留着长发，一周后长发也被剃光了。他们的眼睛失去了活力。我不敢看他们，因为每次看到他们，我都忍不住伤心。到了晚上，我也无法入睡。刚要入睡，铁链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她被迫支持和实施的暴力，不仅影响了她的身体，也影响了她的自我意识。尽管她试图在“放心的”外衣下掩饰这一点，但最终这变得不可能了。在营地系统中运作的暴力将她消磨殆尽。对他人人格的侵犯导致她自己的尊严和自我价值感被侵犯。正如人类学家南希·谢珀·休斯（Nancy Scheper-Hughes）和菲利普·布古瓦（Philip Bourgois）所指出的，“暴力决不能仅仅从武力、袭击、施加的痛苦等物理性的角度来理解。赋予暴力以力量和意义的是暴力的社会和文化维度”¹⁰²。

在当代中国西北地区，穆斯林每天都会被公权力拦截、识别、拘留和审问。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遭遇是短暂的，很少有言语交流。代替他们发言的是他们的智能手机和生物识别跟踪档案（biometric tracking space）中存储的数码历史。如果这类“发言”被系统标记出来，可能会导致在便民警务站或更高级别的分局进行更正式的审问。

这种质询也发生在其他地方。在每周一的升旗仪式和互动式的政治教育课程中，他们的政治知识和忠诚度也受到检验。在工作中，会有人

¹⁰² 南希·谢珀·休斯和菲利普·布古瓦，《Violence in War and Peace: An Anthology》（战争与和平中的暴力：文集），布莱克威尔（Blackwell），2004年。

观察他们的行为，给他们指派任务。他们要时刻处于戒备中。这些过程导致了第二种、充满政治参与感的审讯，在协警和自己同事任意支配下，他们内化了这个过程。

迪迪埃·法西（Didier Fassin）在写到法国的少数民族和警察制度时指出：“他们明白，为了不被视为有罪，仅凭不犯错误是不够的……他们开始意识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与他们所做的事情无关，而是与他们所代表的东西有关¹⁰³。”正是通过这种臣服的过程，突厥穆斯林明白，在再教育时期，他们受制于系统的凝视。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举报者；没有人是必然的盟友；摄像头和扫描器背后的算法在不停地运作。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少数民族来说，似乎没有任何空间完全处于国家权力之外。这一点每天都在那一个个检查站，还有对他们的亲戚、邻居和朋友的恐惧中得到印证。最终对于被指派到系统内工作的穆斯林来说，那些被视为“不放心”的人所受的待遇也证实了这一点¹⁰⁴。营地的非人化作用，以及围绕着它们的社会和技术状况清楚地表明，任何穆斯林都可能被拘留。看到这种日常的国家暴力每天都在发生，人们意识到非人化不是随机的，而是与穆斯林所代表的东西有关。

像凯尔比努尔和拜木拉特这样的穆斯林，始终是潜在的“不放心”的人，与此同时他们的汉族同事似乎并没有感受到同样程度的危险。对

¹⁰³ 迪迪埃·法西（Didier Fassin），《Enforcing Order: An Ethnography of Urban Policing》（强制施行秩序：城市治安的民族志），Polity，2013年，7页。

¹⁰⁴ 乔安娜·史密斯·芬利（Joanne Smith Finley），“Securitization,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Xinjiang: Has PRC Counter-terrorism Evolved into State Terror?”（当代新疆的安保化、不安全感 and 冲突：中国的反恐演变成了国家恐怖主义吗？），中亚调查，38，no. 1，2019年，1-26页。

凯尔比努尔来说，这一点在一次事件中更清晰了。有一天她看到一个年轻女孩被人用担架匆忙抬走，脸色惨白。当晚凯尔比努尔乘车回家时，一位在营地教法律的汉族工作人员与她相伴了一段路。在相对安全的公交车后座上，这位老师转过头，低声问她是否也看到了那个女孩。“我说看见了，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凯尔比努尔回忆说。

“他告诉我，‘那个女人大出血，在去医院的路上人没了。’”和营地里所有女性一样，她被迫服用一种药来阻断月经。他直截了当地说：“营地里的女人必须吃药防止来月经，因为学校没办法提供足够的卫生巾。”

凯尔比努尔不知道怎么接话。她知道这并不是全部的事实。民政部在整个地区开始了“杜绝违法生育”运动。她本人当时四十七岁，被迫要定期对国家工作人员强迫她新植入的节育环¹⁰⁵进行检查。国家文件显示，没有做绝育手术，或者没有植入节育环并定期检查的育龄妇女将不被列入“放心的”公民名单¹⁰⁶。非法怀孕将被“及早处理”¹⁰⁷——指强制堕胎。民政部开始对举报违反计划生育的人给予奖励¹⁰⁸，奖金高达7000元。其他政府文件显示，被送往再教育营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

¹⁰⁵ “关于印发《古牧地镇2019年违法生育“两个彻查”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米东区政府，2019年7月21日，<https://archive.vn/iGaGS>（中文）；凯尔比努尔在Emma Graham-Harison和Lily Kuo的“Uighur Muslim Teacher Tells of Forced Sterilisation in Xinjiang”（维吾尔族穆斯林教师讲述新疆强迫绝育）中描述了她被强迫植入宫内节育器的情况。卫报，2020年9月4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sep/04/muslim-minority-teacher-50-tells-of-forced-sterilisation-in-xinjiang-china>（英文）。

¹⁰⁶ “《哈巴河县持续深入开展违法生育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政策解读”，哈巴河县政府，2020年6月26日，<https://archive.fo/7wyhZ>（中文）。

¹⁰⁷ 同上

¹⁰⁸ “巡视公告：阿克苏市举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行为‘两个彻查’的通告”，阿克苏市零距离，2019年5月11日，<https://archive.is/C97TN>（中文）。

分（可能占全部被拘留者的10%¹⁰⁹），是由于违反计划生育规定而被送往营地的。自再教育营系统启动以来，在南疆的一些地区，维吾尔人出生率急剧下降了50%至80%¹¹⁰，要部分归因于对穆斯林生育权的这些限制。

但是当时在公交车上，凯尔比努尔不知道能否信任这个汉族同事，所以只是点头表示她知道了。“我没有说话，但我内心很痛苦。他继续不停地抱怨。”他对她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我们许多‘学生’其实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有的是在韩国、美国、埃及、加拿大、土耳其、日本和哈萨克斯坦留学回来的。他们问的问题我甚至都答不上来。这难道不是二十一世纪吗？现在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他非常愤怒”。凯尔比努尔继续保持沉默，对他如此公开地提及过去集中营作为优生运动的一部分这样的世界历史事件感到惊讶。在营地工作的剩下时间里，他们再也没有谈论过这次共同的恐怖经历，只是继续做他们被要求做的事情。

事实上，许多参与再教育系统的汉族似乎对这场运动产生了一种赋权和投入的感觉。凯尔比努尔回忆起另一位汉族同事，他忘了她也有一半维吾尔血统，对她说：“现在维吾尔人就像苍蝇。如果愿意的话我

¹⁰⁹ “The Qaraqash List”（墨玉名单），墨玉公安局，2018年，https://shahit.biz/supp/list_008.pdf（中文）；另见斌吉恩（Gene Bunin），“The Elephant in the XUAR: III”（新疆的大象：3），Living Otherwise，2021年4月，<https://livingotherwise.com/wp-content/uploads/2021/04/Elephant-in-the-XUAR-III.-Gene-A.-Bunin.pdf>（英文）。

¹¹⁰ 李晓霞，“新疆地区人口变动情况分析报告”，新疆发展研究中心，2021年，<https://archive.is/OlvOg>（中文）；西格尔·塞缪尔（Sigal Samuel），“China’s Genocide Against the Uyghurs, in 4 Disturbing Charts”（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四张令人不安的图表），Vox，2021年3月10日，<https://www.vox.com/future-perfect/22311356/china-uyghur-birthrate-sterilization-genocide>（英文）。

们可以直接拍死他们。”她以前的一个学生告诉她，他哥哥在半夜被一群武警带走时，一帮汉族邻居聚集在公寓外的大厅里鼓掌叫好。

“他告诉我他们在喊：干得好！把他们都抓走！”学生问她：“老师，你总说所有民族都应该团结与和睦相处。但为什么一个维吾尔人被带走时，他们要鼓掌？”因为附近有监控，所以凯尔比努尔无奈只能对她的学生说：“不会的，你一定没听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他们不会这么说的。也许你哥哥是被送到某个地方接受教育。”凯尔比努尔记得看到这个10岁的孩子抽泣时，自己那种无助的感觉。孩子一边哭一边说：“不要骗我。他怎么会头上套着一个黑袋子去上学？如果对警察来说他只是个学生，为什么会那样抓他？我虽然小，但我不傻！”

自2014年发动“反恐人民战争”以来，汉族公民大多都拥护这一制度。在2020年的一次采访中，一位名叫孔元丰（音译）的汉族移居者告诉我：“因为他们拘留了很多人，很多对维吾尔族不了解的汉族移居者就认为，恐怖分子肯定无处不在¹¹¹。”

其他一些人抱怨安保制度扰乱了商业和建设。在2019年的一次采访中，另一位来自新疆的汉族妇女卢音告诉我，2017年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她的亲戚们经常抱怨那些检查站¹¹²。他们觉得难以忍受的是，坐

¹¹¹ 达伦·拜勒，“‘The Atmosphere Has Become Abnormal’: Han Chinese Views from Xinjiang”（‘气氛变得不正常’：来自新疆的汉人观点），SupChina，2020年11月4日，<https://supchina.com/2020/11/04/han-chinese-views-from-xinjiang/>（英文）。

¹¹² 达伦·拜勒，“‘Uyghurs Are So Bad’: Chinese Dinner Table Politics in Xinjiang”（‘维吾尔人太坏了’：新疆汉人的餐桌政治），SupChina，2020年6月3日，<https://supchina.com/2020/06/03/uyghurs-are-so-bad-chinese-dinner-table-politics-in-xinjiang/>（英文）。

公交进城时，所有人都得等着维吾尔人过安检。几个月后“情况有所好转”，因为公交车不再等过安检的维吾尔人了，会载汉族先走。

“最令我震惊的是他们（我的亲戚）变得如此明显的种族主义，”卢音告诉我，“他们谈话的主题有75%在诋毁维吾尔人。”卢音说这特别令人担忧，因为“当我2016年去的时候，这些话（漫不经心的种族主义言论）每天只出现两三次。现在人们每天提起二、三十次。”一到聊天间歇，她的亲戚和他们的邻居就会感叹：“维吾尔人太坏了！”然后开始谈论他们如何落后、暴力、忘恩负义。待在那里的几个星期里，她觉得“他们试图对所发生的事情（向她）进行辩护”。她听到他们说，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出手干预。他们告诉她，维吾尔人比电视上看到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中的非裔美国人要“糟糕得多”，所以营地和“再教育”工作是必要的。

汉族对参与再教育运动的保留意见主要是，做这项工作要牺牲很大一部分个人生活。那些被派到农村监视维吾尔和哈萨克族的人抱怨说，他们不得不适应新的环境。工作很枯燥，他们怀念城市生活的刺激，想念自己的家人。他们想回到自己在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中原本的官僚岗位，或者在国营机构中担任的医生或编辑的工作。接受我采访的其中两人告诉我，他们自己，或者他们那些同样被要求下乡的朋友，如果拒绝参加这个监视项目就会失去工作。但他们也说，参加监视项目并完成任务就可以保证得到晋升。不过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接受了

任务。他们觉得，在这个系统中工作，就是成为一个好公民的一部分¹¹³。

凯尔比努尔说，她觉得这个系统的“邪恶”已经渗入整个汉族群体，甚至开始感染她。有时，她对每天看到的痛苦感到麻木。但在她进入营内工作几个月后，另一个时刻提醒了她，对穆斯林的非人化是如何被正常化的。有一天她乘公交车穿过乌鲁木齐南边一个街区，坐在她前面几个汉族青少年把头探出车窗，对着街边几个维吾尔人大喊：

“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公交车辘辘往前，逐渐驶离那些维吾尔人，他们转向彼此开始讨论为什么那片街区的一些维吾尔人还没被带走。凯尔比努尔低头看着自己的脚，什么也没说。“我不敢说话，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对的。如果他们想的话，可以把我也抓走。他们被赋予了这种权力。”

智能营地

从北美拘留营的铁丝网和自动化武器¹¹⁴到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通行证和检查站，技术在人口控制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正如历史学家安·斯托尔（Ann Stoler）所表明的，在殖民背景下，对行为进行分类的技术具有使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正常化的效果，而且是以越来越

¹¹³ 达伦·拜勒，“China's Government Has Ordered a Million Citizens to Occupy Uighur Homes. Here's What They Think They're Doing”（中国政府命令100万公民占领维吾尔人的家。他们认为自己在做这些事情），中参馆，2018年10月24日，<https://www.chinafile.com/reporting-opinion/postcard/million-citizens-occupy-uighur-homes-xinjiang>（英文）。

¹¹⁴ 关于营地系统技术历史的更多内容，可见安德里亚·皮泽（Andrea Pitzer），《One Long Night: A Global History of Concentration Camps》（一个漫长的夜晚：集中营的全球历史），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17年。

贴身的方式¹¹⁵。在中国西北地区，用于遏制和改造穆斯林人口的“智能”监控系统的技术将这些管控系统的规模和强度提升到了新的水平。技术使原因和效果之间产生了距离。这可以掩盖或加强其效果。就像科学本身一样，它们提供了有局限的真理主张（truth claims）¹¹⁶，但人们往往愿意将其作为标准来接受。总的来说，它们加速了非人化的进程。

在再教育营中，无处不在的看守、自动摄像头和语音识别技术，部分地扩展了制度的平庸性（banality）¹¹⁷。在我对凯尔比努尔的一次长时间采访中，她回忆说，在进入营地的第一天，她对警察的驻扎和高科技安保感到惊讶。“看到那么多持枪警察，我感到非常吃惊。这其实是最早让我察觉到端倪的，这不是一所普通的学校。”她回忆说。

“那么多警察坐在前厅里，时刻准备应对任何突发事件。他们刚刚告诉我，我接下来要教的是一群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所以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拿枪是要保护学生。”

当一名政府工作人员打开一间牢房的门，让被拘留者去教室时，凯尔比努尔才意识到这些人是被拘留了，而她正身处在一个拘留营里。每个被拘留者都戴着手铐。“我当时意识到，内部文件中关于‘培训中

¹¹⁵ Ann Laura Stoler, 《Carnal Knowledge and Imperial Power: Race and the Intimate in Colonial Rule》（肉体知识与帝国权力：殖民统治中的种族和亲密关系），加州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0年。

¹¹⁶ 译注：在宗教中，真理主张是信仰系统认为是真的断言；然而，从信仰系统认为是真的断言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该断言是真的。（维基百科）

¹¹⁷ 译注：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是一个哲学术语，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价值判断权利放弃的恶。（百度百科）

心’的说法与营地的现实有巨大的差距。营地（的状况）是无法想象的。”凯尔比努尔告诉我。时任该地区最高级别安全官员的朱海仑的内部指示¹¹⁸要求看守不应携带致命武器，但凯尔比努尔说许多看守甚至在营地围墙内都带着枪。指示中说卫生应该是重点注意的问题，但凯尔比努尔看到基本的公共卫生都被忽视了。当“学生”无法对看守说出他们想听的东西，指示中没有提到可以殴打和折磨他们，但凯尔比努尔却经常看到它们的发生。

再教育营的设计是为了利用技术控制来制造一个关于营中情况的虚拟现实。这一点在营地看守检查凯尔比努尔的手机时表现了出来。“还没到达营地，警察就叫我们关掉手机，”她回忆说，“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不能接电话或打电话。到达后，他们强迫我们把手机放在办公室里。只有在离开营地后，才允许我们再次使用手机。”

后来这变成一个标准程序。每天早上警察来接她去营地时，她会关掉手机电源。只有一次，他们把她的手机插入一个类似于拜木拉特在奇台县使用的装置。“他们只是将数据线插进手机里，然后就把手机还给了我。我什么也没问，只是像其他人一样把身份证给他们，他们也扫描了身份证。”

在营地时，凯尔比努尔一直在留意摄像头的存在。她说：“在教室里，前面有四个摄像头，中间有两个，后面有四个。尽管灯光不是那么亮，但他们似乎可以看到我们做的每件事。”有一天，名叫卡德尔的高个子维吾尔营地管理者带她参观了“指挥中心”。该中心由多组电视显示器、一个有许多按钮的控制台、一个操纵杆和一个麦克风组

¹¹⁸ 朱海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工作的意见”。

成。四名看守昼夜轮流工作，监视屏幕。如果有被拘留者从地上站起来或者开口说话，“他们就会对那些被拘留者大吼。只要被拘留者动一下，他们就大吼：不准说话！不准说维语！”即使在微弱的光线下，也能看到高清的人脸，这一点让她感到很吃惊。即使在拥挤得不得不轮流睡觉的牢房里，每张脸都出现在屏幕上，就像微信视频通话里一样，只不过更清晰。一旦有人移动，他们的动作会被自动检测到。“他们做出任何姿势，摄像头都会捕捉到。例如，如果有人和别人说话，即使是半夜，看守也会通过对讲机对他们大吼。”她回忆说，更令人震惊的是，“警察可以点击那个人的脸，让它在屏幕上放大。”他们可以瞬间调出被拘留者的姓名和号码。你还可以使用该系统来搜索特定的被拘留者或群组。“例如，如果你想查看10号牢房，你只需要点击一下10号。”她说。

凯尔比努尔看到的指挥中心，指挥的是“智能营地”系统¹¹⁹——据科技公司大华说，该设施建立在“计算机视觉系统、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等技术之上。根据朱海仑批准的手册，营地要“健全外围隔离、内部分隔、防护防御、安全通道等设施设备，确保安检仪器、安防器械装备、视频监控、一键式报警等装置配备到位并发挥作用。¹²⁰”这个“智能”营地计划呼应了地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的愿景，

¹¹⁹ “大华专业行业智慧营区方案”，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https://archive.fo/cmQVs>（中文）；“航天华拓实力助攻新疆某营区信息化建设”，航天华拓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19月，<https://archive.fo/EOlix>（中文）。

¹²⁰ 朱海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工作的意见”。

即营地应“像学校一样教学，像军队一样管理，像监狱一样防卫¹²¹”。

根据私营监狱承包商来邦公司（Lonbon）的文件，整个维吾尔地区的监狱系统都安装了人脸识别和所谓的“情绪或情感识别”技术¹²²。凯尔比努尔所描述的她在乌鲁木齐的再教育营里看到那个系统跟来邦和大华系统的大部分参数都吻合。在其最精细的形态中，这些系统声称能够通过高清摄像头持续评估面部表情来监测囚犯的情绪状态。这些系统用交替执行“强制中断”和“文化编程”的办法来“消除囚犯的意识形态问题”¹²³，前者中断的是囚犯被推断出的精神状态，后者确保“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进行思想改造”。

除了“智能”监控外，该营地还具有高度警戒监狱的所有特征。“从外面看，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拘留营，”她回忆说，“只有当你走进大院里，才会意识到它是。当你进到大楼里，这是一个拘留营的事实就确凿无疑了。每层楼之间的楼梯口都有一个铁丝网围栏。”她还记

¹²¹ Ben Dooley, “Inside China’s Internment Camps: Tear Gas, Tasers and Textbooks” (中国拘留营内部：催泪瓦斯、电击枪和教科书)，法新社，2018年10月25日，<https://www.afp.com/en/inside-chinas-internment-camps-tear-gas-tasers-and-textbooks> (英文)。

¹²² “来邦监仓可视对讲系统在新疆七所监狱中标！”来邦，2017年11月21日，<http://archive.fo/571tE> (中文)。

¹²³ “智慧监狱系统开发解决方案，新疆智慧监所可视化系统平台建设”，源中瑞吴顾问，2021年4月13日，<https://archive.fo/pSgA0> (中文)。关于在新疆拘留营使用情感识别的更多信息，见Jane Wakefield, “AI emotion-detection software tested on Uyghurs” (在维吾尔人身上测试AI情感检测软件)，BBC，2021年5月26日，<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57101248> (英文)。

得当时心想，这里密不透风得连一只蚊子也逃不出去。“它看起来就像那种拘留危险罪犯的监狱，就像我在美国电影中看到的那种。”

让她确定这是一个拘留营的不仅是视觉景象，也不仅是铁链的声音、金属门的哐当回响，甚至不仅是教室里传出的反复唱颂的汉语和爱国歌声。这些声音在她身边萦绕不去，但能够完整传递出再教育营的可怖残酷性的是从审讯室传出的声音。“有时我们能听到第一营被拘留者的尖叫声。”她说，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我问卡德尔主任，他们用什么方法来审讯被拘留者。他说有一把老虎椅，一顶电击帽，和电击手套。午饭时，我能听到尖叫声。”

两面人

在新疆再教育系统里，突厥穆斯林协警和营地教官往往被视为既必不可少，又可有可无；既值得信任，又不可信任。拜木拉特和凯尔比努尔都不被允许对他们在系统中的角色有任何一点偏离，除非他们准备好付出巨大代价。被贴上“两面人”标签的威胁¹²⁴始终笼罩着他们。他们说，被置于这种位置上给他们生活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由于抑郁症、缺乏睡眠和食欲，凯尔比努尔的血压低到有危险。她设想了自杀的场景。她把药片放在枕头边，如果警察半夜来了，就立刻吞下去。由于无法走路，担心自己可能中风了，她被允许去就医。拜

¹²⁴ 买买提明·阿拉 (Mamtimin Ala), “Turn in the Two-Faced: The Plight of Uyghur Intellectuals” (交出两面人：维吾尔知识分子的困境), 外交家 (The Diplomat), 2018年10月12日, <https://thediplomat.com/2018/10/turn-in-the-two-faced-the-plight-of-uyghur-intellectuals/> (英文)。

木拉特也感到了类似的压力。由于晚上无法入睡，他和他的协警同事只能以喝酒来应对，甚至在执勤的时候也不例外。

最终，在哈萨克斯坦政府官员的协助下，拜木拉特利用自己哈萨克斯坦公民的身份和国际关注的威胁，放弃了中国公民身份，逃到了哈萨克斯坦。而凯尔比努尔，由于健康状况不佳获许退休。她觉得是由于官僚主义的疏忽，她的护照才被返还给她，并被允许到欧洲探望女儿。在对他们的生活进行制度性干预之前，当局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他们，如果拒绝参与再教育营系统的工作，他们同样会被拘留。

营地中的许多画面继续在拜木拉特和凯尔比努尔的脑海中反复播放。所以当它们最终到了安全的地方时，拜木拉特和凯尔比努尔觉得别无选择，必须把他们曾经被迫参与的事情讲出来。

对他们来说最关键的瞬间，是认识到自己是作恶者，或者不得不背叛自己的尊严感的时候——也就是必须证明自己不是“两面人”的时刻。对于拜木拉特来说，他真正意识到自己作为协警把人送进再教育营的严重性是当他看到维吾尔和哈萨克妇女，包括年老体弱者，排着队被装大巴时。当看到自己的同事和家人被戴上镣铐抓走时，他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也可能成为再教育系统的目标。同样，当凯尔比努尔认识到自己也在参与对其他突厥穆斯林的非人化时，她只能转过身抽泣，即使摄像头拍到了她的情绪反应。虽然在扮演协警和教师的角色时可以躲在“放心的”面具后面，但他们永远无法完全摆脱穆斯林的身份。他们的生命故事和突厥人的脸部表征事先定义了他们——他们的民族特点总是将他们置于种族化分类的可疑之列（racialized category of suspicion）之中。

这些认知发生的瞬间呼应了社会理论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在20世纪60年代描述的一个瞬间：一个法国白人儿童指着法农——一位口才出众的法国演讲家和精神病学家——宣布：“瞧，一个黑鬼！”¹²⁵在对这一瞬间的分析中，法农展示了种族化是如何通过对族群-种族差异本身的评估来实现的。一个种族化的殖民凝视决定了他者的物理外观及文化身份，使其成为只要殖民权力结构仍然存在就无法克服的东西。无论被殖民者将殖民者的语言说得多好，在法国殖民背景下也就是戴上法农所说的“白色面具”，被殖民者总被认为是残缺的人和潜在的他者——“两面人”。即使被殖民者试图通过模仿殖民者——把自己当成有权获得警察和法律保护的未被标记的主体——来摆脱与其他被殖民者的联系，这些保护也会在一瞬间被夺走。对于拜木拉特和凯尔比努尔来说，当他们在以前的同事和邻居眼中看到自己的身影时，再教育的“放心的”面具就滑落了。

在印度殖民地背景下考虑法农的去殖民框架时，霍米·巴巴（Homi Bhabha）研究了殖民力量展开复杂统治战略的方式。他发现，一个翻译阶层对这样的体系至关重要。在这种体系的逻辑中，活动于被殖民的庶民和殖民地官员之间的翻译阶层，会借用文化上的区隔和殖民者的价值观。然而，正如霍米·巴巴所展现的，翻译员的杂合形象永远无法完全占据这一角色。相反，翻译员仍然是一个矛盾的形象。作为被允许存在版本的“他者”，他们产生了一个霍米·巴巴所说的“殖民者在场的片面幻象”（partial vision of the colonizer's

¹²⁵ 弗朗茨·法农，《黑皮肤，白面具》，译林出版社，2005年。

presence)。由于残留的种族特征痕迹，这些翻译员注定永远停留在模仿的阶段里¹²⁶，稍有不慎就会立刻受到谴责。

拜木拉特和凯尔比努尔的故事既普通又特殊。虽然也许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营地里的突厥穆斯林工作人员都经历过类似的极端精神压力，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无法脱离这个系统。相反，他们一直被镶嵌在这些流放地之中，不能公开说话，甚至不能不加掩饰地哭泣。

拜木拉特和凯尔比努尔都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营地中某些方面的暴力变得正常化了。他们越来越难以对所看到的事情感到惊讶。非人化暴力的正常化似乎是拘留营系统中的普遍现象，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

共同经验的那些瞬间是权力得以展现的瞬间。受到被拘留者目光的呼唤这样极度负面的经验显示了殖民国家的权力。同时，积极见证的瞬间，在他人身上认识自我并分享他们的痛苦的瞬间，也可以产生“去殖民化拒绝”（decolonial refusal）的种种形式。这些类型的瞬间永远改变了拜木拉特和凯尔比努尔的生活。作为一个民族志学者，我关注的正是这些类型的瞬间。收集和翻译它们，可能可以塑造这个世界见证突厥穆斯林的苦难的方式。有一句维吾尔族谚语很好地描述了这种去殖民化的冲动：“滴水成湖”（维语：tama-tama köl bolar）。

我在2018年去新疆实地调查时采访的一位维吾尔妇女告诉我，她认识的许多协警都有自杀的念头。另一些人告诉我，他们在再教育系统内

¹²⁶ 霍米·巴巴（Homi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文化的定位），Routledge，2012年。

工作的亲属晚上回家时经常哭泣。凯尔比努尔说，自从那天背对着被拘留者在黑板前哭泣，她每次吃馒头时都不能不想起被拘留者挨饿的境遇。“我一看到下雪，就忍不住要哭。因为我想到了他们，我想到他们在冰冷的牢房里受冻的样子。”

第四章 牲口

2017年年中，一位名叫阿迪尔贝克（Adilbek）的哈萨克农民从哈萨克斯坦回到中国。在此之前几个月，他和妻子及孩子刚刚搬到哈萨克斯坦。为了最终完成搬迁，他需要把从当地劳动大队租来的一百多只羊围起来，再交接给大队。他家在乌苏，离Vera的家乡只有30多公里。在他到家的第二天，当地警察来拿走了他的护照。他解释说自己只是临时返回，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将大队的羊赶到一起，并将近800公顷的山地牧场移交给新的业主。“我解释说，我的妻子和孩子已经是哈萨克斯坦公民，我也打算成为哈萨克斯坦公民，”阿迪尔贝克回忆，“我说我准备好了就会来拿护照。”

在完成赶牲口的工作和商业交易之后，阿迪尔贝克回到警察局想要回护照。对方告诉他，他需要到不同的政府机构分别盖六个公章。“于是我就去一个个盖了，”阿迪尔贝克说，“然后他们说你实际上需要盖七个章，还说必须再从头开始。于是我又从头开始，然后他们说没有必要让你参与，我们会帮你办，办好了就给你打电话。”这时由于北京在召开十九大，全国各地的政府机构都暂停服务，所以地方当局告诉阿迪尔伯克，五十天之内都办不了他的护照。

从表面上看，阿迪尔贝克似乎卡在了制度的繁文缛节之中。但他发现，有另一种更险恶的力量在发挥作用。他被归类为“不放心的极端分子”。在盖第二个章的时候，警察给他打了电话，说要继续办理的话，需要带他去医院做健康检查。他感觉有点不对劲。对方没有告诉他他被逮捕了，但拿走了他的鞋子，给了他一双没有鞋带的布鞋。

“他们没有给我戴手铐，因为这些人我全认识。我和他们是从小玩到大的。”

健康检查迷迷糊糊地过去了——刺了手指，记录了语音，扫描了虹膜——但随后警察说他们需要在一所学校停一下。“当我们到达那所‘学校’时，我看到了一个厚厚的黑色大门。在进大门之前，他们给我戴上了手铐。”

一看到营地大门，他知道肯定出了问题。“当时我非常害怕”，阿迪尔贝克回忆说。他被迫换上一件灰色的运动服，头上被套了一个黑色的头罩。“带我来的协警告诉我，我马上要被关进营里了。他们问我：‘你犯了什么事？他们把你的名字给了我们，让我们来抓你。’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所以就哀求他们。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抓我进来，当他们把我拖进黑暗中时，我开始放声尖叫。”

一部非人化的机器

被拘留的最初六个月，阿迪尔贝克在一间他称为“牢房”的屋子里度过，在那里他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门很厚”。门上有一个洞，看守将食物从洞里递给被指派为“班长”的两名被拘留者。水泥房间里有

九张多层床铺，一端有一个蹲式马桶。房间里有两个摄像头，前面的那个摄像头旁边有一个喇叭和录音系统。他们在晚上不准关灯。

初进牢房，营内工作人员解开他的手铐，将他分配到一个上铺。但他们告诉他，白天不允许坐在或者躺在床上。相反，他必须挺直着身子坐着。采访到这里，阿迪尔贝克挺起胸，昂着头，演示了这种笔直生硬的姿势。“在他们拿来凳子之前，我们不得不像这样坐在下铺，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盯着墙壁或者墙上的电视。你不能随便乱动，必须事先得到许可。”与东面30公里外Vera的营地一样，在自动监控系统 and 看守的强迫下，被拘留者一天里大部分时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这是一种对身体的折磨，使他们无法放松，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他们坐在床和床之间的塑料凳子上，背诵监所守则。你必须背，无论你是否懂汉语。由于人们不得不长时间坐在那里，有许多人的肠子都‘掉下来了’。”巴依木拉提回忆，在奇台的再教育营里，许多被拘留者都患有直肠脱垂。“当他们患上了这种病，最终会被允许去看医生。”他接着描述了被拘留者如何被戴上头罩和镣铐，并由携带自动武器的警察护送着去医院，这和Vera所描述的经历一模一样。

另一位名叫排则莱提（Payzilet）的曾被拘留者当时与阿迪尔贝克在同一个营地。被关押在女子监区的她回忆说，因为她们缺乏水分以及食物配给缺乏营养和纤维，这些消化问题会产生并发症。“我们总是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上厕所，”她说，“因为经常每天只能喝一两碗稀汤，吃一两个馒头，也喝不上茶。如果你几乎不喝任何东西，上厕所就很难快速解决。”

与我交谈的每个曾被拘留者都说晚上睡觉很困难。阿迪尔贝克回忆说：“我们牢房里有23或24个人，所以其中一些人必须挤在同一个铺位睡觉。他们不得不互相头对着脚，侧身而睡。”与排则莱提和Vera的经历一样，他们不能用手或毯子遮住脸来挡住光线。他们不仅受到摄像头的监视，而且晚上会有两名被拘留者被分派看守其他人。阿迪尔贝克说：“如果你说了话或动了一下，或者你不肯告发其他人，你就可能会被带出去打。”

最初六个月，除了每周一次的淋浴，被拘留者不准离开牢房。“我们就坐在那里，还有看习近平的巡回访问，”阿迪尔贝克说，“在周末会看几个小时，内容总是关于中国有多繁荣。”他们不被允许说哈萨克语或维吾尔语。“我们假装在写汉字，嘴唇不动地小声说话。你从哪儿来？你是做什么的？你为了什么被抓进来？有些人说他们去了哈萨克斯坦，有些人是阿訇，有些人卖过存有宗教教义的存储卡，有些人说他们的手机里有宗教内容。”

每天早上，墙上的喇叭会把他们惊醒。他们必须在五分钟内穿好衣服并整理好床铺，“就像在军营里一样”。看守不用进牢房检查，只需要通过门上的洞或摄像头查看。“他们不会进我们的房间，除非有什么东西坏了。如果他们要进来，会对我们大吼‘抱头’。”阿迪尔贝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演示了一下这个动作：他十指相扣抱在脖子后面，深深地低下头，再从容地蹲了下去——这是一个一生中多次处于这种屈服姿势的人才有的“从容”。

他们每周被允许洗一次澡。由于23人一共只有10分钟的洗澡时间，而且只有五六个冷水喷嘴，他们尽量事先在房间里做好准备。“开门前我们必须抱头，开门后就冲向淋浴间。我们一起跑出去，互相拉扯。

如果你不先到那里，就不可能洗到澡。他们给了毛巾、牙刷和几块肥皂，我们必须为了这些争来争去。总是有争吵，但看守会对着我们大吼，所以我们很快就洗完了。”

拘留营这架机器将被拘留者向不同的方向拉扯。为了维持一丝尊严，他们想保持清洁。为了生存，他们希望能有足够的食物。但由于拘留营使这些东西成为稀缺资源，他们被迫相互竞争。于是，对看守的棍棒和电击，以及在老虎凳上被殴打的恐惧，往往压倒了这些欲望。他们被反复地提醒：他们是动物，他们的生存取决于看守一时的兴致。

“看守有木棍和电棍，”阿迪尔贝克回忆说，“如果你跟他们对着干，他们就会打你。他们打了我们很多很多次。这经常发生。如果你不守规矩或者顶嘴，他们就打你。”

阿迪尔贝克说，看守狠狠地打他们，有时似乎是为了惩罚他们，但有时更像是“像牧民放羊一样”地引导他们。如果他们不说“国语”（也就是普通话，阿迪尔贝克用的是营地内使用的汉语词汇），就会受到惩罚性的殴打。“如果我们越轨”，就会遭到纪律管教。“警察认为，当他们打你时，他们是在教育和改变你。他们不把我们当作真正的人对待。”一名汉族男子说，他曾与维吾尔族被拘留者一起被短暂关押在南部城市阿图什的一个拘留所。这些形式的身体虐待和训练与普里莫·莱维在奥斯威辛的回忆产生了共鸣。“有些人纯粹是出于兽性和残暴殴打我们，另外一些人在我们抬着沉重的货物时，几近友好地鞭笞我们，伴随着鞭笞却是劝告和鼓励，就如同赶车人鞭笞驯良的马匹似的¹²⁷。”

¹²⁷ 普里莫·莱维，《这不是个人》。

阿迪尔贝克说，为了不被打，他和许多被拘留的同伴都尽可能地遵守规则。“但有时候就算我们在走路，他们也会打我们。而且我们在走路时他们总是对我们吼叫。他们叫我们畜生、牲口。他们大吼：

‘快，快，快，你这个猪头！’”这些低级看守大多是哈萨克和维吾尔人，他们由汉族管理者监管，但他们都用汉语对被拘留者吼叫。与阿迪尔贝克身处同一个营地，被关在女子监区的哈萨克族被拘留者排则莱提说，一个特别残忍的维吾尔女看守阿依古尔（Aygul）会叫汉族男看守来，专门殴打她所认出的维吾尔女性被拘留者。她记得阿依古尔说：“我记得你以前戴过面纱，你活该被打。”一位名叫叶尔江·库尔帮（Yerzhan Kurman）的哈萨克族男子在2019年接受德国《时代周报》杂志采访时说，在哈萨克斯坦边境附近的一个营地，维吾尔和哈萨克族看守对他牢房里的被拘留者说：“你们没有权利说话，因为你们不是人¹²⁸。如果你们是人，你们是不会被抓进来的。”

对阿迪尔贝克来说，看守对待他们的方式很明显是系统性的。营地的机制反映了几乎握有无限权力的监狱长的心理。“看守的族裔并不重要，”阿迪尔贝克说，并摇了摇头，“他们有一个头头命令他们这样做，而且这一切都被记录在摄像头上。当头头们来的时候，看守们会在走廊里大吼：抱头！抱头！整栋大楼都有回声。负责人是一个姓王的汉族人。他似乎经常来。他一来，有些人就会吓得尿裤子。他随时都会来。”

乌鲁木齐营地的凯尔比努尔说，卡德尔的汉族上司也有类似的行为。卡德尔接到扩建营地的命令后问：“每间牢房里要容纳15个人吗？”

¹²⁸ “Ihr seid keine Menschen”（你不是人），时代周报（Die Zeit），2019年，<https://www.zeit.de/2019/32/zwangslager-xinjiang-muslime-china-zeugen-menschenrechte>（德文）。

领导笑着对卡德尔说：“我不是要你建一个旅馆。我是要你建一个拘留营。每间牢房里应该有50到60个人。”

将穆斯林非人化是党国中央领导层在反恐人民战争开始时就作出的指示。2014年，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将维吾尔族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描述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¹²⁹。在整个地区的宣传广告牌上和 国家媒体出版物中，一场媒体运动开始把被视为极端分子的维吾尔和哈萨克人描绘为害虫和恶魔。于是，所有被认为“不放心”的穆斯林都可以被放逐到一个法外的“智能”营地系统之中，它的建立使这种妖魔化成为惯例。这就是为什么当一名维吾尔族男子被抓走时，凯尔比努尔学生的汉族邻居会鼓掌——公寓楼里又抓了一只老鼠。

再教育的感官系统

我采访的所有曾被拘留者都说，他们的世界逐渐开始围绕着眼前的问题旋转：食物、上厕所、用汉语唱歌和背诵。外面的世界开始消失。后来被迫在工厂工作的被拘留者叶尔江·库尔帮说，被拘留在营地的头两个月，“我会想起我的妻子玛依努尔和我的三个孩子”。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只想着食物¹³⁰”。像其他历史时期里那些没有正式判决的被拘留者一样，他们的时钟随着生存的节奏跳动。

味觉、嗅觉、听觉和痛觉被集中在了贴在牢房墙上的守则中。“营地的守则之一是不允许被拘留者使用‘musulmanche’或它对应的汉

¹²⁹ “习近平：要使暴力恐怖分子成为‘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新华网，2014年4月26日，<https://archive.fo/JJ2LQ>（中文）。

¹³⁰ 时代周报，2019年。

语‘清真’一词，”阿迪尔贝克回忆说，“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每次一碗，但完全不够吃。除此之外还有一两个馒头。许多人一直都感到饥饿。门下面有一条缝，他们通过缝隙把食物倒进碗里。”

领取食物的过程与唱爱国歌曲或诵读规定的口号捆绑在一起，而这一切都通过摄像头和音频系统被密切注视着。在阿迪尔贝克的案例中，“班长”——像Vera这样被指派监督其他被拘留者的人——是在他们都立正站好并放声歌唱之后，从门下缝隙中领取食物的人。在这一过程中，电视上会开始播放音乐，他们会跟着银幕上出现的汉字以卡拉OK的方式歌唱。“有时他们要求我们在吃饭前唱五六首歌，”阿迪尔贝克说，“当你饿的时候，要像他们要求的那样唱歌是非常困难的。有时他们会对我们大吼：‘再唱一遍！再唱一遍！’好像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游戏。我们不知道哪个房间唱错了。在电视叫我们唱的时候，整个营地，每个牢房的所有人，都竭尽全力地大声唱。”

在一次单独采访中，被关押在对面女子监区的排则莱提证实了这种为维持生命的稀菜汤而唱歌的做法。“有时我们不得不唱几十遍。即使是那些不懂汉语而不知道这些歌曲的老年人也必须唱。如果她们没有完成唱歌的任务，她们会让她们在地上蹲两个小时。因为我是‘班长’，所以也要负责。有时，年轻的被拘留者会要求代替她们受罚”。有些时候，排则莱提能够帮那些生病或无法下蹲的人协商一个较轻的惩罚。她用双手与肩同高的姿势演示说：“她们会让她们面对墙壁站着，两手平放在墙上。如果她们让手掉下来，就必须重头开始。”所有这一切都在摄像头的监视下进行，确保被拘留者像在参加一个疯狂版真人秀的选手一样遵守这些身体命令。

即使在拘留营外，人们也明白，在拘留营里唱歌和诵经是和获得食物联系在一起的。我在2019年采访的汉族妇女卢音告诉我，在一次对一个维吾尔族家庭的政府拜访中，主人告诉她，在拘留营里，“看守人员会问：‘每天是谁给你提供的食物？’答案是：‘习近平！’如果你不这样回答，你就吃不上饭！”

在被拘留的几个月后，排则莱提和阿迪尔贝克开始每周上两到三次课。与大多数拘留营一样，有一道屏障将他们与老师隔开。“椅子和课桌被铁链锁在一起无法移动，”阿迪尔贝克回忆说，“椅子和课桌贴得太近以至于课桌紧压在我们的肚子上。”

在乌苏的营地，他们的老师有哈萨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和汉族。老师教他们小学水平的汉字和拼音，尽管有些被拘留者有大学学历。老师还教他们越来越多的爱国歌曲，让他们背诵习近平语录。那些不懂汉语的人，比如阿迪尔贝克，就向其他学生学习。“他们告诉我们，‘你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学习。你是否理解并不重要。你是在接受惩罚’”。因此，他们并不在意其他学生每周帮助阿迪尔贝克写“思想报告”，而他甚至没有能力阅读它。“我想它大概就是说，‘我犯了罪。我不会再犯了。现在我正在学习关于极端主义的七十五条法律或十五套其他法律’。我猜它提到了类似的东西，但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是其他人帮我写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常例行的暴力包围了被拘留者。长时间坐在凳子上，冲刺着去洗澡，加上令人处于饥饿状态的饮食，产生了一种迟钝的麻木感。在相对罕见的被拘留者被允许走出牢房的情况出现时，凯尔比努尔和其他营内工作人员也注意到了这种转变。由于牢房的铁门被一条短小的铁链锁着，使门只能打开不到30厘米，所以被拘留者要

去教室时，必须挨个缩身弯腰才能出去。“被拘留者被放出牢房时，不能走而必须爬。我在场的时候看到汉族看守讥讽和嘲笑他们。被拘留者不得不像狗一样爬行。”被拘留者自发地做这个动作的方式，静静地，一个一个低头弯腰，尽力不引起注意，使他们看起来像受惊的动物。

她还注意到，在没有卫生设施的牢房里，看守们经常塞住鼻子或戴上口罩来阻挡气味，就像环卫工人处理污秽时一样。“当他们去上课或洗澡时，所有汉族看守都会戴上口罩，”凯尔比努尔回忆说，“门被打开时，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会弥漫在整个楼层。当我有机会往里看，看看气味是从哪里来的，我看到床铺尽头有一个塑料桶。我想象着当有人使用那个桶的时候，其他人会怎么看她。看守每周只准他们清洗一次塑料桶，所以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使用它。他们不得不生活在那种恶臭中。”

凯尔比努尔提到，营地其他一些区域里每层有一个厕所，被拘留者被允许每天使用一次。但他们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否则就有可能被电棍电击或被木棍抽打。粪便和汗水的味道成为恐惧和野蛮的味道。即使被拘留者逐渐对之习以为常，它也开始影响营内工作人员。2018年初在一个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县，一名拘留所汉族工作人员说，他每天协助驱赶的数百名被拘留者的气味弥漫在空间里，使他丧失胃口¹³¹。

2017年6月的某个时候，卡德尔叫凯尔比努尔将一个大袋子搬进营地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当她询问袋子里装的是什么时，一位同事告诉她这是给被拘留者的新内衣。由于该营地没有淋浴设施，他们已经有几

¹³¹ “信阳市看守所开展‘学习十九大弘扬援疆精神’专题活动”，信阳市看守所，2017年12月23日，<https://archive.vn/Etdjz>（中文）。

个月没能清洗自己了。“他们的内衣很脏，气味很重，所以卡德尔希望看守人员通过分发馒头的门下缝隙分发内衣。”

还有一次，她看到汉族看守在院子里笑，旁边是一大堆被拘留者的囚服。在户外，当他们准备煮沸这些衣服时，气味没有那么重。“我能看到到处都是虱子。看守们在笑。他们告诉我，‘这些虱子太凶了’。这对他们来说只是个笑话。”被关在牢房里成千上万个被拘留者的苦难似乎无关紧要。

养老院里的死亡

逗留数月后，阿迪尔贝克和排则莱提被转移到了一个由养老院改建的新营地¹³²，位于乌苏市西北侧。在他们被转移之前，阿迪尔贝克听到了一些传言，说“那里会自由一点，吃的也会好一点。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养老院的牢房里，有六张床铺，像中国火车的卧铺车厢一样每张有三层。狭窄的床铺相距只有1.5米，而且不允许被拘留者白天坐在床上。阿迪尔贝克的牢房里有一个马桶和一个淋浴。

但几乎是在第一时间，阿迪尔贝克发现新环境的纪律更加严厉。“我是唯一的哈萨克人，”阿迪尔贝克回忆说，“其他人都是维吾尔人。看守对我们非常粗暴。他们更频繁地打人。他们会用脚踢我们，或者用棍子打我们。在营地呆了两天后，看守们进来喊道：‘抱头！抱

¹³² “Shihu Facility #6”（西湖镇6号设施），新疆数据计划，2021年，<https://xjdp.aspi.org.au/map/?marker=3541>（英文）。

头！抱头！’我很幸运能够抢在别人之前趴下，所以只是被轻轻踢了一下。但是其他人，甚至老人，都被狠狠地踢了一脚。他们试图用靴子故意踢人的裆部。他们想伤害他们。第二天，其中一个老人就站不起来了。”

最终，阿迪尔贝克被发现不是维吾尔人，是被意外安排在维吾尔族牢房里的。“看守问：‘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哈萨克人？’他扇了我们‘班长’一个耳光。看守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个塔塔尔人和另外七个哈萨克人。被转移后，他们没有再打我们。但我们可以听到其他房间里人们被打的尖叫声。他们对维吾尔人的虐待很明显比我们多。”

排则莱提的新牢房设备较差。“我们只有一个塑料桶作为厕所使用，”她回忆说，“上面有一个摄像头，但我们逐渐习惯了在彼此面前和在摄像头面前使用它。有时桶溢出来了，看守不让我们出来倒掉它。”由于排则莱提被指派为该牢房的“班长”，她试图向看守请愿，要求更经常地清空它。“我告诉他们，‘这不卫生，会传播疾病’”。但看守们没有理会她。渐渐地，她们习惯了生活在臭气熏天的环境中。

过了一段时间，在排则莱提的正上方的牢房里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在半夜，我听到一声巨响。”紧接着，营地整个侧翼的灯都黑了。然后排则莱提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第二天，在课间的窃窃私语中，她得知“砰”的一声是一个维吾尔族妇女自杀的声音。“她从第三层的床铺上头朝下撞到地上，”排则莱提告诉我，“她有一个9岁的女儿和一个1岁的孩子，他们被送到了孤儿院，所以她自杀了。”她牢房里的其他人说，他们把尸体裹在她床铺的毯子里，然后拖走了。此

后不久，官员们在营地里建了一个诊所。她认为这是为了让他们能够隐藏任何其他的“非正常死亡”¹³³。尽管阿迪尔贝克被关押在营地的另一个区域，但在一次单独的采访中，他证实了排则莱提所听到的大致内容。“我也听说有人自杀了。”他说。

无力感

在再教育营里，很难保持对外面的生活和亲人的依恋感。有时，这种分离是以暴力的方式发生的。排则莱提回忆说，当她第一次到达营地时，和她一起被拘留的年轻母亲们都在哭喊着要她们的孩子。“许多年轻妇女在尖叫，因为她们被强迫将孩子丢在家里。然后警察进来将她们一个个带走。几个小时后，这些妇女回来了，并且沉默不语。她们被狠狠地打了一顿。”通过窃窃私语，她得知其中一些人甚至被迫将婴儿留在了家里。“有人告诉我，没有人照顾她的孩子，因为她的丈夫也被抓走了。”

有一位哈萨克妇女来自离中国边境不远的县城。她告诉我，当她的姐姐努尔苏鲁·莱瓦伊和她的丈夫被带走时，留下了自己的孩子。这些孩子被送到了另一个专门收容孩子的“营地”。“他们的孩子在没有父母的环境下成长，”她眼含泪水地说，“最大的孩子今年六岁。他和弟弟被允许每周一次探望祖父母，每次探望都会哭喊着要爸爸妈妈。起初他们用哈萨克语乞求，‘请帮我们找爸爸妈妈！’然后他们开始用汉语这样问。他们不再用哈萨克语说话。如今大部分时间他们只是默不作声，他们现在非常安静。”中国政府的文件显示，在一些维吾

¹³³ 朱海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工作的意见”。

尔族聚集区，多达70%的五岁以下儿童¹³⁴现在被收容在以普通话为媒介的“爱心幼儿园”里，而他们的父母则在监狱、拘留营或工厂里。现在，家庭分离在整个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社会中十分普遍。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孤立、家庭分离和持续监视让人感到彻底地无力。对阿迪尔贝克来说，在营地生活中最困难的经历之一是被迫一次又一次地歪曲现实。每个月，他的亲属到营地旁的探视区探访他的时候，这一点尤其痛苦。“到了亲戚探望的时间，我们被带到探视区，头上戴着黑色头罩，双手被铐在身后，”他说，“在我们进入探视区之前，看守把我们的镣铐打开头罩摘掉，他们还把棍子放下，所以我的亲戚看不到这一切。那里总是有人在监视，在做记录。我们不得不说，‘一切都很好’。在我们进去之前，他们会说：‘不要哭。不要谈论你的问题。你必须说一切都很好。’”虽然房间里每个人都知道阿迪尔贝克被迫说的不是真的，但没有人能够反驳这个被表演出来的现实。“周围有摄像头。他们在监视一切。我们什么都不能说。我只是问亲戚能不能见到我的孩子，能不能和他们联系，他们会摇摇头。他们也不能独自前来。他们是和村里的队长一起过来的，其实他们也非常害怕。”后来在哈萨克斯坦安全地回忆起这些，让阿迪尔贝克的眼里充盈着泪水。他用手背擦掉眼泪，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如果你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无法说出你身上发生的事情，就很难坚持活下去。”

¹³⁴ 《新疆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另见郑国恩，“Break Their Roots: Evidence for China's Parent-Child Separation Campaign in Xinjiang”（斩断他们的根基：中国在新疆的亲子分离运动的证据），*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 7, no. 7, 2019年7月4日，<https://www.jpolrisk.com/break-their-roots-evidence-for-chinas-parent-child-separation-campaign-in-xinjiang/>（英文）。

阿迪尔贝克从来没有弄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抓。“当我设法与其他人交谈时，我发现他们所有人都是无辜的。所以我开始意识到，我们可能不会被释放。我喊了很多次，问自己为什么会被抓进来。我也在他们面前哭了很多次。他们告诉我，他们也不知道是谁把我抓进来的。有时候他们说我必须意识到自己的罪行，因为那些把我抓进来的人抓了我。”拘留似乎没有任何终点或逻辑。

拘留期迫使人们无限期地搁置他们的生活。在2019年国家授权的一次营地访问中，一名北美记者偷偷拍下了一张刻在牢房墙上的维吾尔语铭文的照片。它写道：“这个宿舍是一个优秀的宿舍。坚持住，我的心。”许多我采访的曾被拘留者说，在营地中最艰难的事情之一是不知什么时候，甚至会不会，被释放。对身体活动、言语、饥饿和疾病缺乏掌控，使他们身心都备受折磨。这使他们与营地外的亲人疏远。时间开始以维持生命为中心，通过说和做那些他们被要求说和做的事情来达到。我采访的一些曾被拘留者，如阿迪尔贝克，说他们确实经常想到自己的孩子，但其他人说他们失去了对重要日期的记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想过自己的家人。生日、母爱和亲情的仪式时间被营地时间所取代。除了吃喝、上厕所、维持健康和不要越雷池一步这些紧迫的需求，其他一切都消失了。

这种对时间的抹杀，让人想起普里莫·莱维的一段令人不安的关于他在奥斯威辛时光的文字：“对于他们来说，成年累月地生活在那里，活在当下是更为紧迫和实际的问题。今天能吃到多少食物，会不会下

雪，是否有煤要卸，而遥远的将来的问题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没有任何迫切性¹³⁵。”

¹³⁵ 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

第五章 不自由的人

2017年8月18日，埃巴哈提·奥塔白（Erbaqyt Otarbai）的噩梦开始了。当时他正在乌鲁木齐附近的一个矿石场卸货。保安告诉他，他家乡塔城的警察正在找他（塔城毗邻哈萨克斯坦边境，距离乌鲁木齐六小时路程）。前一天，他们审问了他，并没收了他的智能手机去检查。虽然他觉得他们跑这么远来见他很奇怪，但是他们并没有说要逮捕他。作为一个没有宗教信仰、从未触犯过法律的哈萨克中年男子，他并不怎么担心。“我不是罪犯，所以我以为没有什么好怕的，”他回忆说，“因为我是卡车司机，所以唯一有点担心的是可能会有一些没交的交通罚单。”

然而，几个小时后，当他在家乡被铐在“老虎椅”上时，一种深深的恐惧压倒了他。这种恐惧从此就没有离开过。“他们命令我‘坐下回答问题。你有没有进过哈萨克斯坦的清真寺，或者在那里祈祷过？你为什么要去哈萨克斯坦？你是否一直跟瓦哈比穆斯林有联系？你喝酒吗？’”他告诉对方他确实喜欢喝酒，甚至有时会说脏话，但他觉得对方对这些回答并不满意。“他们说我的手机上有脸书、Instagram和WhatsApp。‘你为什么需要使用这些APP？’他们问。”他回答

说，他在哈萨克斯坦有很多朋友使用这些APP，所以他下载了这些APP与他们交流，那是在他回中国照顾生病的父亲之前。反正这些APP在中国也不能用，所以他不认为它们是个大问题。“你们自己看吧，我没有发送任何非法内容。”但他后来想起，虽然他不是很虔诚，但曾分享过一些宗教视频¹³⁶，只不过他当时不知道这些视频是非法的。

这时已经是半夜了。被镣铐锁着，他被带到附近一家医院接受“健康检查”，与所有维吾尔和哈萨克人接受过的检查类似：全方位脸部照片，以及血样和指纹采集。“他们录了我的声音，还给我做了虹膜扫描。”凌晨2点左右，他们把他带到审前拘留所，给他戴上沉重的手铐。作为欢迎他来到拘留所的方式，一名看守一边告诉他“你入狱了”，一边用一根金属棒猛击他的头顶。当鲜血顺着脸颊流下来时，他被带到一个挤满其他穆斯林“潜在犯罪分子”的牢房。

从奇台到喀什，整个地区的再教育营牢房里都重复着同样的故事。牢房里其他人告诉他，有人被关进来是因为买了去土耳其的机票；一个哈萨克人因为在哈萨克斯坦学习而被拘留；有些人被抓是因为经常祈祷或者戒了烟；还有一些人在没有得到政府批准的情况下提供或接受现金贷款；另一些人是因为让别人用他们的身份证注册手机SIM卡。

“当听说我因为使用WhatsApp被抓时，他们说我一定会在这里待很长时间。”后来发现，这个拘留所里大多数被拘留者是与哈萨克斯坦有联系的哈萨克人，许多人被拘留是因为他们使用了WhatsApp。

¹³⁶ 本·莫克 (Ben Mauk) , “Inside China’s Prison State” (走进中国的监狱国家) , 纽约客, 2021年2月,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a-reporter-at-large/china-xinjiang-prison-state-uyghur-detention-camps-prisoner-testimony> (英文)。

埃巴哈提在这个拘留所度过了接下来的九十八天。由于是审前监狱，他受到的待遇甚至比正式再教育营更残酷。“他们早上6点把我们叫醒，叫我们在牢房里跑步。因为我们必须戴着重重的镣铐，所以非常疼。有时脚踝会流血，”埃巴哈提回忆说，“然后我们被要求坐在通铺边上，不准动。有些人最终会忍不住动一下，然后他们就会打我们。”

埃巴哈提生活在对这种殴打的恐惧中，因为它不仅在当下会造成痛苦，而且会持续到未来很多天。“他们用大约1.5米长的木棒打我们的屁股。看守会让其他人面对墙壁。然后受罚的人脸朝下趴在通铺上，两名看守用棍子打他的屁股。这样被打过之后，几乎不可能再坐着，但第二天你又必须坐上好几个小时，否则又会被打。”

残暴渗入了牢房的生活，并开始改变他们。被拘留者之间开始发生争执。“我和牢房里的其他人发生了争吵，然后看守就打我。”埃巴哈提微微颤动了一下，陷入沉默，摇摇头，似乎想忘记。

最终，埃巴哈提被转移到位于塔城另一侧的一个营地。与东南方向300公里处的乌苏一样，新营地是由养老院改建成的。两边各一个协警押着，埃巴哈提和他牢房里的其他人被装进了面包车。“我们被戴上了手铐、脚镣和头罩。一路上警笛一直在叫。”

与其他所有营地一样，他们白天不准坐在床铺上。灯从来没关过。他们坐在凳子上，吃饭前要先唱歌。他们看着没完没了的汉语政治教育讲座。因为工作需要他会一些汉语，上课、唱歌，甚至每周的“思想汇报”对埃巴哈提来说都不是太难。他算是幸运的。

宠物

埃巴哈提发现他认识营地里的一些老师。在以前的生活中，他们是他的同学或同事。其中一位老师让他帮忙管教被拘留者。他说他们必须坐直，在课堂上激情朗诵，否则他可能会挨罚。埃巴哈提记得，他带着其他人尽可能大声地说：“谢谢习大大”。他记住了二十二首不同的爱国歌曲。

这时，埃巴哈提眉咧嘴一笑就开始唱歌，低沉的男中音充满了整个房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然后这荒唐的声音把他自己也逗笑了。

2018年11月，他来到养老院一年之后，营地官方询问是否有人想做缝衣服和其他类型的工作。几百人报名参加，但只有150人通过了这项工作所需的意识形态和语言测试。埃巴哈提再次成为一个成功案例。

新工厂与营地同在一个院子里，只是属于另一栋建筑。他们在这栋新搭建起来的钢筋楼房里安装了大约300台缝纫机。两名汉族妇女负责管理被拘留者。她们教他们缝制校服的某些部分，当他们逐渐熟练起来，便开始制作带有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标志的餐巾。晚上，被拘留者要准时回到教室，唱爱国歌曲，学习政治思想。当他告诉我这些时，埃巴哈提又唱了起来，脸上再次露出了灿烂又讽刺的笑容。他哼了一声，笑着说：“他们从来没有给我们钱。不然，”他开起了玩笑，“我就留下来了。”

新的工作制度实施一两个星期后，那两名汉族工厂管理员告诉被拘留者，有访客要来参观他们的工作情况。“她们叫我们跟着她们，重复

我们应该用汉语说的话：‘我是一个失了业的人。我自愿来这里学习技能。这就是党对我们的关怀。’”

当访客来到时，他意识到他们是记者。他说他当时坐在工厂车间的后排，所以甚至没有机会背诵那些台词。“他们问了前排的几个人一些问题。”他说这些记者似乎对所见所闻很满意。

2019年初，埃巴哈提意外地从拘留营获释。他的妻子已经成为哈萨克斯坦公民，正在为他回哈萨克斯坦提出申请。接下来的六个月里，他被关押在他旧公寓附近的治安联防队指挥部。“我不能出去。我知道如果没有人陪着自己出去，我会被送回拘留营。所以我就给联防队五名管理员做饭，给他们打扫办公室和厕所，给他们烧水喝。”

民政部单位的两名汉族妇女，主要负责管理街道的被拘留者和曾被拘留者，成了他的“生活老师”。每周一，他都会跟着她们到联防队门口的旗杆下，参加升旗仪式。“我每次都大声批评自己，说以前不懂党对我的关怀，说我现在很珍惜党，还会唱在拘留营里学到的歌曲。”

他说他总是满脸堆笑。每当有人来找他的时候，他都会鞠躬点头，并且只说汉语。“我内心仍然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模仿起自己被再教育的笑容，他说：“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只能说：‘行，行，好，好’。我就像他们的宠物。”

“这是再教育教给我的。”他大笑着说。

不自由的工人

在埃巴哈提开始在养老院营地工厂工作几个月前，古孜拉·阿瓦尔汗（Gulzira Auelkhan）刚从伊宁的一个拘留营被转移出来，该营地在埃巴哈提所在营地以南约600公里处。古孜拉是一位39岁的母亲，有一个还在学步的孩子。她与其他近60个被拘留者（大多数是维吾尔人）一起，在一个拥挤的牢房中度过了15个月的恐怖虐待¹³⁷。她牢房里的被拘留者如果上厕所超过两分钟，就会被电棍电击头部。她们被剪短的头发只能遮住一些伤痕。于是在上级官员视察营地之前，被拘留者会得到染发剂来染黑头发和头皮。她们被命令在检查时要微笑。

由于她被认为的“潜在罪行”相对较轻——尽管根据中国政府提供给联合国的文件，拘留营中的所有被拘留者实际上都没有犯罪¹³⁸——古孜拉被安置在一个警戒程度最低的营地里。她的“不放心”之处在于，她曾经去过哈萨克斯坦，看过土耳其电视节目，其中有妇女戴着头巾。她所在的营区不太强调意识形态再培训，取而代之的是每天全天的汉语学习。哈萨克语和维吾尔语是不允许说的。

从营地被释放时，古孜拉以为可以获得更多的自由。但没过几天，当地的一位村领导带着一份文件出现了，说她必须到一家手套厂报到。

¹³⁷ Erkin Azat, “Gulzira Auelkhan’s Records in a Chinese Concentration Camp: ‘I Worry About the Lives of Those Eight Who Have Not Signed a Contract in the Factory’” (古孜拉·阿瓦尔汗在中国集中营的记录: ‘我担心那些没有在工厂签订合同的八个人的生命’), Medium, 2019年3月4日, <https://erkinazat2018.medium.com/gulzira-aelkhan-s-records-in-a-chinese-concentration-camp-i-worry-about-the-lives-of-those-c18a2038a5a2> (英文)。

¹³⁸ 联合国, 2019年。

她到达工厂时，认出了她的新老板，总经理王兴华¹³⁹。她曾在营地见过他几次，当时他正与营地官员一起参观。她推测，他一定是在那时候就选中了她来他的工厂工作。

王兴华与绿叶硕子岛商贸有限公司签了合同，这是一家位于河北省保定市的制造商。在2018年12月发布的国家电视台采访中，他说：“在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已经招募了六百多人。”这六百名政府“招募”的新人中有两人是叶尔江·库尔帮（我在上一章讲了他的故事）和古孜拉。

王兴华在采访中接着说，自2017年新工厂成立以来，“我们已经创造了4000多万元（600多万美元）的销售额。我们计划在今年年底前达到一千名工人，并打算在2019年底为一千五百人提供工作。”事实上，伊宁手套厂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其母厂的产能，它在河北的员工还不到两百人¹⁴⁰。将制造业转移到新疆对该公司来说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该公司96%的皮手套出口到境外的俄罗斯和东欧。

但使得指数级增长如此容易的还有其他原因。自2018年以来，国家为在新疆建造工厂和从新疆运出货物提供了补贴。作为“对口支援”计划的一部分，这些工厂的建设通常由中国东部的地方政府资助。新工厂可以得到高达4%销售额等额的补贴¹⁴¹，以支付新厂址的运输费

¹³⁹ “州直纺织服装产业敲开群众‘就业门’”，伊犁电视台，2018年12月4日，<https://archive.md/KSe5r>（中文）。

¹⁴⁰ “Lixian Huawei Gloves Factory”，阿里巴巴，2019年，https://web.archive.org/web/20191211094113/huaweiglove.en.alibaba.com/company_profile.html?spm=a2700.icbuShop.conu5cff17.1.4af811a5izQHdr（英文）。

¹⁴¹ “关于进一步完善自治区纺织服装产业政策的通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2018年4月6日，<https://archive.md/ZBsk8>（中文）。

用。最重要的是，在附近的拘留营里有成千上万名像古孜拉这样绝望的、精神受创的被拘留者作为常设人力储备。

自2017年以来，工厂纷纷涌入新疆，以利用与再教育营系统相连的新建工业园区以及与之配套的廉价劳动力和补贴。2018年底，该地区主要发展部门，新疆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声明，称拘留营或“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已成为经济稳定的“载体”¹⁴²。这个系统使新疆吸引了“大量沿海内地企业来疆投资建厂”。由于中国80%以上的棉花来自新疆¹⁴³，因此中国的纺织服装相关产业得到了特别强调。由于东海岸汉族农民工劳动力成本上升（或至少这是一部分原因），国家计划到2023年将超过一百万个纺织服装产业的工作机会¹⁴⁴转移到该地区。如果计划实现，意味着中国每十一个纺织服装产业就业机会中就有一个在新疆¹⁴⁵。伊宁手套厂的1,500个工作岗位就是这个数字的一部分。

¹⁴² “自治区经济结构稳中有活发展良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8年12月，<https://web.archive.org/web/20190520143306/http://www.xjdr.gov.cn/info/9923/23516.htm>（中文）。

¹⁴³ “Provincial Data Shows China’s Shifting Agricultural Trends”（各省数据显示中国农业趋势的转变），Gro Intelligence，2019年3月6日，<https://www.gro-intelligence.com/insights/provincial-data-shows-chinas-shifting-agricultural-trends>（英文）。

¹⁴⁴ 潘玉寒（Dominique Patton），“Xinjiang Cotton at Crossroads of China’s New Silk Road”（处于中国新丝绸之路十字路口的新疆棉花），路透社，2016年1月12日，<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xinjiang-cotton-insight-idUSKCN0UQ00320160112>（英文）。

¹⁴⁵ “Wages and Working Hours in the Textiles, Clothing, Leather and Footwear Industries”（纺织品、服装、皮革和鞋类行业的工资和工作时间），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sation），2014年，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sector/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300463.pdf（英文）。

作为再教育劳动制度的一部分，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被非自愿地分配到新建的工厂中工作。概括地说，这种分配有三个主要途径。首先，许多被拘留者被安置在拘留营内部或旁边的工厂里。像埃巴哈提一样，他们白天工作和晚上关押在同一个营地空间里。

第二，在区域中心建立的一些新的工业园区里，有曾被拘留者（如古孜拉），也有没被拘留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由政府官员从当地挑选出来，其中有农村自雇人口，也有城市外围传统贸易和服务行业中的哈萨克和维吾尔临时工。曾被拘留者在城市工业园区加入这些剩余劳动力，他们在夜间通常被关押在上锁的宿舍里。而其他“剩余劳动力”——和中国东部的农民工一样——则被允许在晚上回到自己家中，或住在区域中心自由选择的住所里。

第三，在农村地区新建的县级小规模“卫星工厂”容纳了家住附近的维吾尔工人。这些工人主要是有年幼子女的妇女，他们由当地村镇一级的领导指派工作，他们的子女则在日托机构里得到照顾，同时他们的丈夫在城里工作或被关押在拘留营里。虽然这些途径的胁迫程度各有不同，但这三种途径都导致了不同形式的家庭分离，以及对国家和私营企业代理人在汉语环境中培训和管教的依赖。虽然他们有时可以晚上回家，但就像拘留营的穆斯林工作人员一样，他们不能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辞职。所有这些人都会被划入强迫劳动的范围。

与营地系统相关的国家工作人员使用的文件透露，拒绝“扶贫”计划（一种广泛使用的委婉说法，用于分配工厂工作和其他形式的分配劳

动)被认为是不放心和宗教极端主义的表现¹⁴⁶。基层国家工作人员与派出所、私营和国有企业一起合作执行该运动,他们负责从自己辖区人口中提供雇员。他们经常把工人送到工厂,有时还充当工厂管理层和工人之间的调停人。他们还在车间里,有些情况下甚至在工厂宿舍里,负责纠察工作。与基于市场的合同法紧密相连的“自由”完全抵触的是,国家当局一些人似乎臆断,导致穆斯林工人不想和家人分离,不愿在汉族管理的工厂中从事低薪工作的唯一原因,是他们厌恶与非穆斯林接触。于是,迫使维吾尔和哈萨克人在讲汉语的环境中工作,就被国家工作人员和雇主说成是为了把他们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中解放出来。这种说法掩盖了通过剥夺维吾尔、哈萨克和回族的自主权而造成的国家和市场依赖的过程。

叶尔江和古孜拉去的手套厂既有曾被拘留者,也有非自愿分配的“剩余工人”。许多人从拘留营短暂获释后来到了工厂。然而,根据一份国家报告,似乎在2017年年中,早在第一批被拘留者从拘留营来到工厂之前,就有超过1800人被派到工业园区工作¹⁴⁷。根据叶尔江和古孜拉的说法,这些早期到达的人是“第二途径”中未充分就业的农民,他们被视为“正常”人口的一部分,没有经历过拘留营就被分配了工作。

¹⁴⁶ “ÇİN’İN YENİ PLANLARININ YAZILI EMRİ İFŞA OLDU” (Written Order of China’s New Plans Revealed, 中国新计划的书面命令曝光), Turkistan Press, 2018年7月23日, <https://turkistanpress.com/page/cin-39-in-yeni-planlarinin-yazili-emri-ifsa-oldu/247> (土耳其文); “识别宗教极端活动(75种具体表现)基础知识”。

¹⁴⁷ “伊宁县‘轻纺产业区’的产业工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伊宁县零距离,2017年, <https://archive.ph/gdCmr> (中文)。

古孜拉被告知，前面三个月是实习期，每个月工资600元，国家规定最低工资的三分之一。根据她的“效率”，每双手套她还会获得少量报酬，大约两毛钱。她说：“最熟练的工人每天可以缝制60双。但我尽了力也只能缝13双。”¹⁴⁸由于视力不好，她发现不可能提高自己的生产水平。她在接受记者本·莫克（Ben Mauk）采访时说：“最终我在那里工作了一个半月。工资按计件算，一只手套一毛钱。我一共做了两千多只手套，赚了220元。所以，你看，这就像奴隶制一样¹⁴⁹。”

虽然工厂里的安保措施较少，但被拘留者不准离开。在2020年1月的采访中，也就是她越过边境逃到哈萨克斯坦的几个个月后，古孜拉告诉我，宿舍和工厂入口处都有检查站，经过时要扫描身份证和脸。她说：“早晨到工厂时和中午都会搜身和检查手机。下班回宿舍前又要检查一次，因为他们担心我们会拿走缝纫针。我们认识协警后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还在这里监视我们？’”虽然他们从未回答过，但古孜拉告诉我她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安保人员在观察他们是否表现得像顺从的、“被再教育过的”产业工人。她特别提到，像她认识的所有其他突厥穆斯林一样，她的护照也被没收了，而且他们不被允许到指定的地点——不管是工业园区还是相对自由的村庄——以外的地方去。此外，和绝大多数被这样分配工作的工人一样，她没有多少钱来

¹⁴⁸ 万德山（Nathan Vanderklippe），“‘I Felt like a Slave’: Inside China’s Complex System of Incarceration and Control of Minorities”（‘我感觉自己像个奴隶’：中国对少数民族复杂的监禁和控制系统），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2018年3月31日，<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world/article-i-felt-like-a-slave-inside-chinas-complex-system-of-incarceration/>（英文）。

¹⁴⁹ “古孜拉·阿瓦尔汗”，新疆受害者数据库，2019年，<https://shahit.biz/cmn/#1723>（中文）。

支付偷渡出去的费用。工厂的生活比营地的生活要好，但她明白，在新的环境里，她被要求证明她已经真正完成了再教育，成为了一名产业工人。

在工厂和工业园区的纪律之外，实体墙壁结构仍然是她生活的一部分。每天晚上下班后，她和其他被拘留者被巴士带到三公里外的一个临时宿舍。在宿舍里，被拘留者可以在院子里走动，但不准离开这个地方。根据《环球邮报》的报道，工人们“上班前在工厂里看阅读材料，下班后在宿舍里上45分钟的汉语课，夜里还有人监视着他们¹⁵⁰。”

叶尔江和古孜拉被允许在周末探访家人几小时。公司的巴士将他们送到他们的村子，然后再接回宿舍。然而，在“实习”一个月后，他们发现这些路费相当高。工厂的老板王总经理告诉他们，由于班车服务和食物的费用，他们600元的工资将被削减一半。叶尔江后来回忆说：“我在生产线上工作了53天，总共赚了300元¹⁵¹。”

政府文件显示，2018年在喀什地区，有10万名被拘留者被安排到新建的工业园区和卫星工厂工作¹⁵²。在养羊人阿迪尔别克被关押的乌苏市和华盛顿大学学生Vera被关押的奎屯市之间的一个县，总共约有

¹⁵⁰ 万德山，“我感觉自己像个奴隶”。

¹⁵¹ 时代周报，2019年。

¹⁵² “关于印发《喀什地区困难群体就业培训工作方案》的通知”，喀什地区行署办公室，2018年8月10日，<http://web.archive.org/web/20181204024839/http://kashi.gov.cn/Go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D=2963>（中文）。

45,000名穆斯林人口¹⁵³，其中有15,600名“剩余劳动力”通过此类劳动计划被安排工作。而其他地区的目标是达到类似的比例。在喀什，每一个被拘留者被安排工作，工厂主就会得到5000元人民币，分三年发放。这些补贴可能是为了防止叶尔江和古孜拉经历的那种工资扣押。然而，由于工厂是营地系统的延伸，在公民权利和人权之外的法律灰色地带运作，保护工人不受虐待完全依赖王总经理这类人的道德准则。作为一个正在为劳教国家做代理的实业家，他和叶尔江或古孜拉一样清楚，任何抱怨，任何生产的放缓，都会导致他们被其他被拘留者替代。他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

中国西北地区新建的工业园区在再教育营和私营企业之间，在无产阶级化和强迫劳动之间形成了一道门槛。国家文件一再指出，新工业园区的建设是为了向维吾尔和哈萨克族被拘留者以及其他穆斯林剩余劳动力灌输“生活技能”，尽管从来没有定义过什么是“生活技能”。在这些国家批准的文件中往往没有提到的是，这些工厂空间作为一个近乎完全独立运作的群岛体系¹⁵⁴在中国社会契约（一个国家会保护其公民以换取他们的忠诚的隐性协议）外部运作。对于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和回族公民来说，这种社会契约已经被打破，因为监狱群岛转向了殖民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一个再教育劳动制度——这不断侵蚀着他们社会再生产的活力。新疆拘留所工厂里工人的证件被没收，或

¹⁵³ “2019年12月20号沙湾新闻”，沙湾新闻，2019年12月20号，<http://archive.fo/O8J0T>（中文）。

¹⁵⁴ 译注：“群岛体系”源自于《古拉格群岛》。它是“由俄国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所编著的一部反映苏联强制劳动和集中营生活全貌的非虚构作品。在俄语中，古拉格一词是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缩写，实际上苏联并无古拉格群岛这个地方，索尔仁尼琴用这一名称将整个苏联比作海洋，而在這個海洋上遍布着带有古拉格的岛屿（即古拉格群岛），暗示古拉格制度的广泛性。”（[维基百科](#)）

者身份证被标为禁止通行，这将他们置于一种普遍化的不自由的形式之下。这些类型的强迫性劳动制度得到了国家的补贴和指导，并通过复杂的监控操作网络和一整个物流系统（将汉族工厂带到维吾尔和哈萨克族的家乡）进行运作。数百个拘留营威胁性的存在给所有这些重要的发展开了通行证，而这标志着国家对穆斯林生活的控制。

重要的是，这一制度的影响并不限于中国西北部，甚至不限于中国本身。在绿叶硕子岛商贸有限公司的卫星工厂里，几乎所有被拘留者制作的手套都销往国外。该公司的阿里巴巴分销网站上，根据手套的款式和购买数量，手套价格在每双10元至160元（1.5至24美元）之间¹⁵⁵。有些手套是由香港的高档精品店Bread n Butter经销的，该店在世界各地的商场都有分店，其中手套售价可能要高得多。总之，这些手套的销售价格成指数级地高于工人每件的计价。这套剥削体系——一种国家授权的盗窃行为——通过汉语知识这一文化资本的便利性，被“扶贫”和“援疆”等话语合法化了。又或者，这套体系被描述成是汉族工厂主在帮助被拘留者掌握成为一个守纪律的产业实习生所需的“生活技能”。

一位伊宁县官员在一篇赞美拘留所工厂大楼的文章中写道，当突厥穆斯林农牧民来到工厂时，他们“脱下草鞋，换上皮鞋，成为产业工人”¹⁵⁶。穿着原始“草鞋”的“落后”少数民族，通过被拘留获得了工厂纪律这一礼物，这种与事实相反的描绘恰恰抓住了从国家工作人员和承包商的角度看技能培训过程的精髓。在地区性国家媒体制作的赞扬强制就业项目实施的视频中，记者一次又一次地强调，拍摄过程

¹⁵⁵ 阿里巴巴，2019年。

¹⁵⁶ “伊宁县‘轻纺产业区’的产业工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中穆斯林工人甚至没有停顿一下抬头看摄像机¹⁵⁷。记者解释道，这体现了新培训的“高素质”工人所具有的优秀工作态度。叶尔江和古孜拉都提到，经理强调他们做的手套是出口用的，所以缝纫质量必须非常高。他们接受的“人文素质”的培训必须反映在他们大规模生产的手套质量上。

在维吾尔和哈萨克族的生活之上引入国家指导的、汉族独占的公司权力，具有加速工厂劳工跨越民族和阶级差异的异化作用。异化，也就是将个人从其作为工人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中剥离出来，在这个例子中，则是将个人从作为突厥穆斯林的自主权中剥离出来，实际上是再教育工厂的一个主要特征。通过将那些被认为不应受到法律保护的人群变成一个永久的下层阶级，国家当局和私营企业家希望他们能扩大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市场规模。他们正在建立一个用来进行资本积累的殖民边陲。这个强制劳动系统被一个大规模再教育系统“承载”，它作为一个基础性的国家权力机制，确保这个被关押的劳动者阶级不能自发地作为一个阶级而崛起。事实上，因为这种法外制度，唯一能保护突厥穆斯林工人免受剥削和暴力的，是汉族管理者的善意。而正如手套厂的工资机制所表明的那样，工人保护往往只侧重对突厥劳工质量的管理“投资”，工人的幸福和社会关系则被视为毫无价值。

幸存者

由于工厂是营地系统的延伸，处于法治之外，在社会契约的边缘，工厂管理者可以将维吾尔、哈萨克和回族工人视为用完即弃的人。2018

¹⁵⁷ “州直纺织服装产业敲开群众‘就业门’”

年12月，管理人员威胁古孜拉，让她签署一年的工作合同¹⁵⁸。他们告诉她，如果不签，她就会被送回营地。现有被拘留者的储备资源几乎是无限的。在逐底竞争中——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生产力——伊宁的再教育工厂将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发挥到了极致。

古孜拉、叶尔江和埃巴哈提所经历的不自由与奴隶制的联系是普遍的，但也是具体的，比如它在工厂车间里表现出来的方式，或者在 Vera、凯尔比努尔和巴依木拉提的案例中，在作为英语辅导员、汉语教师或数据警察的强迫劳动中呈现的形式。他们的故事指出，民族种族化（ethnoracialized）的奴役形式，即使表现为不自由（但有报酬）的劳动形式，仍然是一种统治关系的再现。埃巴哈提在相对安全的哈萨克斯坦回顾了他在拘留营和工厂的日子，他回忆说：“我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来恢复自己。但即使是现在，我也不觉得完全安全。我再也不会有自由的感觉了。”生活有了一种新的严肃性。作为一名幸存者，他和我采访的许多其他被拘留者都感到自己失去了一些人性——他们感到自己被推向了无社会性¹⁵⁹和残忍。

“我们经常感到绝望。有时我们真的恨中国人，恨到有时候我发现自己在想，我可以去杀几个中国政府工作人员，只是为了感受一下。”埃巴哈提带着悲伤的笑容说。“但我又想到遇到的那些也批评和咒骂

¹⁵⁸ 斌吉恩，“Detainees Are Trickling Out of the Camps”（被拘留者正从新疆的营地中涌出），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19年1月18日，<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1/18/detainees-are-trickling-out-of-xinjiangs-camps/>（英文）。

¹⁵⁹ 译注：无社会性指的是缺乏参与社会关系的动力或倾向独自活动。除无社会性外，发展心理学家也会使用相似的同义词，如：非社会性、不合群以及社会无感等。... 无社会性者也时常是具有内向性人格特质者，而极端的无社会性可能会出现多种的临床状况。（维基百科）

习近平的汉族人。所以我不能把这些怪到中国人身上，他们也是受害者。”

埃巴哈提不愿相信人类在本质上是残暴和自我中心的，不愿相信一旦有了再教育技术权力——从摄像头到拘留营——的协助，他们就会成为没有禁忌的人。他觉得，当面对压在生命之上如此极端的权力时，道德观念和同理心往往会被磨灭消声。在凯尔比努尔作为营地教员的工作中，她亲眼见证了它的发生。她听到汉族同事感叹：“现在难道不是二十一世纪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起初，当看到维吾尔老人戴着铁链作为她的“学生”出现时，她泣不成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不再经常哭了。融入系统庞大的公职人员群体让生活更加容易一些。但撇去她在这个系统中扮演的角色，她大多数穆斯林同胞都理解她的行为：一种在再教育机器中生存的策略。如果有机会，埃巴哈提似乎会加入普里莫·莱维的行列，慷慨地免除“任何共犯罪行最轻但受到胁迫最大的人的责任¹⁶⁰”。

埃巴哈提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怀旧者——对他以前的生活有着深刻而痛苦的渴望。“有时我对自己回来[哈萨克斯坦]并与家人团聚的事实感到满足。我想，‘这就够了’”。然而，尽管他有时会有这种感觉，但在入睡前的梦境中，他胸口剧烈起伏，眼前出现烙印在他脑海中的一幅画面：一排排剪短头发的哈萨克和维吾尔族妇女从身边走过，眼神空洞，赤裸着身体，没有自由。“我们有自己的习俗。哈萨克妇女总是戴着头巾以保护她们的尊严。他们逼她们摘掉头巾，逼她们剪掉美丽的头发，让她们的白发暴露无遗。”

¹⁶⁰ 普里莫·莱维，《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Vintage International Edition, 1989年，41页。译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

对于埃巴哈提来说，幸存者那些将自己隔绝以防止产生任何感情的人。为了生存，他们互相背叛，也背叛自己。排则莱提回忆说，在乌苏的养老院营地，她听到无数被拘留者公开告发自己社区中尚未被拘留的人。“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抓我而不抓他？他比我更虔诚。’”她回忆说。“这就是为什么拘留营变得如此拥挤。每个人为了自救都在互相告发。我当‘班长’的原因也是如此。”

幸存者被命令的时候会唱歌并微笑。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一些东西。有些人失去了理智，有些人纯粹只是变得冷漠和茫然。他们进入了普里莫·莱维所说的“灰色地带”¹⁶¹：也就是数据警察、两面的营地工作人员、牢房监控员、告密者，甚至更常见的清扫工、厨师和缝衣工所处的境地。他们成为了建造、维护和供养再教育机器的幸存者，而这架机器已经深深地侵蚀了维吾尔、哈萨克和回族社会。

与以往的拘留营系统不同，新疆再教育营采用了险恶的技术，将极权式的权力关系从拘留营延伸到工厂和社区。它们将残暴和绝望的孤独带入日常生活，撕裂社区，使孩子背叛父母。埃巴哈提和其他人对这些系统的工程师——算法修补工、人脸识别设计师、DNA作图师、“智能”教育学家——所犯的违反人性的罪行，保留了他们更精确和敏锐的审判。就像那些执行残酷制度的营地指挥官和工厂管理者一样，他们也应当为不思考人性地进入复杂而热情的工作承担罪责。尽管他们

¹⁶¹ 同上。

可能会采用艾希曼式的辩护¹⁶²，说他们“只是在做他们的工作”而周围没有人指出他们的错误，但事实上他们是在有目的地设计一个个控制体系，有目的地将种族化这一过程自动化。

正是他们的这种非人道，现在反映在埃巴哈提悲伤的笑容凝固时所闪现的仇恨里。拘留营的生活让他学会了把自己封闭起来，包裹在难理解的感受中，不论身处世界何方都像是被追捕的猎物。

¹⁶² 译注：奥托·阿道夫·艾希曼，纳粹德国前纳粹党卫军中校，二战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和组织者之一。二次大战后遭以色列特务逮捕。艾希曼面对犯罪的指控，都以“一切都是奉命行事”回答，之后被判死刑。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认为“艾希曼明明是大屠杀的策划人，但却是一个沉闷、普通、平庸得可怕的官僚，他平凡到令人感受不到一点变态和残酷的气息。而根据其证词，他对犹太人没有一丝恨意，只是企图在纳粹官僚体制中飞黄腾达。最终那种不带个人思想的官僚心态，令他把自己的所作所为，从现实脉络中抽离，在没有恶念的情况下，做出历史上最邪恶的事。”

结论：西雅图的背后站着新疆

2016年，孙剑决定离开西雅图回家。在微软工作13年后，这位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首席科研经理决定加入一家名为旷视科技的令人兴奋的计算机视觉创业公司。华盛顿大学的学生Vera Zhou大约一年后也会从西雅图飞回家和她的男朋友度过一个长周末，和她一样，孙剑也去了西塔科（SeaTac）机场，登上了前往人民共和国的飞机。

孙剑加入的公司，旷视科技（Megvii）——或“Mega Vision”——是由一对清华大学毕业生创立的。2016年，中国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 IoT）市场正处于快速扩张期。一年前，他们和其他许多设在中国的计算机视觉创业公司一起，从华盛顿大学保罗·艾伦计算机

科学与工程学院获得了一个庞大的MegaFace人脸识别数据集¹⁶³。他们正是用这样的数据集来训练其核心软件程序——也就是算法——Face++，去辨识人脸模式（相似性和差异性）。他们原本的业务是建立供电子商务使用的可以比较数百万数字图像的自动化工具¹⁶⁴，而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则转向了面部识别应用程序。到2017年底，他们已经与中国26个城市和地区的公安部门建立了“深入的伙伴关系”¹⁶⁵，这包括维吾尔地区——新疆。这种数据密集型、面向公众的工作，以及与国家安全部和反恐工作领导小组（中国版的国土安全部）的合作，帮助他们迅速建立起自己的技术能力。通过进入这个领域，他们能够用国家安全部的数据库¹⁶⁶训练Face++算法，该数据库包括国家发放的近14亿中国公民的身份证，也包括2017年在新疆从每个穆斯林公民脸上提取的高分辨率扫描图像。

¹⁶³ “People Who Downloaded the MegaFace Face Recognition Dataset via FOIA Releas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通过华盛顿大学的FOIA发布下载MegaFace面部识别数据集的人），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Pg_Lg8OfqloNtnyYaLyxAzYHEKYSJh1i3w5o0O1PCvY/edit#gid=0；“UW CSE’s MegaFace Challenge Shows Bigger Is Better for Facial Recognition”（华大CSE的MegaFace挑战赛显示对于面部识别来说‘越大越好’），保罗艾伦计算机科学工程学院（Paul G. Allen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2016年6月23日，<https://news.cs.washington.edu/2016/06/23/uw-cses-megaface-challenge-shows-bigger-is-better-for-facial-recognition/>（英文）。

¹⁶⁴ “一文读懂人脸识别技术”，中航爱创客网，2019年6月25日，<https://archive.fo/kl1Nw#selection-649.353-649.365>（中文）。

¹⁶⁵ “人工智能成城市发展新动能 旷视科技Face++助力多地构建‘城市大脑’”，新华网，2017年12月21日，<http://archive.fo/mslhN>（中文）。

¹⁶⁶ “Alibaba-backed AI Startup Megvii Weighing IPO This Year: Sources”（知情人士透露：阿里巴巴支持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Megvii正在权衡今年的IPO），财经时报（The Business Times），2019年1月11日，<https://www.businesstimes.com.sg/startups-tech/startups/alibaba-backed-ai-startup-megvii-weighing-ipo-year-sources>（英文）。

多年来，旷视科技已经与微软和华盛顿大学——Vera的学校建立了深厚的联系。首先在2012年，前微软副总裁李开复利用他自己的风险投资公司创新工场（Sinovation）为该公司提供启动资金¹⁶⁷。然后在2014年，李开复帮助促成了旷视科技和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阿里巴巴之间的投资交易¹⁶⁸。这种合作关系让他们获得了阿里巴巴淘宝电商平台上的图片¹⁶⁹，虽然这一关系后来被否认¹⁷⁰。旷视科技还开始挖走其他微软员工，或从其人才供应渠道——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招募员工。

2017年，刚从华盛顿大学毕业的博士、西雅图软件公司Adobe的首席设计师王珏¹⁷¹也加入了这家创业公司。作为Adobe的首席科学家，王珏曾创建了Photoshop最新版本的数个功能。在创视，他领导了该公司的一个新部门——创视美国研究院（Megvii Research USA）¹⁷²，距离微软总部不到1.5公里。他和其他十几位年轻的计算机科学家¹⁷³在雷德蒙办公室，一栋平淡无奇的被高耸的道格拉斯枞树环绕的米黄色两层楼，开始了旷视科技分部的工作。这间办公室和任何其他硅谷

¹⁶⁷ Aron Chen, “Venture Capital Big Shot’s Remark on Ant and Megvii Sharing Data Sparks Public Concern” (风险投资大佬对蚂蚁金服和旷视科技共享数据的评论引发公众关注), 品玩 (Pingwest), 2020年9月18日, <https://en.pingwest.com/a/7770> (英文)。

¹⁶⁸ “一文读懂人脸识别技术”。

¹⁶⁹ 同上。

¹⁷⁰ Aron Chen, “风险投资大佬对蚂蚁金服和旷视科技共享数据的评论引发公众关注”。

¹⁷¹ “Jue Wang, PhD”, <https://juewang725.github.io/> (英文)。

¹⁷² “Megvii”, 黄页, <https://www.yellowpages.com/redmond-wa/mip/megvii-540945646> (英文)。

¹⁷³ “Xue Bai”, <https://sites.google.com/view/xuebai/home> (英文)。

科技创业公司没什么不同：他们只是在进行一项复杂工作的程序员和设计师，通过将图像分解成越来越小的部分，使其中的物体可以被搜索到，并解决运行得越来越快时遇到的问题。旷视科技的办公室或在里面工作的人并没有什么阴险之处。他们并没有试图秘密地破坏美国的价值观或威胁人类未来的自主权。从前雇员的工作环境评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像大多数科技工作者一样，他们认为自己在使世界变得更美好。他们的主要抱怨是休息室里没有提供水果¹⁷⁴。这一切都非常平庸。

正如作家和科技工作者王小伟在谈到她对旷视科技北京工作文化的观察时指出：“它不仅让我想起了硅谷。它就是硅谷”¹⁷⁵。创视美国研究院被科技界巨头所包围——微软、亚马逊、Adobe。它距离世界上最富有的社区之一——华盛顿州的麦地那，比尔·盖茨、杰夫·贝佐斯和其他全球精英的家，只有10公里远。在许多方面，新疆再教育工具是这个世界的产物。微软亚洲研究院是催生旷视科技的孵化器，其本身也是众所周知的“中国人工智能的摇篮”¹⁷⁶。在《拦截》¹⁷⁷获得了使用甲骨文软件建立的52GB新疆警方内部文件数据集后，甲骨文公司执行副总裁肯·格吕克（Ken Glueck）指出，几乎所有美国科技巨

¹⁷⁴ “Megvii”, Glassdoor, https://www.glassdoor.com/Reviews/Megvii-Reviews-E976241_P2.htm (英文)。

¹⁷⁵ 王小伟 (Xiaowei Wang), 《Blockchain Chicken Farm》(区块链养鸡场), 2020年, FSG Originals x Logic, 157页。

¹⁷⁶ “极智探索 创见未来——写在微软亚洲研究院20周年之际”, 微软亚洲研究院, 2018年11月5日, <https://posts.careerengine.us/p/5be030522f9d8312b73c80a6> (中文)。

¹⁷⁷ 译注：《拦截》是一个新闻组织，报道国家安全、政治、公民自由、环境、国际事务、技术、刑事司法、媒体等。

头¹⁷⁸——包括IBM、亚马逊和谷歌——都与中国监控技术的发展纠缠在一起。

旷视科技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参与者。让旷视科技与众不同的是，到2017年，Face++已经准备好成为首批在数亿人现实生活中被应用的深度学习系统之一。与它的主要竞争对手——面部识别创业公司依图和商汤——一样，在2017年前后，旷视科技获得了大量国家资本的注入，在全国各地建立数据密集型“智能”安全项目。依图公司向领先的摄像头制造商大华公司提供代码，商汤公司与大华公司的竞争对手、国家承包商海康威视公司（HikVision）合作，而旷视科技则采取了不同的方式。首先，它与阿里巴巴合作¹⁷⁹，在其淘宝和支付宝平台上提供身份安全检查，这两个平台分别相当于中国的亚马逊和PayPal。它还开始与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Vivo合作，打造他们的旗舰产品X21手机，可以与iPhone X的面部识别安全系统相媲美。旷视科技没有直接与国有摄像头制造商合作，而是聘请了军事承包商¹⁸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HikVision的母公司）的一名董事，并开发了他们自己的摄像头生产线，使他们能够独立进入“反恐”业务¹⁸¹。正如

¹⁷⁸ 肯·格吕克（Ken Glueck），“The Intercept’s Latest...Not Even Sure Where to Start”（拦截的最新.....甚至不知道从何说起），Oracle News Connect，2021年4月27日，<https://www.oracle.com/news/announcement/blog/the-intercepts-latest-2001-04-27/>（英文）。

¹⁷⁹ “人工智能肉搏战：商汤和旷视们的商业化征途”，36 Krypton，2018年4月8日，<https://36kr.com/p/1722417102849>（中文）。

¹⁸⁰ “17年资历的安防老兵，在旷视Face++的所闻所感”，雷锋网，2017年11月24日，https://www.sohu.com/a/206210364_651994（中文）。

¹⁸¹ “用人工智能协助新疆长治久安 旷视(Face++)亮相第四届亚欧安博会”，中国网，2017年8月25日，<https://archive.md/2AGKH>（中文）。

2019年该公司的一名员工在一个在线论坛上所说，该公司的人“真的很聪明”。他们证明了“公共安全能够盈利¹⁸²”。

然而，尽管进入一个世界独裁大国的国家安全领域存在道德问题，当孙剑毅然加入由其前合伙人资助的这个中国科技创业公司时，他指出，在许多方面，感觉新公司的文化几乎与微软一摸一样；只是“每个人都似乎年轻了10岁”¹⁸³。像许多其他科技公司一样，该公司——总部设在北京一栋玻璃幕墙办公大楼，看起来就像一家硅谷的创业公司——正在做基础的计算机科学研究，为了广泛的各种应用，建立算法来帮助计算机读取面孔、人、物体、文本、场景、行为和图像。孙剑的座右铭是：“没有坏的算法，只有坏的数据”。

然而，尽管“没有坏算法”的精神充斥着该公司和大多数计算机视觉企业，或者正是因为如此，旷视科技所开发的应用在中国的反恐行动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远远超出他们在雷德蒙的米色办公楼或北京的白墙展厅。

恐怖主义话语

乌鲁木齐酒店登记处的人脸扫描仪是一台白色的机器，大约30厘米宽，45厘米高，具有苹果产品的圆角风格。高清屏幕上方有两个LED灯，照着盯着屏幕的人。屏幕下方是一个放身份证的平面扫描仪。在左下角，一个彩虹式样的旷视科技标识显示了其算法的品牌，该算法

¹⁸² Glassdoor

¹⁸³ “旷视(Face++)孙剑：创业公司里的研究之美”，机器之心，2017年1月11日，<https://archive.md/CA6kN>（中文）。

将盯着屏幕看的人脸与新疆的治安系统对接。该标识背后的软件——由西雅图到乌鲁木齐都参与开发的编程代码——使此机器有能力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根据身份证上的图像验证人脸的身份，并将其与黑名单上成千上万的人脸进行匹配。

我用维吾尔语问前台接待员，是否应该用这台机器验证我的身份证。他有点难以置信，回答说：“你是维吾尔人吗？”我笑了笑，向他挥了挥我的护照，说：“不，我是外国人，但我在这里已经住了很久了。”他笑着说：“这台机器不适合你。它只是给本地人用的。我必须手动扫描你的文件。”自从2015年6月我上一次访问维吾尔地区以来，这里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到2018年4月，大多数辖区边界都设有检查站，每个居民区入口处都有扫脸仪。我的维吾尔朋友、以前的学生和同事中约有40人消失在拘留营系统中。我在街上碰到了几个尚未被带走的人，在匆匆的交谈中，他们证实了我们共同的朋友已经被抓走。旷视科技系统支持的“反恐人民战争”使该地区几乎所有穆斯林都成为可被拘留的目标。

要了解反恐在中国背景下的含义，有必要将时间推到20年前的2001年10月11日。在911袭击事件发生一个月后¹⁸⁴，中国官员首次使用“东突厥斯坦恐怖分子”一词来描述维吾尔抗议者和自杀式袭击者。三个月后，即2002年1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公开报告，

¹⁸⁴ Kilic Bugra Kanat, “‘War on Terror’ as a Diversionary Strategy: Personifying Minorities as Terroris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反恐战争’是一种转移视线的策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塑造成恐怖份子), *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32, no. 4, 2012年, 507-527页。

对过去的维吾尔族民间抗议和政治暴力的历史进行了修订¹⁸⁵，将本来就有问题的民族“分裂分子”——因为大多数维吾尔族的抗议是针对当地的不公，而不是民族自决——一词改为非人化的“恐怖分子”。2002年8月，中国当局带领设在北京的联邦调查局（FBI）对中国境内的维吾尔“恐怖主义”进行了调查。面对越来越大的建立全球联盟以支援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压力，布什政府将总部在巴基斯坦、有名无实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列入了全球恐怖名单¹⁸⁶，联合国也很快跟进。一年多之后，2003年12月，中国国家安全部——旷视科技未来的合作伙伴——发布了一份“恐怖组织”和个人名单，里面全部是维吾尔人¹⁸⁷。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像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一样，维吾尔人被“恐怖化”（terrified）¹⁸⁸了，这意味着他们的外表、宗教实践和政治行动被变成了恐怖主义话语的目标。这就产生了学者戴维·布罗菲（David Brophy）所说的种族化的“坏穆斯林”身份¹⁸⁹，在公民权和人权方面打开了一个例外状态——使维吾尔人作为一个整体被视为

185 “East Turkistan’ Terrorist Forces Cannot Get Away with Impunity”（‘东突厥斯坦’的恐怖势力不能逍遥法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2年1月21日，<http://www.china.org.cn/english/2002/Jan/25582.htm>（英文）。

186 钟健平（Chien-peng Chung），“China’s ‘War on Terror’: September 11 and Uighur Separatism”（中国的‘反恐战争’：911与维吾尔分离主义），外交（Foreign Affairs），2002年9月1日，<https://t.co/RgDhpnVkfS?amp=1>（英文）；肖恩·罗伯茨，2020年。

187 “Terror List with Links to al-Qaeda Unveiled”（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恐怖分子名单曝光），中国日报，2003年12月16日，https://web.archive.org/web/20031217110119/http://chinadaily.com.cn/en/doc/2003-12/16/content_290658.htm（英文）。

188 达伦·拜勒，“Terrifying Uyghurs”（恐怖的维吾尔人），Living Otherwise，2015年12月17日，<https://t.co/GMVBRusuS6?amp=1>（英文）。

189 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Good and Bad Muslims in Xinjiang”（新疆的好穆斯林和坏穆斯林），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2019年7月9日，<https://madeinchinajournal.com/2019/07/09/good-and-bad-muslims-in-xinjiang/>（英文）。

不配获得基本保护。在中国，恐怖主义指的是任何被认为是抵制国家主权的民族他者（ethnoracial others）的活动¹⁹⁰，而不管这种被认为的威胁造成了什么实际伤害。

2014年之后，当旷视科技进入正轨时，阿里巴巴（旷视科技的主要投资者）开始与国家安全部合作开展反恐行动，在中国背景下，这意味着对维吾尔和哈萨克族的监控。旷视科技在这一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在新疆以外的地区。根据许多报道，旷视科技还被指定为新疆公共安全视频实验室的官方技术支持单位¹⁹¹。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在2017年12月发表的一份报告称，通过其在公共安全和反恐方面的工作，“在三站一场（汽车站、火车站、地铁站、机场）、广场、公园、边检区等重点区域抓获数千名非法逃犯¹⁹²；[其]实际战斗力得到公安部新闻局、国家安全和反恐工作领导小组的高度认可”。与孙剑“没有坏算法”的精神相一致，旷视科技副总裁谢忆南告诉（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我们只是向政府提供技术，他们用它来做

¹⁹⁰ 叶蓓（Emily Yeh），“On Terrorism and the Politics of Naming”（关于恐怖主义和命名的政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 Online，2012年4月8日，<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on-terrorism-and-the-politics-of-naming>（英文）。

¹⁹¹ 尽管多个消息来源证实了他们作为支持单位的作用，但旷视现在否认了这些说法。见Danielle Cave等人，“Mapping China’s Tech Giants”（绘制中国的科技巨头地图），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2019年，<https://chinatechmap.aspi.org.au/#/company/megvii>（英文）。

¹⁹² 新华社，2017年。在中国背景下，“反恐”几乎专门是指对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治安。见Ryan Mac和其他人，“US Universities and Retirees Are Funding the Technology Behind China’s Surveillance State”（美国大学和退休人员正在资助中国监控国家背后的技术），Buzzfeed，2019年6月5日，<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ryanmac/us-money-funding-facial-recognition-sensetime-megvii>（英文）。在通过博然思维集团（Brunswick Group）前合伙人金妮·威尔默丁（Ginny Wilmerding）传达的一份声明中，旷视表示，它没有制定“任何针对特定族裔群体的解决方案”。

他们的工作。”¹⁹³在与调查记者马凯（Kai Strittmatter）的谈话中，谢忆南证实了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是他们最大的客户，全国各地的警察都在使用他们的摄像头。他说：“我们的算法能支持5到10万个监控摄像头的网络¹⁹⁴。我们可以告诉你，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你会见到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问：‘他是谁？他在哪里？他在那里待了多长时间？他现在要去哪里？’”他指出，“通过面部识别，我们可以查到诸如你的身份、你的年龄、你的性别、你的种族等各种信息¹⁹⁵。”

2017年，当Vera Zhou离开华盛顿大学回新疆时，离她家不到80公里的社区已经将显然由Face++算法支持的平安城市系统投入使用。可能就是Face++系统，当她在所在街区治安联防队的网格外购物时，经过一个摄像头就被警察拦住了。业界对Face++应用的评估称，它被用于“智能营地”和“清真寺监控”——虽然旷视科技发言人后来声称这些指控不属实¹⁹⁶。

2019年10月7日，在两党的广泛支持以及技术监控造成人权危害的大量证据支持下，美国政府将八家中国科技公司列入黑名单，禁止美国

¹⁹³ 史明智（Rob Schmitz），“Facial Recognition in China Is Big Business as Local Governments Boost Surveillance”（地方政府加强监控，人脸识别在中国成为大生意），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2018年4月3日，<https://www.npr.org/sections/parallels/2018/04/03/598012923/facial-recognition-in-china-is-big-business-as-local-governments-boost-surveillance>（英文）。

¹⁹⁴ 马凯，《We Have Been Harmonized》（我们被和谐了），Old Street Publishing，2019年，170页。

¹⁹⁵ “旷视Face++出席AI领域年度盛会：用AI构建‘五度’城市感知”，科技快报，2018年3月，<http://archive.fo/dJwtw>（中文）。

¹⁹⁶ 全球政策中心，2020年。

公民向其出售商品和服务。该名单指出，旷视科技与依图、商汤、海康威视和大华一起被列入是因为它们的行为“违背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利益¹⁹⁷”。

被列入名单对旷视科技的打击很大。2019年3月，他们准备让公司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所以聘请了一家名为博然思维（Brunswick Group）的世界级公关公司，协助在英语世界建立投资者的兴趣。当有消息称旷视科技深度参与了中国的反恐活动时，博然思维的主管马特·米勒（Matt Miller），一位前彭博社商业记者，开始了咄咄逼人的损害控制（damage control）工作。他指派公司在香港的合伙人金妮·威尔默丁（Ginny Wilmerding）联系了各种组织，从人权观察到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要求他们淡化旷视参与中国执法和新疆人权侵犯的事实。

当我为全球政策中心发表了一份表明旷视科技卷入中国反恐的报告时¹⁹⁸，米勒和威尔默丁也联系了我。他们说，2018年，旷视科技在新疆的收入不到1300万元人民币¹⁹⁹（200万美元，约占他们当年总收入的1%），而2019年的前6个月，他们在新疆没有任何收入。他们淡化了关于旷视科技的算法将成为中国反恐核心组成部分的几十篇报道，认为这是第三方营销人员的“混淆”。威尔默丁在代表旷视科技发言

¹⁹⁷ “Addition of Certain Entities to the Entity List”（在实体名单中增加的某些实体），美国商务部（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2019年10月9日，<https://s3.amazonaws.com/public-inspection.federalregister.gov/2019-22210.pdf>（英文）。

¹⁹⁸ 全球政策中心，2020年。

¹⁹⁹ “US Blacklist is Not Stopping Megvii from Seeking a Hong Kong IPO”（美国黑名单并未阻止旷视科技在香港上市的步伐），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2019年11月19日，<https://www.aljazeera.com/ajimpact/blacklist-stopping-megvii-seeking-hong-kong-ipo-191119185927551.html>（英文）。

时表示，该公司没有开发“任何针对特定族裔群体的解决方案”。然而，2017年底，在中国反恐的影响被世界广泛了解之前，旷视科技的副总裁说，在一个中国城市短短47天的反恐行动中，“抓获嫌犯76人，期间共采集人脸950万人次，人脸比对3.78亿次、预警278次，截获274人，预警截获率达98.9%。”²⁰⁰。像中国的许多其他人脸识别公司一样，旷视科技开发了一个“维吾尔族警报”工具²⁰¹，当维吾尔人在摄像头前经过时，此工具会试图根据脸部的民族表征自动检测他们。对于博然思维和旷视科技北京和西雅图办公室的工程师来说，这些民族种族化的穆斯林生命不值得被他们的技术保护。

新冠遗忘的技术

新冠疫情的到来则使许多其他的事例被遗忘。2020年4月，世界上最富有的科技公司亚马逊从另一个中国监控公司，旷视科技的竞争对手大华公司那里购买了1500个热图摄像系统²⁰²。这些系统总值约7000万元人民币（1000万美元），其中一部分将被安装在亚马逊的仓库中，以监测员工的热信号，并在工人出现类似新冠症状时提醒管理人员。

²⁰⁰“17年资历的安防老兵，在旷视Face++的所闻所感”

²⁰¹“华为视频云解决方案与旷视动态人脸识别系统互通测试报告”，华为，2018年1月8日，<https://shorturl.at/oO147>（中文）；另见“Huawei / Megvii Uyghur Alarms”（华为和旷视的维吾尔报警器），互联网协议视频市场（IPVM），2020年12月8日，<https://ipvm.com/reports/huawei-megvii-uygur>（英文）。

²⁰² Krystal Hu和Jeffrey Dastin, “Exclusive: Amazon Turns to Chinese Firm on U.S. Blacklist to Meet Thermal Camera Needs”（独家报道：亚马逊求助于美国黑名单上的中国公司以满足热像仪的需求），路透社，2020年4月29日，<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amazon-com-cameras/exclusive-amazon-turns-to-chinese-firm-on-u-s-blacklist-to-meet-thermal-camera-needs-idUSKBN22B1AL>（英文）。

这批货物中的其他摄像头则被配送给IBM和克莱斯勒（Chrysler）等买家。

2020年初，随着新冠疫情扩散到中国境外，华大基因（Beijing Genomics Institute or BGI）——其新疆子公司已被列入美国禁贸名单——所拥有的一批医学研究公司也极速扩张，在18个国家建立了58个实验室，向180多个国家出售了3500万份核酸检测试剂²⁰³。2020年3月，罗素·斯托弗巧克力公司（Russell Stover's Chocolates）和位于堪萨斯城的机械承包公司美国工程（US Engineering）购买了价值1000万元人民币（120万美元）的检测试剂²⁰⁴，并在堪萨斯大学医学中心中安装了华大的实验室设备。

²⁰³ Kirsty Needham, “Special Report: COVID Opens New Doors for China’s Gene Giant”（特别报道：新冠为中国基因巨头打开了新的大门），路透社，2020年8月5日，<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bgi-specialreport/special-report-covid-opens-new-doors-for-chinas-gene-giant-idUSKCN2511CE>（英文）。

²⁰⁴ “CEO Tyler Nottberg Teams Up with Local Business Leaders to Buy 50,000 COVID-19 Test Kits”（首席执行官泰勒·诺特伯格与当地商界领袖合作，购买5万套新冠检测试剂盒），美国工程，2020年3月25日，<https://www.usengineering.com/2020/03/ceo-tyler-nottberg-teams-up-with-local-business-leaders-to-buy-50000-covid-19-test-kits/>（英文）；“BGI Helps Kansas City Community Scale Up COVID-19 Testing”（华大基因帮助堪萨斯城社区扩大新冠检测规模），华大基因，2020年3月30日，<https://www.bgi.com/us/news/video/bgi-helps-kansas-city-community-scale-up-covid-19-testing>（英文）。

旷视科技也同样利用了疫情²⁰⁵。他们在中国的医院、超市、校园以及韩国和阿联酋的机场都部署了热图摄像系统²⁰⁶。

然而，尽管在美国缺乏国家级有效应对的情况下，这种保护工人的反应速度和目的令人钦佩，这些中国公司也和种种侵犯人权的劣迹脱不了干系。正如桑贾纳·瓦吉斯（Sanjana Varghese）最近指出的那样，像华大和大华这样的公司在对抗新冠方面的“人道主义实验”²⁰⁷工作也同时是一种人口管理技术。它也掩盖了他们参与非人化系统的事实，该系统将多达150万穆斯林置于拘留营中。

亚马逊自己在非自愿监控中起的作用²⁰⁸已经不成比例地伤害了少数族裔，但撇开这些不谈，它购买大华热图摄像头的行为让人想起了全球资本主义传播中的一个古老时刻，用历史学家詹森·摩尔（Jason

²⁰⁵ “Private Eye: Megvii Exec on Power of AI Amid Pandemic”（旷视执行总裁谈人工智能在疫情中的力量），中国日报，2020年5月28日，<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2005/28/WS5ecec41a310a8b241158f2c.html>（英文）。

²⁰⁶ Sun Ye, “Chinese Tech Companies Rise to COVID-19 Challenge”（中国科技公司迎接新冠挑战），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2020年8月29日，<https://news.cgtn.com/news/2020-08-29/Chinese-tech-companies-rise-to-COVID-19-challenge-T1BXFQzrTW/index.html>（英文）。

²⁰⁷ 桑贾纳·瓦吉斯, “Borders Everywhere”（边界无处不在），Real Life Magazine, 2020年8月12日，<https://reallifemag.com/borders-everywhere/>（英文）。

²⁰⁸ Drew Harwell, “Oregon Became a Testing Ground for Amazon’s Facial-recognition Policing. But What if Rekognition Gets It Wrong?”（俄勒冈州成为亚马逊面部识别警务的试验场。但是，如果Rekognition弄错了怎么办？），华盛顿邮报，2019年4月30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technology/2019/04/30/amazons-facial-recognition-technology-is-supercharging-local-police/>（英文）。

Moore) 的话来说就是：“曼彻斯特背后站着密西西比”²⁰⁹。摩尔重读了恩格斯对纺织业（使英国曼彻斯特暴富）的分析之后说了这句话。它的意思是，如果没有美国奴隶劳工生产的廉价棉花，英国工业革命的许多方面是不可能发生的。以类似的方式，西雅图、堪萨斯城和首尔对疫情作出如此迅速反应的能力，部分有赖于中国西北地区的压迫制度为训练生物识别监控算法开辟的空间。对其他人的保护取决于忘记像Vera Zhou这样的大学生或阿迪尔贝克这样的农民。这意味对成千上万的被拘留者和不自由工人的非人化视而不见。

同时，西雅图也站在新疆之前。中国国家拨款、全球恐怖主义话语和美国工业培训是中国一众公司现在在人脸和语音识别领域引领世界的三个主要原因。这个过程被一场反恐战争所加速，它集中于将维吾尔、哈萨克和回族人置于复杂的数字和物质围墙之中，但它现在延伸到了整个中国科技行业，尽管规模与新疆不同，但其中数据密集型基础设施系统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构筑了灵活的数字围墙。

中国对疫情如此全面迅速的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因为这些系统被迅速安装实施，并清楚表明了它们的有效性²¹⁰。由于它们以如此广泛和密切的方式扩展了国家权力，以至于有效地改变了人类行为。但是，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方法并不是阻止它的唯一方法。像新西兰

²⁰⁹ 詹森·摩尔，“The Capitalocene Part II: Accumulation by Appropriation and the Centrality of Unpaid Work /Energy”（资本纪 第二部分：通过征用进行积累和无偿工作/能源的中心地位），农民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2017年。

²¹⁰ Cai Yineng, “On China’s ‘Color Codes’ and Life After COVID-19”（关于中国的‘颜色代码’和新冠之后的生活），第六声（Sixth Tone），2020年4月9日，<https://www.sixthtone.com/news/1005452/on-chinas-color-codes-and-life-after-covid-19>（英文）。

和加拿大这样的民主国家²¹¹，为那些被迫留在家的人提供测试、口罩和经济援助，同样也是有效的。这些国家清楚地表明，即使在国家层面，非自愿的监视也不是保护大多数人福祉的唯一方法。

事实上，大量研究表明，监控系统通过将目标人群判定为可被任意拘留，助长了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和非人化²¹²。过去和现在的美国政府都采取实体名单方式来阻止与旷视科技这样的公司的贸易。虽然这是重要的一步，但也同时产生了双重标准。它一边惩罚中国公司的自动种族化，一边拨款给美国公司做类似事情。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正试图开发自己的算法来检测种族表征²¹³，尽管是通过一种以同意为前提的消费主义方法。通过将自动种族化作为推销口红等商品的一种便利形式，像露华浓（Revlon）这样的公司正在强化可供个人使用的技术脚本。因此，在许多方面，种族仍然是人们与世界互动时一个未经思考的部分。美国和中国警察就认为自动评估技术是他们用来检测潜在罪犯或恐怖分子的工具。即使黑人男子或维吾尔人被这些系统识别的比例过高，这些算法也使其显得很正常。它们阻止了警察和他们所保护

²¹¹ Konstantin Richter, “How New Zealand Beat the Coronavirus” (新西兰如何战胜冠状病毒), 政客 (Politico), 2020年5月14日,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0/05/14/how-new-zealand-beat-the-coronavirus-257850> (英文); 伊恩·布兰默 (Ian Bremmer), “The Best Global Responses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1 Year Later” (一年后, 全球对新冠疫情的最佳应对措施), 时代杂志, 2021年2月23日, <https://time.com/5851633/best-global-responses-covid-19/> (英文)。

²¹² Angelique Carson, “Surveillance as a tool for racism” (监视作为种族主义的工具), TechCrunch, 2016年4月25日, <https://techcrunch.com/2016/04/25/surveillance-as-a-tool-for-racism/> (英文)。

²¹³ 帕米·奥尔森 (Parmy Olson), “The Quiet Growth of Race Detection Software Sparks Concerns Over Bias” (种族检测软件的悄然发展引发了人们对偏见的担忧), 华尔街日报, 2020年8月14日,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quiet-growth-of-race-detection-software-sparks-concerns-over-bias-11597378154> (英文)。

的人认识到，监控总是为了控制和规训那些不符合当权者愿景的人。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是中国，都存在监控问题。

为了抵制自动种族化的日益平庸化、日常化，首先必须将世界各地的生物识别监控的危害暴露出来。在权力统治生命的边界之处，那些可被任意拘留者的生活也必须被世人所看见。然后，那些世界级的工程师、投资者和公共关系公司主动忽略人类经验的真相，以及它们在再教育系统的设计中所起的作用，必须被明确。这些相互联系的网络——新疆站在西雅图背后的方式——必须成为可以被思考的事实。

鸣谢

本书来自讲述者的勇气。我首先要感谢那些勇敢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和汉族人，他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向我讲述他们的故事。Vera Zhou和Caiyun Ma将我带进她们的生活，向我讲述关于她们的生活是如何被撕裂的私密而痛苦的故事。哈萨克斯坦的一个社区也同样如此，他们花了很多时间等待我的采访，在泪水中述说，袒露自己的灵魂。当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时，在被封锁地区的维吾尔人与我共享Skype屏幕，向世界另一端的陌生人倾诉他们的心声。我希望这本书是对他们所有情感劳动的一种小小的补偿。我希望它能够帮助他们从似乎永远不会结束的创伤中慢慢痊愈。

许多这样的对话之所以能够进行，一方面依赖哈萨克斯坦一位研究助理的投入和其无畏的精神，只是他必须保持匿名；而在西雅图，则是依靠一位坚定的助理，她名叫阿克达·普拉提（Akida Pulat）。2017年，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同事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消失在拘留营之中。阿克达和我一起聆听来自拘留营内部的故事，能够直面这一切的恐怖，她这种勇气是不朽的。阿克达，你激励着我们所有人。

我还想感谢那些推动和鼓励我写《营中纪事》的同事和朋友。劳拉·墨菲（Laura Murphy）、莱恩·图姆（Rian Thum）和杰夫·瓦瑟斯特伦（Jeff Wasserstrom）——没有你们，这本书就不会出现。一路上，斌吉恩（Gene Bunin）和Serikzhan Bilash提供了后勤支持。在SupChina, Anthony Tao给了我空间去探索汉族和维吾尔族对数字围墙影响的不同视角。在中参馆（ChinaFile），Susie Jakes、杰西卡·巴特克（Jessica Batke）和Sara Segal-Williams为我提供了中国政府文件，并对本书一些部分的早期版本进行了批评性反馈。在诺耶玛杂志（Noema），Rosa O'Hara和Peter Mellgard（彼得·梅尔加德）为我提供了一个平台来发展本书中的一些想法。在《卫报》，阿马纳·丰塔内拉-汗（Amana Fontanella-Khan）和Oliver Conroy帮助我思考清楚了本书最后一章中的一些想法。《拦截》提供给我的大量警方内部文件，以及与Yael Grauer长达数小时的交谈，塑造了本书的概念和分析框架。与我的学术导师和同事萨丽塔·阿姆鲁特（Sareeta Amrute）、魏淑凌（Sasha Su-Ling Welland）和Carolina Sanchez Boe的对话也同样巩固了我对这个项目的认识。

在Columbia Global Reports, Jimmy So和尼古拉斯·莱曼（Nicholas Lemann）的耐心和全面的指导、阅读和支持显著地强化了本书的内容。他们关于文本组织和引起共鸣的细节的建议，使故事以新的方式生动起来。卡米尔·麦克杜菲（Camille McDuffie）对这个项目的热情使与媒体的合作成为了一件快乐的事。他们共同帮助了我在社会科学和非虚构文学的世界之间穿梭。我深深地感激他们。

最后，我的伴侣Jennifer Byler始终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好的读者。她对这本书的信念敦促我尽最大的努力，去诉说我们中国西北部的朋

友所面临巨大痛苦的故事。最后，本书献给我们的朋友A.A.、E.、热依拉·达吾提、D.M.、A.S.、帕尔哈提·吐尔逊（Perhat Tursun）和Y，他们在2017年和2018年消失在拘留营中。我们没有一天不在想你们。

延伸阅读

我写的《恐怖资本主义：一个中国城市里的维吾尔剥夺与男子气概》（*Terror Capitalism: Uyghur Dispossession and Masculinity in a Chinese City*）（杜克大学出版社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1年）研究了拘留营系统背后的经济驱动力。这本书根据2011年至2018年在新疆进行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写成，显示了监视的兴起如何与更古老的全球殖民和资本主义历史相联系。

林云雅（Silvia Lindtner）的《原型国家：中国和争议的创新承诺》（*Prototype Nation: China and the Contested Promise of Innovation*）（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年）从工人、设计师和投资者的角度研究了中国高科技发展的增长。这本书是《营中纪事》的重要补充，展示了与中国科技产业相关的全球互联、目标和劳工实践。

杰弗里·凯恩（Geoffery Cain）的《完美的警察国家》（The Perfect Police State）（PublicAffairs, 2021）通过对在土耳其和美国的维吾尔人的采访来理解监控系统的早期影响。

乔安娜·史密斯·芬利（Joanne Smith Finley）的文章“当代新疆的安保化、不安全感和冲突：中国的反恐演变成了国家恐怖主义吗？”（Securitization,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Xinjiang: Has PRC Counter-terrorism Evolved into State Terror?）（中亚调查 Central Asian Survey, 2019）是对拘留营系统的崛起及其影响的权威性描述。

肖恩·罗伯茨（Sean Roberts）的《对维吾尔人的战争：中国针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内部运动》（The War on the Uyghurs: China's Internal Campaign Against a Muslim Minority）（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年）研究了针对维吾尔人的国家政策以及中国政策与全球反恐战争的联系。它为本书所描述的系统提供了一个宏观视角。

米华健（James Millward）的《欧亚十字路口：新疆史》（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Hurst Publishers, 2021年）提供了该地区最权威和最新的历史。它讲述了新疆成为流放地的历史。

买买提明·阿拉（Mamtimin Ala）的《比死更可怕：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反思》（Worse Than Death: Reflections on the Uyghur Genocide）（Hamilton Books, 2021）对拘留营系统在维吾尔社会中的影响进行了深刻的个人反思。该书从一位

维吾尔现代主义哲学家的角度出发，试图阐明看着一个民族被毁灭的无法言喻的恐怖。

丽萨·罗斯（Lisa Ross）的《维吾尔中国不息的圣地》（*Living Shrines of Uyghur China*）（Monacelli Press, 2013）是一部维吾尔族圣地和神圣景观的肖像集。这些美丽的图像为维吾尔人对其祖先土地所有权的主张提供了令人回味的视觉描述。自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已经消灭了大部分此类空间。

莱恩·图姆（Rian Thum）的《维吾尔历史的神圣之路》（*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哈佛大学出版社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年）讲述了维吾尔集体记忆的鲜活历史。它展示了破坏维吾尔人社会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古丽达娜·沙里木江（Guldana Salimjan）的《绘制失去，记住祖先：中国哈萨克人的家谱叙事》（*Mapping Loss, Remembering Ancestors: Genealogical Narratives of Kazakhs in China*）（*Asian Ethnicity*, 2020）研究了哈萨克妇女讲述的故事，以唤起她们祖先的生活史和对北疆土地的依恋。沙里木江本人是来自中国的土生土长的哈萨克人，她描述了哈萨克妇女相互关心的方式以及她们的故乡。

关于作者

达伦·拜勒是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和作家。他是西門菲莎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国际研究助理教授，专门研究中国的维吾尔族，并就该民族在中国持续受压迫的状况，比如新疆的再教育营，进行写作。

拜勒拥有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的历史和视觉新闻学学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东亚研究硕士学位，以及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在加入西門菲莎大學之前，他在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进行博士后研究。

拜勒曾作为顾问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和西門菲莎大學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合作，建立了新疆文献记录（Xinjiang Documentation Project）项目，该项目记录了正在进行的维吾尔族种族灭绝。他的研究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报告（Columbia University's Global Reports）系列以及路思义基金会（The Henry Luce Foundation）和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早期职业研究金的支持。

拜勒经常受到中国国家媒体的攻击，他们指责他是美国政府的代理人，而拜勒对此予以否认。中国共产党经营的报纸《环球时报》指责拜勒是一个“反华人物”，对新疆发生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做出了“捏造的”指控。

拜勒的作品有以下几本：

《恐怖资本主义：一个中国城市里的维吾尔剥夺与男子气概》
(Terror Capitalism: Uyghur Dispossession and Masculinity in a Chinese City) (杜克大学出版社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1年)

《营中纪事：中国的高科技流放地》(In the Camps: China's High-Tech Penal Colony) (哥伦比亚全球报告 Columbia Global Reports, 2021年)

《新疆元年》(Xinjiang Year Zero) 与方易仁 (Ivan Franceschini) 和卢贝尔 (Nicholas Loubere) 合作 (澳洲国立大学出版社 ANU Press, 2022年)